

炎黄春秋

第 **8** 期
2006年

王稼祥因“三和一少”挨批真相

陆定一冤案十三年纪实

吴南生：岂有文章倾社稷

德国总理和我们谈三农问题

纪念《炎黄春秋》创刊十五周年专辑

目 录

求实篇

- 1 无私无畏追求真理的王稼祥.....朱 良
——1962年被扣上“三和一少”修正主义罪名的真相
- 8 陆定一冤案十三年纪实.....韩宗平
- 14 《土地改革法》的天折.....何之光
- 18 两个路翎.....桂向明

亲历记

- 20 岂有文章倾社稷 从来倭幸覆乾坤
——广东省委原书记吴南生访谈录.....关 山
- 31 德国总理和我们谈三农问题.....春 桃

往事录

- 36 潘汉年在劳改茶场.....黄禹康
- 41 李少石事件——暗杀还是意外.....秦立海

人物志

- 45 井冈山走来的女战士彭儒.....唐 瑜
- 49 马寅初——单枪匹马 战死为止.....杨勤明
- 52 核物理学宗师王淦昌.....顾迈南

一家言

- 57 “笔挟风霜”的《点将录》.....李 乔

怀人篇

- 60 良知与责任
——纪念卞仲耘校长殉难四十周年.....裕 雄

轶闻录

- 63 大跃进奇闻拾屑.....李凯源

品书斋

- 68 用信念浇铸的书
——《起来》序言.....徐庆全

古镇台

- 70 “秦家店”君主专制主义理论形成三部曲.....尹振环

专稿

- 75 纪念《炎黄春秋》创刊十五周年专辑(上)

顾问 问:

杜润生 李 昌 于光远 李 锐
特邀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俊义 冯 征 冯 健 冯其庸
曲润海 朱厚泽 李 普 李一鑫
李冰封 李维民 杨天石 吴 象
宋木文 苏双碧 张岂之 张文彬
张荣华 何 方 范敬宜 金冲及
钟沛璋 袁 鹰 凌 云 龚育之
萧蔚彬 曾彦修 彭 迪 韩 钢
雷 颐 魏久明

社 长(法人代表): 杜导正
副 社 长: 方 实 徐 孔(常务)
杨继绳 吴 思

执行主编: 李 晨 徐庆全
社长助理兼编辑室主任: 赵友慈
社长助理兼办公室主任: 胡竞成
理 事 长: 杜导正
副 理 事 长: 莊其環 李 琼
理 事: 白建钢
秘 书 长: 徐 孔
副 秘 书 长: 杜明明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管

本刊常年法律顾问:

张思之(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 010-68083211)

步凌云(北京市华一律师事务所 010-85869163)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817/K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 ISSN1003-1170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 编: 100045

电 话: (010)68522852(办公室)

(010)68534879(编辑室)

(010)68523512(编辑室)

(010)68532048(发行部)

传 真: (010)68532569

印 刷: 唐山市润丰印务有限公司

国内总发行: 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内邮发代号: 82-507

订 购 处: 全国各地邮局(所)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399信箱)

国外发行代号: 1274M

网络电子版全球总代理: 龙源期刊网

网 址: www.dragonsource.com

www.qikan.com

本刊电子信箱(E-mail)地址:

Yanhcq@sina.com

出 版 日 期: 每月4日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西工商广字0296号

定 价: 5.80元

无私无畏追求真理的王稼祥

——1962 年被扣上“三和一少”修正主义罪名的真相

● 朱 良

今年 8 月 15 日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私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外交家王稼祥同志诞辰 100 周年。

在新中国成立前的战争年代，王稼祥除了在军事工作和党的工作方面做出重要贡献外，还有几件大事载入了党的史册。

1935 年在红军长征途中，王稼祥为促成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支持毛泽东对中央的领导，发挥了重大的作用。王稼祥投了关键的一票”。

抗日战争初期，王明借着共产国际的名义，想攫取中央的主要领导权，并推行“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投降主义，给党中央造成很大困难。1938 年 7 月底，王稼祥从莫斯科回到延安，传达了共产国际及其领导人季米特洛夫的重要意见：“共产国际认为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及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从而巩固了毛泽东在中央的领导地位。

1943 年 7 月，王稼祥抱病写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初步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他是我们党正式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的第一人。

1949 年 10 月 5 日，王稼祥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10 月 19 日被任命为外交部副部长。1951 年起，王稼祥担任了十余年中联部部长。

在长期的外交工作中，王稼祥无私无畏，坚持真理，实事求是。他孜孜好学，重视调查研究，勤奋思考问题，高度对党对革命负责，对重大问题敢于提出自己的意见。中国革命胜利后，我们曾认为中

国革命的经验，特别是农村包围城市搞武装斗争的经验，有普遍的国际意义。王稼祥总结了我们在政治上帮助有些国家共产党的经验教训，在 1955 年 3 月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他大胆地提出：“应当正确地应用马列主义、毛主席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以及中国革命的经验。中国革命的理论及经验，对于亚洲各国兄弟党都是有重要的意义的，但是假如我们教条主义地搬到外国，那是非常危险的。”他接着语重心长地说：“我过去是犯过教条主义的路线错误的人，更应警惕，不要再把错误犯到国外去了。”

1962 年，王稼祥为了纠正对外政策和策略上左的错误，提出了重要的意见，因此被扣上了“三和一少”的修正主义的罪名，并横遭批判。特别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王稼祥受到几年的持续批判、斗争、折磨。1974 年 1 月含冤逝世。

“反帝反修”、四面出击的外交政策占主导地位

为了理解王稼祥提出的外交政策和策略，我们简要地回顾一下当时的情况：

1957 年中苏友好关系达到顶峰，但中苏意识形态分歧 1956 年已开始。1956 年 1 月苏共举行二十大，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做了秘密报告，把斯大林描绘成独裁者和暴君，并提出了未执政的共产党有可能不通过暴力革命而通过议会多数取得政权的“和平过渡”理论。世界上出现反苏、反共的高潮，不久又爆发了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苏共的处境非常困难。我党通过内部会谈和发表两篇正面阐述的文章，分析、批判了上面两

个问题,还批评了苏共对波兰、匈牙利的大国主义错误,帮助苏共渡过了困难,并稳定了波兰和匈牙利的局势。特别是我党公开支持了1957年6月赫鲁晓夫挫败在苏共中央主席团占多数的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等人要解除赫鲁晓夫的中央第一书记职务的斗争,赫鲁晓夫对我党非常感激,这才有1957年10月苏联同中国签订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以及供应中国导弹样品和技术资料的《协定》。

1957年11月在莫斯科举行世界共产党代表会议。会议前夕,苏联先于美国成功发射了人造卫星。毛主席除了两次讲话外,即席做了内容很广泛的长篇发言。他在会上宣称:“国际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他还说,“赫鲁晓夫告诉我们15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15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超过英国。”他说,归根到底我们要争取15年和平,那时我们就将无敌于天下,没有人敢同我们打了。

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对外政策都“左”,同年下半年中苏关系开始恶化,中美关系紧张。1958年起,毛主席进一步批判了右倾反冒进,提出了总路线,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1958年9月5日和8日毛主席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卷)中谈到,中国的钢铁产量已经不需要15年赶上英国,两年就基本上可以赶上,5年可以接近美国;再加上两年,搞一亿五千万吨,超过美国,变成天下第一。粮食生产,1958年比1957年翻一番,可能是七千亿到八千亿斤,1959年再翻一番,就可能是一万五千亿斤。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更提出:“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关于究竟有多遥远?原来提交会议的一个文件写的是“1967年以前”,毛主席改得活了一点,改成“1967年或1972年以前”。

当时王稼祥头脑是清醒的。他知道,苏联曾经试办过农业公社,结果犯了“左”的错误,斯大林不得不进行纠正。王稼祥要我驻苏联使馆广泛收集有关苏联搞农业公社的材料,选编成了《论苏联农业公社》,印发给中央同志和有关部门。王稼祥还向中央领导同志当面谈了我们人民公社办得

过早了的意见。

对国内形势的过分乐观必然导致对外政策的调整甚至根本改变。1958年8月23日,在联合国通过决议要美国军队撤出黎巴嫩的第二天,我国开始了炮轰金门。头一天三万发,以后时断时续。美国以为中国要打台湾,十三艘航空母舰有六艘调来远东。国际形势突然紧张。苏联作为中国的盟国也很紧张,在了解到我国并不准备解放台湾后,赫鲁晓夫写信给美国总统,说“中国一旦遭到侵略时准备随时援助它”,“侵犯中国也是对苏联的侵犯”。

在1958年9月的最高国务会议讲话中,毛主席提出了要对美国采取“绞索政策”,“把美国人的颈吊在我们中国人铁的绞索上面”,并且提出了八个观察国际形势的观点:(1)谁怕谁多一点?是美国怕我们多一点。(2)不要把美帝他们结成军事团体看得那么严重。他们是侵略性的,但是并不巩固。现在他们是向亚、非、拉那些弱的进攻。(3)可以公开告诉世界人民,紧张局势对于西方国家不利,对美国不利。紧张局势对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政府,我看都有利。我们可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4)美英侵略军赖在中东不走,起了动员全世界人民起来反对美国侵略者的作用。黎巴嫩也是美国自己造成的一条绞索。绞索的一端,丢到阿拉伯人民手里。(5)戴高乐登台,对内对外也有好处。(6)资本主义国家对我们禁运,对我们的利益极大,我们自己搞大跃进,搞掉了依赖性。(7)帝国主义国家不承认我们,比承认我们是要有利一些。(8)准备反侵略的战争。第一我们不要打,而且反对打,第二我们不怕打,横下一条心,要打就打,打了再建设。帝国主义一定要打,死了一半人也没有什么可怕,这是极而言之。毛主席关于国际形势紧张对我们有利和对美国的“绞索政策”,实际上把美帝国主义的锋芒吸引到中国身上。改变了我们要为国家建设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的政策。这是王稼祥所不赞成的。

1958年起,赫鲁晓夫巩固了在苏共党内的地位,开始加快同美国等西方国家改善关系的步伐。他已经不再像前几年那么需要中共的支持。1959年,中国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失败已经显露出来,赫鲁晓夫对中国的政策进行影射批评,指责中共要抢先进入共产主义。

1959年12月毛主席谈中苏分歧的几个历史事件,提出“修正主义是否成了系统”。1959年12月毛主席写了《关于国际形势的讲话提纲》(《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卷),主要总结了中国和苏联的关系,提出了“修正主义是否成了系统”的问题,讲到中苏某些不团结仍然是一个指头同九个指头的关系,讲了十件一个指头的历史事件”。以下列举几例:

第三件讲:1953年高(岗)饶(漱石)彭(德怀)黄(克诚)在莫斯科的支持下,进行了一次颠覆活动。”

第五件讲:1956年,反斯大林事件,和平过渡论出现,我们两篇文章。”

第七件是:1958年,中苏北京八月会谈,共同舰队和70%投资建立电台事件,我们抵制了这个进攻。金门打炮事件,吓坏了我们的朋友。”70%投资建立电台”是指苏方建议由它出资70%,中苏合建雷达站,建成后共同使用。毛主席批示:钱一定由中国出,不能由苏方出。也就是所有权属于中国。上述北京八月会谈”实际是7月21日、22日毛主席同尤金大使两次谈话和7月31日赫鲁晓夫紧急赶来北京对毛主席作澄清。在这之前的1958年6月28日周恩来致信赫鲁晓夫,就苏联在中国的军事专家的建议,希望苏联提供生产核潜艇等方面的技术帮助。尤金大使答复毛主席称:“赫鲁晓夫希望同中国同志商量一下,建立一支共同核潜艇舰队”。对此,毛主席在同尤金和赫鲁晓夫会谈中给予了痛斥,谴责苏联要控制中国,从他谈话用语的尖刻、激烈,可以看到中苏的相互信任和团结已经受到极大损害,中苏关系恶化已是无法避免了。

第八件讲:1959年西藏事件,中印边界事件,九月两党交换文件,十月北京会谈,抵制了朋友的谬论。”这是指1959年3月西藏达赖叛逃印度,印方给予了支持,8月中印边境发生了第一次



王稼祥(左一)陪同毛泽东(右一)、朱德(左二)会见外宾

武装冲突,苏联塔斯社发表声明,对这次冲突不分是非地表示“遗憾”。在这之前的1959年6月,苏联借美苏正在讨论禁止核试验条约为由,单方面撕毁了1957年10月同中国签订的《协定》,停止向我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的技术资料。接着在1959年9月赫鲁晓夫访问美国,回国时来北京参加国庆十周年,在国庆招待会的讲话中,影射、指责我“用武力去试探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性”是不正确的。10月2日,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同赫鲁晓夫举行会谈,开始时双方气氛还好,但在金门打炮问题特别是中印关系问题上,双方进行了长时间、激烈的争论。赫鲁晓夫抓住中方一位同志的一句话(要争取印度尼赫鲁“迁就是无效的”)纠缠不放。毛主席打圆场说:不谈了,算了吧,这只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我们的基本路线是一致的,不应该影响我们的团结。赫鲁晓夫表示,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中国支持了我们,而我们也支持了你们。毛主席说,我们在政治上是互相支持的,在金门问题上,你们支持了我们。但赫鲁晓夫仍纠缠说,不能同意中方有同志指责他是“迁就分子”。王稼祥为缓和紧张气氛,最后讲

了一句“这里翻译的可能不确切,没有说你是‘迁就分子’”。会谈就这样不欢而散。赫鲁晓夫一回到苏联就在公开讲话中影射指责我党,说如果把战争强加在人民头上,是不能害怕战争的;但是向往着战争,像一只公鸡一样准备打架,这是不明智的”。

毛主席《讲话提纲》讲到的第九件事是“同年(指1959年),高饶余贻(指彭德怀、黄克诚)又在朋友支持下进行了一次颠覆活动”。毛主席把中央政治局委员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对大跃进、人民公社中的错误提出意见,看得十分严重,断言是苏联支持的颠覆活动。

1960年开始公开批判现代修正主义,中苏关系到了破裂边缘。1960年1月,毛主席下了决心,公开写文章批判苏共二十大提出的“和平过渡”、“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等问题,他说:“它修正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只要有资产阶级存在,战争是不可能避免的。”

1960年4月22日列宁诞辰90周年的时候,我们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和《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三篇长达六万多字的大文章,指名批判南斯拉夫铁托,实际上系统、全面地批判了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批判了和平过渡、和平共处、和平竞赛、战争可以避免等理论。三篇文章强调了列宁主义没有过时,我们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修正主义由害怕战争进而害怕革命,由自己不想革命进而反对人家革命,要不要革命,要不要反对帝国主义是马列主义者同现代修正主义者的根本分歧;现代修正主义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是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敌人。

这样,中苏大论战就公开化了。

1960年是中苏关系急剧恶化的一年。主要表现在:继发表三篇反修文章后,(1)6月中旬,赫鲁晓夫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对彭真率领的中共代表团进行了突然袭击和组织围攻,反驳《列宁主义万岁》等文章的观点,指责中共是“教条主义”、“民族主义”、“冒险主义”、“要发动战争”等等。还批评中国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及“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东风压倒西风”等观点。(2)7月16日,苏联政府突然照会中国政府,决定在一个月之内,召回在华的全部1390多名苏联专

家。(3)11月在莫斯科举行81国共产党与工人党代表会议,中苏双方都以分裂的边缘政策对边缘政策。最后双方妥协,达成了谁也不准备完全执行、可以各取所需的《莫斯科声明》。

1961年10月,苏共召开二十二大,会议指责了阿尔巴尼亚党,我们则支持这个反对苏修的主要盟友。中央认为二十二大标志着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路线已经更加系统化、理论化,可以概括为“三和两全”。“三和”即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两全”即全民国家、全民党。还认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从此走下坡路了。

面临严峻的国内国际形势,王稼祥提出纠正“左”的对外政策意见

这样,从1960年起,中苏关系很快地恶化并走向破裂,为了揭露苏联不反帝,我们高举反美帝的旗帜,对全世界人民的反美斗争都要发表谈话、声明或举行盛大集会表示坚决支持。1961年5月,美国在南越发动“特种战争”,越南已派部队去南越和老挝。我们坚决支持越南抗美救国战争。中国同印度在1959年边境冲突后,两国关系一直很紧张。台湾的蒋介石集团则叫嚣要反攻大陆。国内的经济情况十分严峻,从1959年起连续几年粮食不足,人口减少。

面对国内经济困难和国际上四面树敌的严重形势,中央书记处书记、中联部部长王稼祥心急如焚,本着对党对国家高度负责的精神,经反复思考,形成了对外工作的一些想法,于1962年年初开始,他亲自动手、口授和修改,主持起草了近十个文件,大部分没有上送。由王稼祥和中联部副部长刘宁一、伍修权签送的以《党内通讯》形式的信,上送给了周恩来、邓小平、陈毅同志。王稼祥在这些文件中提出的主要意见和建议可以简单概括为以下几点:

(1)我们对外政策首先要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服务,因此有必要采取和缓的方针,注意斗争的策略,以争取渡过或减轻困难。王稼祥认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我国创导的,他不同意说必须打倒帝国主义,才能有和平共处和世界和平。

(2)中苏关系。王稼祥认为要尽可能争取避

免中苏关系的公开破裂,美国最怕的是苏联,特别是中苏团结。要掌握团结反帝的旗帜,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主动做好巩固和加强中苏友好同盟的工作;同赫鲁晓夫的斗争,仍然必须服从于团结反帝的大局;互相不公开批评对方的内部事务,可以说你的,我说我的;不把修正主义当作反马克思主义进行公开直接的批判;总起来说,要在一种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范围内进行斗争,集中力量打击赫鲁晓夫的指挥棒。

(3)反对帝国主义问题。王稼祥认为美国的主要对手是苏联,我们对美帝也应该采取较为缓和的态度。中国要避免把美帝国主义的锋芒全部集中地吸引到中国身上。朝鲜战争时,战火没有扩大到中国东北,主要是美国怕苏联参战,现在情况不同了。因此要避免朝鲜式战争,不能因为别国提出要求,再派军队去那里参战。

(4)中国和印度关系。王稼祥指出,为了争取印度人民,便于印度主张印中友好的进步力量的斗争,我们需要考虑采取新的措施,打开目前的僵局。印度不是我们的民族敌人,我们的主要威胁来自美帝。要高举中印友好、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通过谈判解决中印争端的旗帜。

(5)支持各国人民革命问题。王稼祥认为对别国的革命应该积极支持,但是必须“实事求是,量力而行”。他认为武装斗争不是争取民族独立的唯一道路。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同没有取得胜利的共产党不同,它由于有外交关系,不能公开号召别国人民起来革命,相反地只能说不干涉别国内政。不能以社会主义国家作为推动别国革命的主力,否则将导致打到别国去进行革命战争。

王稼祥勇敢地提出对外政策的建议,基本精神是正确的,这样做也是完全符合党章规定的党员义务和权利的。

被错误地扣上“三和一小”修正主义罪名

王稼祥受到批判的导火线

是1962年7月,世界和平理事会在莫斯科举行争取裁军与和平大会。王稼祥认为,在裁军大会这样的场合,我们讲话的侧重点要把和平问题讲透。我们不仅要团结争取民族解放的力量,也要争取只主张和平、裁军的力量。会后毛泽东批评中国代表团在裁军大会上的做法“脱离了左派,加强了右派,增加了中间派的动摇”。

这次大会后不久,就举行了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包括预备会议。毛泽东在1962年9月14日华东组的《简报》上批了“:‘可看,很好。’《简报》中讲:‘××说,现在有一股风,叫‘三面和一面少’。意思是说我们对美国斗得过分了,对修正主义斗得过分了,对尼赫鲁斗得过分了,要缓和一点。一少,是指我们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支持太多了,要少一点。这种‘三和一少’的思想是错误的。’”“所以又吹起了‘三和一少’那样一股歪风,主要是三年的暂时困难,把一些马列主义立场不坚定的人吓昏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卷)。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批判了党内的修正主义。毛泽东在1963年和1964年对一些国家共产党领导人说:修正主义的国内纲领就是“三自一包”,国际纲领是“三和一少”。“三和一”就是对帝国主义和、对修正主义和、对各国反动派和。“一少”就是少援助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和政党。中央联络部里就有少数这样的人,王稼祥同志也被拉到右



边去了,他主张“三和一少”。毛泽东强调:针对“三和一少”,我们的方针就是“三斗一多”,就是对帝国主义要斗,对修正主义要斗,对各国反动派要斗,要多援助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的、马列主义的政党和马列主义派别。

后来权力极大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野心家、阴谋家康生又把“三和一少”上纲为“三降一灭”。康生偕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原中联部副部长王力还到中联部去煽动批判“三和一少”,斗争王稼祥。

批判“三和一少”、搞“三斗一多”使得整个对外工作走向了极“左”

批判“三和一少”搞“三斗一多”的结果,首先是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斗争加强了。1962年11月起有五个国家共产党的代表大会,在点名指责中国反修的主要朋友阿尔巴尼亚的同时,也指责了中国共产党。我党从1962年起由《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了七篇文章,批判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共两篇,第二篇《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长达10万字),系统地不点名地批判赫鲁晓夫,还批判了法国共产党总书记多列士和美国共产党等。

1963年6月,我党发表了以实现世界革命为目标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的纲领性文件,揭开了反修斗争“大反攻”的序幕。接着以评论苏共给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公开信的形式,陆续发表了九篇点名狠批赫鲁晓夫的文章,这就是《九评》。苏共方面发表的论战文章数量很多,但分量不重。《九评》除了断言苏共“和平共处”总路线的灵魂是苏美合作主宰世界,1963年9月发表的第三评《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批判南斯拉夫搞市场经济,引进外资,自由竞争,加工进口零部件,出口原料,私人企业在发展等,说明资本主义在城乡发展泛滥。1964年7月发表的第九评,总结了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的经验教训,批判了苏联学习美国资本主义经营方式,搞利润原则、自由竞争、物质刺激、高工资、高奖金、高稿酬等,造成了资产阶级特权阶层。1966年3月,苏共召开二十三大,中共拒绝派代

表参加。中苏两个共产党的来往从此中断。随后我们同原来全世界80个共产党中70个“修正主义”共产党,也中断了关系。

我们越来越强调战争的危險迫在眉睫。1964年起,国内加快了反修、防修,准备战争,“要作美苏分别从南北动手,加上日本、印度、蒋帮,敌人从四面八方来,美苏瓜分中国的最坏设想”。

1966年5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后,对外工作的极“左”达到了最高峰。同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提出:当前正处在世界革命的一个新时代,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我国对外政策的最高指导原则(用当时另一种说法,就是“外交服从革命”)等等。1969年4月,中共九大修改后的党章,正式写上“打倒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打倒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打倒各国反动派”的奋斗目标。

当时,还强行对外宣传毛泽东思想和文化大革命。1966年10月,中央批准宣传毛泽东思想和文化大革命作为驻外使领馆的首要任务,有的驻外人员甚至在所在国“访贫问苦”,扎根串联。对许多涉外事件,不问事实真相,无限上纲,动辄抗议,甚至轻率地主张断交,使我国同48个建交或半建交国家中的近30个国家先后发生了外交纷争。最荒谬的是1967年6月至8月,发生了北京的“红卫兵”对四个驻华大使馆、代办处的“三砸一烧”事件:(1)万人围攻英国代办处,放火烧了代办处的办公楼,揪斗了英国代办。(2)50万人游行砸了缅甸驻华大使馆。(3)游行队伍砸了印尼大使馆,焚烧了汽车等设备。(4)游行队伍砸了印度大使馆,两个印度外交官被驱逐出境时,沿路又对他们进行批判、殴打。对方也对我方采取了相应报复行动,甚至中断了外交关系(印尼)。

中国同苏联的关系,1969年秋到了战争的边缘。1971年中美开始改善关系,1973年我们开始实行“搞一条线”的政策:“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共同对付苏联。这是后话。

我国对外援助特别是援助越南抗美和非洲国家的费用大量增加,最高时占国家财政支出的6%-7%。当时还提出“中国是世界革命的根据地”,党的对外工作是“支左反修”。我们同意并

支持一些亚洲国家的共产党，以中国为基地进行公开的反对本国政府的政治活动，1966年至1969年同意并帮助几个共产党在中国设立广播电台，还帮助一些共产党和左派人士来中国学习军事，为他们提供军事、物资和经济援助，甚至派军事骨干去协助他们。

类似上面这种“三斗一多”四面出击的极“左”做法，正是1962年王稼祥担心和反对的。

1979年中央批准为“三和一少”平反，邓小平对中苏大论战的评价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1978年底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没有涉及对外工作。1979年3月，中央批准并向全国通报了中联部上送的《建议为“三和一少”、“三降一灭”问题平反的请示》（《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上集）。《请示》为王稼祥平了反，肯定了他1962年提出的意见总的精神是正确的，否定了林彪、康生“四人帮”在对外工作中煽动极“左”思潮，搞四面出击、“三斗一多”、打倒一切，破坏了我国同一些国家的外交关系和正常交往。

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同一些国家共产党负责人曾经简单地谈了对中苏大论战的看法。如1981年同原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的遗孀约蒂议长说：1963年我们写了篇文章，对不起陶里亚蒂同志。那篇文章丢到纸篓里去吧！1983年邓小平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席希尔时说：大论战我们发表了九篇文章，从现在的观点看，好多观点是不对的。我们真正的错误是，根据中国自己的经验和实践来论断和评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是非，因此有些东西不符合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原则。1987年邓小平会见保加利亚共产党总书记日夫科夫时说：我们1957年反右派，1958年大跃进、搞人民公社化，包括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政策也是“左”的。1989年5月，邓小平同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北京会谈，宣布了两国、两党关系正常化，在谈到那场中苏大论战时，邓小平说：回过头看，双方讲的都是空话，马克思去世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



1986年8月15日，朱良（左三）、朱仲珮、王稼祥夫人（左二）在芜湖参加王稼祥铜像揭幕典礼

事情已经过去了40多年。文化大革命后，我们强调和平与发展，重申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革命不能输出。在纪念王稼祥诞辰100周年的时候，再来回顾他1955年在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提出的不能把中国革命的理论经验，教条主义地搬到外国的重要思想，特别是1962年为纠正“左”的对外政策，勇敢地提出全面、系统的意见，是多么的正确，多么的重要啊！如果王稼祥当时的意见被接受（这在当时是不可能的），后来的世界格局，就完全是另一种状况了。王稼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批判、斗争时，仍然坚持原则，坚持真理。他感人肺腑地说，面临当时严峻的国内国际形势，“我想啊想啊，觉得严重，于是乎，我就挺身而出，来向中央勇敢地提意见”，“我觉得如不呈诉自己的意见，那并非共产党员的本质；如不提出意见，中国若陷入十分困难的境地，我将后悔终身。”王稼祥这种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无私无畏坚持真理的伟大精神，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

（责任编辑 杨继绳）

陆定一冤案十三年纪实

● 韩宗平

“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陆定一就被定为“彭、罗、陆、杨反党联盟”成员,因为这顶政治帽子没有实质内容,不足以彻底打倒他们,于是就采取突击审讯、指供诱供、颠倒是非、捕风捉影、捉刀代笔、拼凑罪行的手法,罗列新的骇人听闻的罪名。即以陆案为例,什么“搞夫妻反革命黑店”、“要把副统帅整死”、“是阶级异己分子”、“叛徒”、“内奸”、“里通苏修”、“是大学阀”、“大阴谋家”、“大修正主义分子”、“大反革命分子”等等,必置其于死地而后快。就连陆的祖代与家人,都是反动透顶的。

那么,陆定一的冤案究竟是怎么搞出来的呢?这要从头说起。

陆定一的夫人严慰冰,在精神不正常的情况下,写了骂林彪、叶群的匿名信。1966年4月28日以“现行反革命分子”罪被逮捕。接着,陆定一也被立案审查。同年5月在一次会议上,林彪借机诬陷陆定一阴谋反党,并说:“匿名信是你指使的”;“我恨不得一枪打死你。”在林彪、“四人帮”、陈伯达、康生、谢富治一伙操纵下,从1966年5月8日起,先后对陆定一实行软禁、隔离、监禁,采取严刑逼供手段,残酷迫害,长达13年之久。

(一)

1966年5月8日至9月30日,陆定一被软禁于自己的住宅。由两名工作人员以照顾生活为名,监视陆的言行,限制其人身自由。

陆定一针对林彪的打击诬陷,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写信,除了检讨自己工作中的错误

之外,再三郑重说明匿名信与己无关,硬拉成一回事,我不服,因为不合事实”。并说:“我想到的,是党内斗争的做法问题。我个人死不足恤,希望我们的党能办得更好,为后世法。”这封信被专案组搜去,专案组武断地批道:“还是修正主义的立场,不送。”

1966年7月26日,中央一位有影响的人物对专案组说:“陆定一在苏联,据说苏修给他一万卢布。将来,可能搞他个里通外国。”

1966年9月15日,谢富治对专案组说:“林总交的这件事情,要毛泽东思想、阶级斗争挂帅,要带着无产阶级对敌人的仇恨去挖陆的老底,坚决贯彻执行,不要受公安机关的清规戒律束缚。”他还支持红卫兵抄家等违法行为。

8月底,中央宣传部和清华大学、北师大、哈军工、北京四中、八中等学校的七八十名红卫兵,多次闯到陆宅,把室内许多重要物品砸得稀烂,当场揪斗陆定一,戴高帽、挂黑牌、罚跪、站椅、用皮鞭抽打,在陆的白衬衫背上用墨水写了“黑帮头子陆定一”,还把陆拉到院子里,把小猫放到他脖子上照相,加以丑化。对这种行为,陆定一采取谅解态度,给毛主席写信表明自己的立场:“我要坚决站在革命的方面,不能走着跟,爬着也要跟上去”;“争取一个较好的晚节,把我的余生,贡献给革命,跟着主席干一辈子,直到我还有最后一口气的那一天。”

监管人员对陆定一加以种种限制,不许他向毛主席写信,不许子女给他读文件,不给他马恩列斯和鲁迅的书看,只许他检讨自己的“三反罪行”。陆坚决拒绝,严厉地指出:“想把我逼成一个反党、反毛泽东思想,告诉你们,办不到!”

说这些书”，即使是政治犯、战犯也可以有，为什么我是共产党员却不给我”？

1966年9月30日下午3时，有5人到陆定一家里向他宣布：“中央决定对你实行隔离审查。”陆定一问：“我犯了什么罪，这样对待我？”回答：“你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罪很大。”于是，“像绑票一样，像老鹰抓小鸡一样，把陆抓上汽车，送到公主坟。”在离家之前，陆定一嘱咐子女，要把他的两句话转告毛主席。一句话是：“我以前受王明打击，是毛主席救了我。主席是我的恩人，我至死不反毛主席。”一句话是：“我是个共产党员，生为革命生，死为革命死。犯了错误，我改。跌倒了，再爬起来，不能走着跟，就是爬，也要爬着跟上毛主席。”

（二）

1966年9月30日至1968年5月31日，陆定一先后被隔离于北京公主坟“别墅”和西四七条监所。

陆定一被隔离后，陶铸指示：“对陆定一政治上要严格，生活上要照顾，保证安全，不要垮，不要死；伙食（每月）可以吃到45元，安个沙发，搞个钢丝床。”后来谢富治知道此事，对专案组发火：“你们是什么感情？”陈伯达、关锋也批评专案组“右倾”、“仁慈”。为此，1966年12月16日，陈伯达亲笔给专案组写批条：“1、降低生活标准（不超过12元），沙发、软床、写字台等等，一概撤掉。2、要（他）写逐日活动，先从去年10月起至今年被捕止。3、考虑交红卫兵审判（此事内部掌握）。”关锋还提出要红卫兵揍他。当晚10时，关锋等

人到陆住所宣布：陆定一是反革命分子，当犯人看待，责令写出从去年10月1日以来的政变活动。

在监管问题上，陈伯达也大做文章，肆意虐待陆定一。1967年3月16日，他对专案组说，公主坟那房子太好了，是德国人盖的，像别墅一样，是解放前北京最好的房子。不能让他住那么好的房子，在里边‘休养’”。3月21日经谢富治批准，立即把陆转移到西四七条监所。

1966年10月19日谢富治对专案组定调说，整陆定一“这个任务重大，直接受林总委托，一定要搞好。”还说，陆定一“搞夫妻反革命黑店”；陆定一是个阶级异己分子，叛徒，不是一般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直到他新的万贯家财（注：指从陆定一家搜去的个人存款）。对副统帅有刻骨仇恨，要把我们副统帅整死！我们对他们要有阶级愤慨，杀他十个头的罪都够了！”12月23日，经谢富治批发的第4期简报说：“陆定一案件，是当前大案要案之一。陆的一家都是反动透顶的，是世袭大官僚、大地主、大资本家、大高利贷者，陆本人是大学阀、大修正主义分子、大阴



1957年4月，陆定一（左）与毛泽东在杭州举行的部分省市书记会议上



1982年9月,陆定一(右)与邓颖超、宋任穷合影

谋家、大反革命分子。”

对陆案的性质和处理方法,不得有任何怀疑。早来的一些办案人员对此有些不同看法,即遭到严厉打击迫害。严佑民(原公安部副部长)认为:“像陆定一这样的人,不一定写匿名信”,被斥为“右倾”;严又因查阅中央有关档案,犯了“客观主义”错误和“盗窃中央档案”罪,被监禁10年。邱路(原江苏省公安厅副厅长)不同意陆严合谋“八大罪证”的看法,也被投入监狱10年。1967年底至1968年初,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认为公安机关的干部“思想右倾”,“旧框框多”、“不可靠”,便让其大部回原单位。他们还以办案不力是“包庇敌人”、“通敌”、“右倾”,对办案人员进行恫吓,驱使其按照他们“先定性、后调查,先关押、后审查,突击审讯、刑讯逼供”的错误办案路线,把大批革命老干部当成阶级敌人进行迫害,制造冤假错案。

专案组审讯陆定一的方案认为:“陆历史上叛变、充当内奸的重大嫌疑和陆严合谋搞反革命匿名信是陆案的要害。”他们千方百计地在这两个问题上下功夫,以求突破。先后进行了三轮规模较大、时间较长、刑讯逼供严重的审讯。第一轮是1967年6月至8月两个半月,审讯92次;第二轮是同年12月,半个月审讯11次,其

间三天三夜严刑逼供时未作记录;第三轮是1968年1月中旬,审讯6次。半年多时间,突击审讯109次。

陈伯达、谢富治指使刑讯逼供。1967年5月17日谢富治说:“陆定一这个死案子没有进展……要集体审讯,一审几个钟头,非攻破不可。”7月份,陈伯达批评:“陆定一专案组,前线无消息,战场无战事,工作无进展。”他要求专案组“要连续突击,要厉害,不能心慈手软,不能搞和平谈判”。

12月5日谢富治说:“审讯要有狠心,下得手”,要“日以继夜地搞”,搞不下这个案子,就要考虑是否有包庇敌人的问题。”康生也批评专案组“右倾”,“进展慢,力量散,方法乱”。陈伯达、谢富治、吴法宪12月22日亲自批准对陆定一戴铐审讯。

在调查取证和审讯时,谢富治强调:“专案工作不能有闻必录,有闻必录就是客观主义,客观主义就是包庇敌人。”他以反“客观主义”为名,只准接受他们认为有问题的材料,不准接受没问题的材料,否则就是为敌人翻案。陈伯达、谢富治等人对陆定一的问题先定调子、划框子,作为不可改变的结论,要专案组去找材料加以证实。为了取证,专案组按照林、陈、康、谢的旨意,于1967年11月,到上海多次提审原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代理组织部长黄旭初,要他交代陆定一被中统特务吴开先“密捕”搞成“内奸”的经过。他们采取威逼和疲劳战术,诱供、指供、逼供,以获取所需材料。有一次连续审讯半个多月,有时一天审讯10个小时。黄旭初由于身体吃不消,加之惧怕“抗拒从严”而升为死刑,就绞尽脑汁,编造了“一品香饭店事件”的假材料,以及陆在南京、重庆活动的假情况,才使他们满意。然后由提审人员拟好“供词”,叫黄照

抄,要求:“字迹工整,行要整齐,不能改一个字,也不能漏一个字,也不许有一滴墨水。”

与此同时,专案组负责人组织10多人日夜三班,突击审讯陆定一,有时连续二三十小时不让休息。在审讯前,有的办案人员提出:“从公安工作讲,戴铐审讯叫刑讯,不能那么搞。”专案组负责人则大放厥词:“那是公安工作的旧框框。必须分清革命措施和刑讯逼供的界限。”于是在审讯过程中,他们采取极其残酷野蛮的手段进行逼供:戴铐,罚站,罚跪,按头,掐脖子,揪头发,拧耳朵,勒腰带,大弯腰,整姿势,无所不用;有时认为陆的态度不老实,审讯人员一拥而上,紧手铐的紧手铐,揪耳朵的揪耳朵,陆常被搞得不断失声惨叫,闻者心寒”;每次审讯都把陆搞得脸肿、耳肿、手肿和流血”,由于铐得过紧,致使手铐扣进肉内,造成手腕溃烂化脓”。陆定一年老体弱,经不起连续突击的车轮战、疲劳战和各种酷刑的摧残,精神恍惚,不能理智地回答问题。审讯人员不断诱导,要陆的招供与黄旭初的供词对上口径。在刑讯逼供下,陆定一于1967年12月18日写了《关于我的自首叛变充当内奸的罪行的初步交代》,但随后就推翻了。陆定一坚贞不屈。审讯人员说:“上边早已给你做了结论,你不承认行吗?”陆摇晃着手铐,一语双关地说:“是呀,我铁案如山(指手铐),不交代行吗?”

用如此残暴的手段获取的假供,专案组当作宝贝向上报功:“在中央首长的亲切接见及重要指示的鼓舞下,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我们集中力量,从12月12日下午7时开始,对反革命分子陆定一进行了突击审讯,经过三个昼夜的紧张战斗,迫使陆犯缴械投降,供认了1930年11月叛变充当内奸的滔天罪行。”谢富治一违惯例,未经他的同伙陈伯达过目,抢先将“供词”直接呈送毛主席,进行欺骗。中央专案一办还印发了这个专案组总结的所谓“突破陆定一内奸”问题的典型经验,胡诌他们用天天唱、天天读、早请示、晚汇报,武装了头脑;运用了什么战略战术和斗争策略,取得了胜利。陆定一对他们的这一套把戏,给以无情的戳穿。1971年1月20日陆定一给审讯组写信,指出:“当时你们搞刑讯,我为了不致受伤残废,写了假材料,所以,

这个假材料实际上是你们打出来的’。”他在信里还写了一首诗,表达自己的胸怀:

壮志饥餐帝修反,铁窗奈何镬英豪?
穷治极究纵严酷,真金不怕烈火烧。
文化革命风光好,如此风光世间少。
有反必肃错必纠,莫把风光玷污了。

陈伯达和关锋为了把陆定一搞成“反革命”,无中生有地提出审查陆的“政变”问题,而且要陆把“政变活动”一天一天地写出来。陆定一强烈抗议他们捏造的这种莫须有的罪名,指出:“我不是反革命,我从来不反毛主席。”你们是逼供信,你们关了我,也关不出一个反革命来。反正我没有参加反革命活动,你们不要希望我承认这一点,不要希望我承认反党、反毛主席。”

面对林彪一伙的疯狂迫害,陆定一不得不采取绝食斗争的方法。为抗议他们追查所谓“反对派名单”,1966年12月9日至12日,绝食4天;为抗议他们追查所谓“政变行动”,1966年12月17、18日,绝食2天;为抗议他们追查所谓与彭真“反革命密谋”,从1967年1月3日晚上至8日中午,绝食5天。前两次绝食后,陈伯达在电话上叫嚣:“他向无产阶级进行绝食斗争,是反革命行为,是他一种斗争策略,是对我们的威胁,切不可上当受骗。要同他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不能乞求他进食。”第三次绝食,就是专案组负责人在陈伯达唆使下挑起的。他带领5个人去审讯陆定一,先罚他立正站好,陆拒绝立正,就踢他的脚,恶狠狠地说:“你不交代,我就枪毙你!你有骨气就再绝食,我批准你。不交代就站着!”结果,陆从下午2时30分站到夜10时50分,并从当晚开始绝食,一直到8日中午。

在绝食期间,白天把陆定一拉到中央宣传部、工人体育场进行批斗;又立正,又低头,汗出如雨,浸透棉衣,腰部瘫痪,两边无人挟着就不能行走”。回到监所后,不许休息,不许躺下,接着审讯逼供,折磨得难以支持。他抗议林彪一伙搞逼供信,提出“要到大会上去控诉”。陆定一意识到可能被整死,早在1966年12月10日就写了《预立遗嘱》:“我犯了很多错误,对不起毛主席、党、全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但我不是反革命。严慰冰反革命匿名信案,我既非主谋,也

非同谋。我坚决相信,我的冤枉总会昭雪,因为我们有毛主席,有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

(三)

陈伯达、谢富治为了加紧迫害陆定一,授意专案组写报告,以“罪大恶极”罪名,要求把陆定一逮捕收监。1968年5月23日经陈伯达、谢富治、吴法宪批准,5月31日上午10时正式将陆逮捕入狱,“囚犯”编号是:68164。

1968年9月13日,专案组给陈伯达写报告,拟按“叛徒内奸、反革命匿名信、里通苏修、结党营私、三反言行、反动家庭等六个问题”定罪。陈伯达给专案组写信,说:“在上海一品香,吴开先给陆定一1000元,陆定一从此做了叛徒,成为内奸,这件事必须写上。”同年9月16日,康生在一个文件上批道:“陆定一投敌叛变,有大量的确实可靠的铁证。”江青要求专案组写定性材料时,“要画龙点睛,刀笔吏,几句话把问题说清”。张春桥就用“刀笔吏”的手法,把审查报告中“有了投敌叛变的思想基础”一句,改为“早在1928年就已经下决心投敌叛变了”。专案组在1972年9月一个材料中,把陆定一定为“现行反革命,叛徒,内奸,里通外国分子,建议开除党籍,判处有期徒刑”。

为了制造社会舆论,把陆定一搞臭,江青指使专案组写了《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胜利前进》和《将批判唯心论的斗争进行到底》两篇文章,经姚文元批准,以“钟慎”笔名,登在1971年第八、第十一期《红旗》杂志上。陆定一对文章中的歪曲、捏造,一一作了批注,予以驳斥。

“九大”之后,林彪、“四人帮”已经篡夺了一部分权力,他们得意忘形,不可一世。在审讯的时候,陆定一义正词严地指出:“你们看看,有多少省委书记,有多少部长,被说成是刘少奇的代理人”“你们不要用肃反扩大化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搞脏了”。面对审讯人员的挑衅,陆定一对他们说:“好!现在我们把话说明白,再过若干年看看,到底谁正确?!”对此,审讯人员以“疯狂至极”、反扑为借口给陆戴铐坐牢制裁。

在林彪反党集团被粉碎后,1973年1月,专案组笔杆一摇,妄下雌黄,把严慰冰骂林彪、叶群的匿名信,改成:“在陆定一的主使下,用特务手段书写匿名信50多封,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央负责同志。”到1975年3月,专案组还称陆定一是主使,伙同严慰冰书写匿名信的“现行反革命”。

听了“十大”新闻公报后,陆定一在奉命写的“感想”中,揭露了林彪借“匿名信”对自己的造谣陷害,是在“共产党内绝无仅有的”“阴谋诡计”;专案组在林彪挑动下搞刑讯逼供,是“比砒霜还毒”的阴谋,要求给以彻底平反,并追究“定计”“策划人”。

中央专案一办1975年10月9日向中央报送了《关于陆定一问题的审查报告》,认定陆为“阶级异己分子”、“反党分子”,有“内奸嫌疑”,建议清除出党。中央1975年12月11日根据这一报告作出《关于陆定一问题的决议》,并以中发[1975]25号文件发至全党。24日,专案组负责人向陆宣布中央决议,陆当即申明自己“既不是阶级异己分子,也不是反党分子,更没有内奸嫌疑”;“结论上写的都不是事实”,表示不服,要求给一份文件或抄件看,逐条进行答辩。并说:“给出路,给公民权,给二百元生活费,我不要,我要党籍!”要求中央改变决议,在这个问题解决之前,我不出这个狱!”直到1977年4月,专案组惧怕陆定一看他们捏造的“审查报告”,竟说:“这个文件,全国无论何人都可以看,只有地富反坏右和你,不准看。”可见他们何等心虚!

对陆定一的申诉和要求释放的呼声,他们一概看作是“翻案”活动,加以打击压制。那位有影响的人物1976年指使中央专案一办搜集“案犯”翻案活动情况。一办在调查报告中说,陆定一“一直顽固地坚持反动立场”“胡说他们犯的是无名罪,坐的是无底牢”。

1977年4月14日,陆定一对专案组负责人说:“叛徒、内奸、反革命修正主义政变集团,你们都不讲了。你们费了心思,搞了9年,还算内奸嫌疑。把我开除党籍,我是不能同意的。”专案组负责人回避问题的实质,却以政治局讨论通过、毛主席亲自批准为名,硬说“现在这个天是

无产阶级的天”，“你这个案子什么人也翻不了”，“你什么时候也翻不了”，“不写检查不能出狱”。

从1976年2月至1978年11月，陆定一多次口头提出要求出狱，要求写申诉书，并又亲自给中央领导写了申诉信，都被扣压。

那位有影响的人物1976年2月对中央专案一办负责人说：陆定一“要答辩，你们可以批他。

他要求出狱，现在暂不理”。据此，在此后的两年多里，中央专案一办负责人对陆定一多次要求出狱和申诉的问题，一律是“现在暂不理”，“先不急，批批态度”，“以后还闹，去批他一下”，“不要理他”，“先不理他”。

陆定一之子陆德1977年为他父亲写了申诉，邓小平批交汪东兴核实上报。中央专案一办负责人则说：“陆定一的案子有大量证据，是可靠的，推翻不了。”以此抗拒小平批示。

陆定一在复兴医院看了1978年7月23日《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文章——《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必须抓紧》之后，提出四条强烈要求：（一）要求释放；（二）要求找中央领导同志谈话；（三）要求给纸、笔写申诉材料；（四）要求见见孩子。在这种情况下，中央专案一办负责人才表示：“可以去医院同他谈一谈，要求写申辩，可以让他写。”可是陆定一8月13日向中央领导写的长篇申诉信，却被扣下。陆在这封信里，愤怒地揭露了林彪一伙对他的种种诬陷迫害的罪行，同时也揭发了专案组“抱信得过的态度，就要吃亏误事。这个组里的人，特别其领导人，是林彪、陈伯达挑选和组织起来的。他们是在‘砸烂公检法’，把毛主席肃反路线认为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加以仇视，提倡刑讯逼供、违法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期间（左起）陆定一、江华、胡耀邦、余秋里在一起

乱纪、弄虚作假、阴谋陷害、作威作福等这条路线下成长起来的。林彪、陈伯达垮台后，他们改归中央政治局，但既未改组领导，也未检查工作，重新教育。他们之中有些人，特别是领导人，实际上是躲在死角里的林彪余孽啊！”

多年来，他们借口陆定一说过在问题解决前不出狱的话，拒不执行毛主席对陆“放了算了”的指示。1978年10月18日，那位有影响的人物还对专案人员说：“陆定一，毛主席指示放了算了，但他不出来。说不给他结论不出来，坐牢要把牢底坐穿。他把牢底坐穿了，地球下面就到了美国了。”

（四）

1978年11月25日，公安部向中共中央报告，建议释放陆定一。经中共中央批准，于12月2日释放。中共中央组织部认真复查了陆定一的问题，1979年5月19日向中央提出审查报告，查明“此案是文化大革命运动中遗留的一起在逼供信下造成的重大错案”。6月8日经中共中央同意，以中发〔1979〕44号文件批转全党。陆定一历时13年的沉冤，至此彻底平反。

（责任编辑 萧 徐）

《土地改革法》的天折

● 何之光

1950年7月,湖南邵阳地区土地改革开始试点,当时我在该地区负责青年团工作,地委派我参加邵阳县委,在县委统一领导下搞土改。从一个乡的试点到全县基本完成,除“复查”外,我参加了土改全过程。

经过近五个月(其中约一个月搞征粮)夜以继日的工作,到同年12月,完成了包括三个试点乡在内的四个区的土改,并已按计划向其余13个区的60个重点乡铺开了。

此时,党中央突然下达“反对和平土改”的指示,文件我未看到,主要精神是说前段工作没有大胆放手发动群众把地主阶级斗倒斗垮,并说这是毛主席亲自提出来的。立刻引起干部们的巨大震惊。于是层层作检讨,把四个区的土改说得一无是处,被认为是“煮了夹生饭”“走了弯路”“必须从头来”。由于高层强调说,这是“指导思想上方针路线的错误,由领导承担责任”,干部们的思想情绪才转过弯来。

胡乔木在序言中大加赞扬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284页,关于土改有这样一句话:“党反对不发动群众,用行政命令方法把土地‘恩赐’给农民的和平土改。”这一句话掩盖了一段血淋淋的历史。

前段土改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以下简称《土改法》)和刘少奇《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以下简称《刘少奇报告》)及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以下简称《政务院决定》)三个主要文件以及各级领导的具体部署实施的。

当时,全国除台湾西藏外都已解放,各级新政权均已建立,党的威信空前高涨,受到广大人民热烈拥护,全国呈现出一片朝气蓬勃、情志高昂的大好局面。农村中经过清匪、反霸、减租、退

押和征粮等一系列斗争,“杀、关、管”了一大批恶霸地主、土匪头子、反革命分子等。农民协会和民兵组织尽管成分不纯,也已普遍建立,11月开始的大规模镇反也具有极大的震慑力,应该说,地主阶级已遭受沉重打击,狼狈不堪了。

前段土改就是在这个形势下完成的。其基本做法如下:

土改工作队进村后即展开政治攻势,首先在全村群众大会上说明来意,宣传土改,稳定民心。然后分别召集农会会员、民兵、妇女、青年和暂不冠名的贫雇农、中农及富农、地主先后开会,有针对性地宣讲土改政策、约法几章。有的村还将《土改法》写成了大字报张贴。与此同时,工作队员个个深入农户,访贫问苦,与贫雇农同吃同住同劳动(这是纪律)。经过扎根、诉苦、串连、诉苦会等,将贫苦农民发动起来,选出觉悟较高、办事公道、历史清白的积极分子,改造原农会,然后在农会和工作队领导下,有计划地对有劣迹有民愤或隐瞒土地、转移粮食等的不法地主,展开面对面的诉苦说理斗争,一直斗到他认罪服法。确有必要时,由人民法院开庭审判判决。斗争会上会下都禁止打人。在斗争间隙,继续深入发动,争取尽可能多的中农和妇女入农会。对一般守法地主,只要交出应交的地契房契等,承认过去剥削农民的罪错,便不开他们的斗争会,以利于分化瓦解地主阶级和土改工作的进展。

由于贯彻执行了团结中农、中立富农的政策,地主分子陷入农民的汪洋大海,极其孤立和惶恐。在这种有声有势、合理合法的斗争形势下,即使是顽固地主也不能不看到,只有下决心把自己改造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才是唯一出路。

所以,四个区的土改几乎没有遇到什么顽固抵抗和破坏,没有发生大乱子,进展顺利,做到了

《刘少奇报告》所要求的“有领导、有计划、有秩序”。广大农民特别是分得土地和生产生活资料的贫苦农民是满意的。

这样的土地改革,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依法土改”。并不是不发动群众,而是发动群众按《土改法》的规范进行理性明智的土改。“土地回老家,合理又合法”是当时的主要口号,从而也可看到,土地是回农民老家,而不是哪一个“恩赐”的。(可是后来却大肆宣传“饮水思源”,说成是党和毛主席的恩赐,农民要感恩戴德云云,个人崇拜便在农村迅速泛滥起来。)

这样的土地改革,对于当时党和国家面临的主要任务——迅速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与国民经济——是有利的,也是符合久经战乱的中国人民的意志和愿望的。可以说,这是党领导土地革命多年以来的一个历史性进步。

当然,四个区各乡各村的工作参差不齐,或多或少存在缺点和错误。但总体来看,成绩是主要的,是不应该否定的。

下面是“反对和平土改”指示贯彻执行的情况:

首先,地委和县委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决定对全县工作重新作了如下部署:①增加一个“反地主阶级当权派”或又叫“反霸”阶段。而且“乡有乡的当权派,村有村的当权派”,要发动群众“有仇报仇,有冤报冤”,给予无情打击。这叫“从政治上消灭地主阶级”。由于真正意义上的恶霸在以前一系列斗争中基本消灭,这是矮子中间挑长子,无疑是扩大了打击面。②增加一项清算和分配地主果实的工作。不论浮财底财都要清算出来,作为“胜利果实”分配给农民。这叫“从经济上消灭地主阶级”。这样一来,打击面更大,无论大、中、小地主,开明地主,守法地主,都“一锅煮”了。③发动群众派人将逃亡在外的地主都抓回来。④各村农会都组织一个斗争委员会或叫贫雇农主席团,以加强和领导斗争。因人际关系而斗不起来的村,可调动外村外乡的积极分子去帮助。这些人几乎都是打手。⑤为了加强干部力量,将原定60个重点乡减少为46个。⑥为完成新增任务,将原计划定于1952年4月前结束土改(以便及时转入生

产),延期至年底结束。这一延长耽误了一年的生产。同时,为了防止地主破坏,县委下令13个区尚未开始土改的面上乡,限在几天之内把地主统统抓起来。对于前四个区的问题,待土改复查时解决。

这表明《土改法》和《刘少奇报告》已从上至下被抛弃;“左”倾机会主义思潮又在沉渣泛起。

“反对和平土改”贯彻到村后,各村农会很快就把地主关押。干部、土改队员和农民中的极端分子很活跃。尤其是那些游民无产者包括流氓、地痞、兵痞等,出过远门,比一般农民见识广,善于出歪点子,有的早就想在土改中捞一把,如今机会来了,他们成了斗争急先锋,穷凶极恶,特别是追浮财挖底财,更不择手段。

斗争会上打人成风,有的甚至被当场打死。为了多搞钱财,尽可能抬高阶级成分,不是地主也要划地主。强迫地主供出埋藏金银财宝地点,否则非刑拷打,昼夜逼供,什么称半边猪、吊磨



毛泽东批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草案修正稿)

盘、踩杠子、割耳朵等都用上了。普遍抄家之外，还有的掘地三尺，有的扫地出门。打死人和被逼投水、上吊的，时有所闻。有的老公死了，老婆随后自杀，留下孤儿只好交给其亲戚或愿意收养者。1951年9月全省第三次党代会，邵阳县委书记钟石在地区代表团讨论时讲到：有一个村用铁钉钉死两个地主，还钉死了一个农民；有的叫地主女人当场脱了裤子斗争，不脱就打，打了还要脱；还有的强迫地主自己挖土坑，然后把他活埋了。隆回县委书记方明说：隆回问题也很多很严重，把中农划富农，富农划地主；关押吊打，非法斗争，不少富裕中农和富农都挨斗，还出现了所谓“贫农恶霸”、“中农恶霸”。其他县情况基本相似，不把人当人，死人不计其数。由此可见当时的混乱、残暴和野蛮，简直与流寇相差无几。“和平土改”变成了暴力土改。

农会派人去抓逃亡地主，一时农民纷纷到各城市集镇去抓人，几乎造成城市工作一个乱源。当时有些地主还有起义人员住在城市或兼营工商业，从此以后，集镇的店铺全部关门倒闭，农村经济一片萧条。当时只要能搞到钱财，哪管什么破坏工商业和统战政策。

在一片红色恐怖气氛笼罩下，一般农民特别是中农和妇女很是害怕，不敢参加斗争，有的连开会都不敢来了。

有的地主收藏有古瓷器皿字画古籍等，其中不乏上品，都被抄出糟蹋，或当引火材料和卷喇叭筒烟纸烧掉，毁了多少文物，无法计算。

乱抓乱打乱杀之风还影响到当时的镇反，并出了大乱子：邵阳县七区由于非刑拷打“逼、供、信”，发生了抓捕中、小学教师百多人，打死多人，震惊全省的大错案。

上述这些暴行，哪有一点像20世纪后半叶一个文明国家执政党所领导的作为？它们所造成的混乱、恐怖、草菅人命的无政府状态，对于新生的共和国及其执政党和政府来说，无异于一场人为的灾难！而这场灾难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暴行也证明，人们在被煽动起来的冷酷残忍的“阶级斗争”中，可以异化为禽兽，人性、人道、良知、道德荡然无存。文革中发生在湖南道县、北京大兴县等地对地富反坏右逐家逐户地疯狂大屠杀，也是实例。

当年被抛弃的《土改法》，现在可能无人记得，无人知晓了。为了使人们了解其基本精神，特抄举主要几条如下：

《土改法》第二条 没收地主的土地、耕畜、农具、多余的粮食及其在农村中多余的房屋。但地主的其他财产不予没收。

这里的“其他财产”，就是指浮财和底财。《刘少奇报告》说：“根据过去的经验，如果没收和分配地主这些财产，就要引起地主对这些财产的隐藏分散和农民对于这些财产的追索。这就容易引起混乱现象，并引起很大的社会财富的浪费和破坏。这样就不如把这些财产保留给地主，一方面，地主可以用这些财产维持生活，同时也可把这些财产投入生产，这对于社会也是有好处的。”（见《刘少奇选集》下卷73页）

当年我曾听到汇报说，确实有个别地主拿着《土改法》来找干部争辩讲理，说这是毛主席正式公布施行的国家法律呀！但立即遭到拒绝，并被扣上“以《土改法》顽抗土改”的罪名。令人啼笑皆非，心情沉重！但谁也不敢依法纠正。

《土改法》第三十一条 划定阶级成分时，应依据中央人民政府颁布的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按自报公议方法，由乡村农民代表大会、农民代表会，在乡村人民政府领导下民主评定之。其本人未参加农民协会者，亦应邀集到会参加评定，并允许其申辩。评定后，由乡人民政府报请区人民政府批准。本人或其他人如有不同意见，得于批准后十五日内向县人民法院提出申诉，经县人民法院判决执行。

“本人未参加农民协会者”就是指地主、富农及其他人。他们都是共和国的国民嘛，划定阶级成分这样一件关系个人和家庭命运的大事，当事人理应亲自参加，并经一定的法律程序决定。但是，即使在四个区土改中，也只有贫雇农和中农是采取“自报公议，民主评定，三榜定案”方法，地主富农参加评定和申辩、申诉的权利都被剥夺了。这是毫无道理的。如果人家讲的有理有据，不是可以避免错划成分吗？

《土改法》第三十三条 为保证土地改革的实行，在土地改革期间，各县应组织人民法庭，用巡回审判的方法，对于罪大恶极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痛恨并要求惩办的恶霸分子及一切违抗或破

坏土地改革法令的罪犯，依法予以审判及处分。严禁乱捕、乱打、乱杀及各种肉刑和变相肉刑。

这里规定，即使是恶霸分子和罪犯都要由县人民法院依法审判和处分。《刘少奇报告》说：“对于一般地主只是废除他们这个社会阶级，而不是要消灭他们的肉体。……

地主在经过长时期

的劳动改造之后，是可以成为新人的。（见《刘少奇选集》下卷 34 页）这在前段土改中基本上做到了，并且公开宣传了地主改变成分的条件。

但是，毛泽东于 1951 年 2 月 18 日起草的党内通报关于土改的第七点说：“劝告农民以不采非刑拷打为有利。（见《毛选》五卷 35 页）一个“严禁”，一个“劝告”，两者相距多远！而且此时正是乱捕乱打乱杀的高潮，能“劝告”得了吗？又有谁敢于去“劝告”而“不怕落个‘包庇地主’或‘立场不稳’的罪名？”

关于地主成分的改变，同样具有法律效力的《政务院决定》丙部分 11 条规定：

凡地主成分，在土地改革完成后，完全服从政府法令，努力从事劳动生产，或作其他经营，没有任何反动行为，连续五年以上者，经乡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县人民政府批准后，得按照其所从事之劳动或经营的性质，改变其地主成分为劳动者成分或其他成分。……不合于上述条件，则不得改变。

这里规范了地主的改造，使其有人生的奔头，对国家发展经济和稳定社会，对其家属与子孙后代，都是有好处的《刘少奇报告》第三部分专讲“保存富农经济”，但后来都不予实行，反而把富农与地主同样看待，把“地富反坏”、“四类分子”固定为永久敌人，永不改变成分。1957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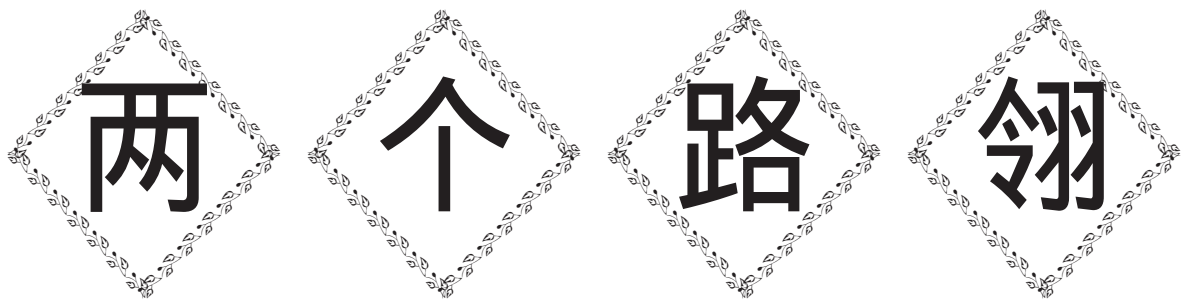
土改中，北京郊区农民召开斗争恶霸地主大会

反右后加上右派，成为“地富反坏右”“黑五类”，右派摘了帽子还是“摘帽右派”，作为不断强调的阶级斗争的活靶子，永世不得翻身。他们的亲属和后代也低人一等，备受歧视。而后又整出“右倾分子”、“三反分子”、“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派”等，层出不穷，都被打入另册，实行专政。他们的人格和尊严都被剥夺，便都不是人了！是什么呢？“牛鬼蛇神”！而且特别讲究“出身”，他们的亲属和后代升学就业等处处都受限制，以致血统遗传，祸延子孙。

《土改法》第三十四条 为保障土地改革一切措施符合于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及意志，各级人民政府应负责切实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农民及其代表有在各种会议上自由批评及弹劾各方各级的一切工作人员的权利。侵犯上述人民权利者，应受法律制裁。

《土改法》是由党政“二把手”刘少奇主持起草，经党的七届三中全会讨论，后经执行全国人大职权的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审查讨论和修改，然后交中央人民政府第八次会议通过，再由毛泽东于 1950 年 6 月 30 日下令颁布施行。这是经过许多人深思熟虑后制定的，是严肃的、郑重其事的。

但是，“反对和平土改”部署了相反的一套，下面做检讨都来不及，谁敢自由（下转 30 页）



● 桂向明

记得是 1987 年的夏天，我去北京看望绿原夫妇，却没有请他们引见渴慕已久的小说家路翎，和这位稀世天才失之交臂。

上个世纪 50 年代初，路翎从朝鲜前线回来，写出多篇受到读者喜爱的小说和散文，掀起一阵“路翎热”，接着是来自指导家的粗暴批评。我当时在驻武汉部队的一个机关供职，匆匆草成为路翎小说《洼地上的战役》辩护的文章，题目就叫《一部保卫和平反对战争的有力作品》，先请诗人曾卓审读，他一口气看完，说基本同意我的观点，要我将稿子寄给在北京的绿原，让路翎也看看。不久，反胡风运动开始，这篇没有刊出的文稿成为我的“罪证材料”，塞进本人分量已经不轻的档案。后来知道，周恩来曾指示胡乔木，应该把路翎这样有才能的青年作家提拔到领导岗位上。但路翎遭到不公正对待，先后两次入狱，在高墙内苦苦熬过 20 个春秋。

路翎出狱，当了四年半扫地工，他又一次拿起笔来，张业松先生说，路翎是在一种几乎将自己彻底与外界（包括家人和难友）隔绝开来的状况下从事其与时间赛跑、与自我搏斗的创作活动的，也许只有这样，他才能够保证在写作过程中将其自我向自己的内宇宙彻底敞开，重温往昔追风逐电、狂飙激荡的激情体验，逼迫自己保持高昂的写作热情（见《路翎晚年作品集·编集说明》）。让人揪心的是，路翎晚年作品总量不下于 550 万字，光长篇小说就有《江南春雨》、《野鸭洼》、《吴俊英》、《陈勤英夫人》、《乡归》、《早年的欢乐》与《英雄时代和英雄时代的诞生》，竟无一部问世，主要原因是达不到发表水平。于是有了这种说法，新诗是路翎晚年创作的最高成就，这话隐藏着某种悲哀，路翎因小说扬名于世，

有人以托尔斯泰期望他的将来。

路翎的遭遇已经成为世纪之问。

想当年，他凭一支生花妙笔不时引起文坛的惊异和赞叹——

邵荃麟：中篇小说《饥饿的郭素娥》充满着一种那么强烈的生命力！一种人类灵魂里的呼声。这种呼声似乎是深沉而微弱的，然而却叫出了多个世纪以来在旧传统磨难下的中国人的痛苦、苦闷与原始的反抗，而且也暗示了新的觉醒的最初过程。

胡风：时间将会证明《财主底儿女们》的出版，是中国新文学史上一个重大的事件。（到 21 世纪初《财主底儿女们》已入选人民文学出版社隆重推出的“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引者注）

聂绀弩：出了路翎这样的天才，我再写小说还有饭吃么？

杜高：不停歇地写作，当剧院刚刚否弃了他的一个剧本，他又交出了第二个。当人们正忙着打印、传阅、提意见、组织讨论时，他已埋头在第三个剧本的写作中了。

巴人：小说《初雪》是表现了生活的最高真实，那应该说，就是诗。

李辉：他挥笔疾书。4 万多字的文章短短几天里一挥而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批评？》，他要质问，他要发言。

曾卓：他的手曾经握笔写出了几百万字震撼人心的作品，现在他却以手在清扫着小巷了。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文章高手终于“江郎才尽”，即使进入最佳创作状态，路翎告诉朱珉青：“我正在写一部长篇小说，现在不给人看，等写好了看，你会大吃一惊的。”），他也拿不出一部

惊世之作。

1982年,路翎应《中国现代小说史》作者杨义之约,写了关于自己的简传资料,第一段有这样的文字:“我于1923年1月23日生。南京人。父亲姓赵,经商,死得早,我过继给母亲徐丽芬。继父张济东。公务员小资产阶级生活,经常我继父任职务会计员等。”我揉揉眼睛,怀疑自己看错了,之后又发现诸如“解除部分问题”、“她在地方街道工厂当女工工作”等语句,杨义客气地说“有些文字不甚顺畅”,其实是病句,走笔至此,我不禁悲从中来,是谁把一个进入世界视野的天才作家降低到小学生水平?又是谁夺去路翎手中的笔,给他一把清扫街道的大扫帚?

冀访在《哀路翎》一文中写道:“在人生悲剧中,你的遭遇比你的任何一位朋友都要凄惨。1955年那场‘非人化的灾难’(朱珩青语),将你一个人变成了一生两世:第一个路翎虽然只活了二十二岁(1923—1955),却有十五年的艺术生命,是一个挺拔英俊才华超群的作家;第二个路翎尽管活了三十九岁(1955—1994),但艺术生命已消磨殆尽,几近于零,是一位衰弱苍老神情恍惚的精神分裂患者。”

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一个优秀作家被长期打成“反革命”,而且改造得如此彻底,先前的路翎“下笔千言,倚马可待”,现在却不会写作。李辉先生对此作了精当的分析:“我不能不承认这一残酷现实:那个当年才华横溢创作《财主底儿女们》的路翎已经不复存在。很明显,他的思维、心理状况,已不允许他架构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这一形式。同时,他的语言方式,也难以摆脱年复一年经历过的检讨、交代的阴影,大而无当或者人云亦云的词汇,蚕食着他的思维,蚕食着他的想象力。”(引自《序:灵魂在飞翔》)扫地工是辛苦的,路翎笨手笨脚却精如绣花,每天凌晨3时出去,总要到近晌午11时,方才一身泥土、一脸疲惫,蹒跚而回。在许多朋友的记忆里,路翎是一个美男子,胡风则说他是通体放光的作家,但到1979年,作家兼画家周翼南见到的扫地工路翎,让他想起小说《红岩》中装疯的华子良。在路翎身上发生的巨大变化,大概只有“异化”这个词能够解说。有一个不同寻常的细节相当生动和准确地反映了路翎复出后的精神风貌,那是

1986年11月,在一次小组会上,路翎一直正襟危坐,非常严肃,他抓住一个空当,抢先发言,说的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套话,说完就像学生交上考卷一样,立刻显得轻松了,自在地伸直双腿,不断交替用一只鞋尖磨擦另一只鞋后跟。而在二十二年前,也是11月,胡风和路翎参加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主席团联席会议,二人一唱一和,真可以说语惊四座,用胡风的话说:“会后反映好,打动了人;一般都隐隐承认了宗派主义是事实。”两个路翎是何等不同啊!

和聂绀弩不同,路翎没有聂公超世不凡的态度,也不像他那样放纵任性,随遇而安,一句话,路翎过于执着,是一个没有半点弹性和弯度的人,他的悲剧是时代的,也是个人的。也许可以从小说《拌粪》里的一个人物揣测作者路翎的心路历程:“太阳很毒、很亮,李顺光的心里很苦、很辣,从上高中的时候起,他就立志要奋斗、要入党,可他奋斗的结局是什么呢?反革命!他万万没想到,也万万想不通。”既然“万万没想到,也万万想不通”,我们心爱的作家只能发出难友们听习惯了的那种“一直不停地、频率不变的长嚎”,这长嚎我们并不陌生,请读鲁迅夫子《孤独》中的一节描写:“……忽然,他流下泪来了,接着就失声,立刻又变成长嚎,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令人不解的是路翎回到亲人身边,每天都要无缘无故地嚎叫几次,有时他意识到就要嚎叫了,便急忙忙跑到户外,嚎叫过了再回来。

“千古文章未尽才”,朱珩青撰写的路翎传就以《路翎——未完成的天才》为书名,北大教授钱理群甚至呼吁:“如果我们有勇气的话,应该把路翎的著作(包括晚年所写那些难以发表的长篇小说)全部出版,留给后人一个完整的遗产。”胡风却别具只眼,他把路翎推向曹雪芹和鲁迅的高度:“就算到1955年,路翎也是世界文学上的人物。时至今日,路氏的长篇巨著《财主底儿女们》、中篇小说《饥饿的郭素娥》和《洼地上的‘战役’》、剧作《云雀》等,已被公认为属于新文学史上的经典名作之列。”

路翎不朽!

(责任编辑 吴 思)

岂有文章倾社稷 从来佞幸覆乾坤

——广东省委原书记吴南生访谈录

● 关 山

2006年的夏天，在广州市东山湖畔一间挂满书法作品的寓所客厅里，满头银发的吴老向笔者打开了话匣子。

敢说真话的人是最值得尊敬的

关山（以下简称“关”）：吴老，大家都知道您是上一世纪50年代广东省委的宣传部长，打倒“四人帮”后，“重出江湖”担任省委书记，知道您有许多动人的经历，但具体情况不太清楚，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吴南生（以下简称“吴”）：可以。只怕一说就很啰嗦。我1922年8月出生于广东省汕头市，1936年参加革命，1937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38年当中共汕头市委宣传部长，以后当过中心县委宣传部长，当过几年县委书记，1944年经重庆赴延安中共中央党校二部学习，部主任是张鼎丞。中央党校校长是毛泽东，副校长是彭真。后来，有人跟我们开玩笑说：“呀，你们是‘天子门生’啊！”“天子门生”谈不上，但在改革开放后，彭真同志来广东，省委的同志们和他共进晚餐，我和罗天同志恭恭敬敬地向他敬酒，说：“彭真同志，我们都是您的学生！”

我是从心底敬佩彭真同志的。他在1966年4月16日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敢于对毛泽东同志讲真话，5月4日与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被定为“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名列第一，直到1979年2月17日才被宣布彻底平反，被囚禁整整13年，置生死于度外。敢说真话的人，是最值得尊敬的！

我们都是共产党的“孝子贤孙”

关：您是怎样去延安的，有关延安这段往事，能给我们讲一点吗？

吴：我是1944年由南方局安排经重庆到延安的。到重庆后，我们住在红岩八路军办事处里，平时门都不敢出，因为办事处坐落在红岩的半山腰上，左右两边通往市区的道路都被国民党特务把守着。住在红岩里的人是都要报户口的，工作人员是常住户口，我们就要报临时户口，没户口一查出来就会被抓起来。于是都报。我被说成是八路军一个师参谋长的儿子，爸爸姓陈，叫什么名字我忘了，当时报临时户口的人都被说成是谁的儿子、谁的女儿。

那时，党中央常常派代表到重庆和国民党进行谈判。趁着谈判形势相对缓和的时机，办事处会安排一批大卡车护送干部和医药、无线电器材等到延安。我们就是趁林伯渠、王若飞到重庆谈判时进延安的。在去延安的路上，国民党特务多次来点名核对身份。其实他们也知道这都是假的。当时给我们训话的国民党军官就大声训斥讽刺说：“你们都是孝子贤孙。万里寻亲，哎呀呀，真是孝顺呀！快去找你们的爸爸去吧！”

他算说对了，我们的确都是共产党的“孝子贤孙”。

关：后来呢？

吴：到延安后，我先在中央组织部临时工作了一段时间，接着去了中央党校学习。当时的延安“抢救运动”已经结束，“甄别工作”（类似

“落实政策”)也进行得差不多了,我在1937年前后认识的几位老同志,他们作为“七大”代表,1939年从广东到延安,也都被“抢救”!这令我非常惊奇,义愤填膺。但我到延安时,“抢救运动”大多已被当成笑话,另一种气氛正在不断上升。

自由思想大会

关:什么气氛?

吴:实事求是的气氛、自由的气氛、令人振奋的气氛。

当时中央党校有六个部,每个部都有几百人,大多住在山上窑洞里,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山头。我所在的二部有十二个支部,占据了延河边长长的一排小山头。我们第七支部住在最高的一座山上,上下山到饭堂来回要走333级黄泥台阶。七支部的学员都是男的,所以我们就把这座山取名叫“五台山”。离我们不远处的小山包上住着十二支部,他们女同志多,我们就开玩笑地叫它“桃花山”。在延安生活,是有许多很有趣的故事的。

党校的学员都是来自全国各个地区、各个历史时期的干部,可以说是民意党心最集中的地方。“七大”三个报告的稿本,都在党校的学员中阅读,一次又一次提修改意见。

因为“七大”将要召开,不断有许多新的消息、新的政治理论观点传来,人们的思想很活跃。当时,在党校还举行“自由思想大会”,学员们自由报名上台发言,可以在大会上点名批评从地方到中央的负责人,也可以上台公开做自我批评。据我所知,除毛主席以外,包括刘少奇同

志在内,都在大会上被指名道姓地批评过。这确实是很振奋人心的。

但是,这对于缺乏民主传统、民主知识的中国人——包括我在内,却造成一种错觉,认为这就是“民主”。而不懂得民主是一种政治制度,有明确的内容和深刻的内涵。

20年后,即1966年,当“十年浩劫”刚刚开始,毛主席提倡“大民主”时,我还以为是指像当年党校这种“自由思想”大会呢。

在延安时,毛主席老人家不断讲民主。1944年秋天,他和美国中印缅战区司令兼蒋介石参谋长史迪威将军的政治顾问谢伟思(美国人)谈话时,就特别强调希望“每一个在美国的士兵都应当成为民主的活广告。他应当对他遇到的每一个中国人谈论民主。”谢伟思说:“美国的军队是不允许从事政治宣传的。”老人家还是强调说:“即使你们的美国士兵不做积极宣传,但只要他们出现并同中国人接触,就会产生好的影响。”毛主席还说:“昆明是一例子,那个地方已经变成自由主义思想和学生自由活动的中心了。”

毛主席老人家还向谢伟思特别强调:“我们的经验证明,中国人民是了解民主和需要民主的。”至于1945年7月,老人家与黄炎培的谈话:“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更是鼓舞人心,令人



1979年冬,叶剑英、邓小平在广州接见广东省干部,和叶帅握手的是吴南生

钦佩不已。

当时,中国共产党不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延安,政府的领导人都实行普选,一些党政部门领导也实行竞选。1946年,我在赴东北途中到张家口,被截留下来在市委工作。张家口曾经是察哈尔省的省会,是抗日战争中第一个被八路军解放的中等城市,当时就实行民主选举,连市委书记都上街去演说,参加竞选。北平的大学生都成群结队地跑来看,他们非常兴奋,说共产党与国民党确实不一样,都拥护共产党,不少人就不回去留下来参加工作了,人心向背一目了然。

我就在这时认识邓拓同志。当时,他是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晋察冀日报》社长。我被中央局留下,待如上宾,要我筹备出版张家口报。在人生的征途上,常常会撞到这种“缘分”。

不久,中央就一再来电,明示去东北的干部一个也不能截留,要尽快把他们送到东北。于是,晋察冀中央局重新组编队伍。在延安出发时,我是党校大队中的一名小队长。这时,组织上决定新组成一个独立中队,由杨第甫同志和我带领。还给了个特别任务:带上萧军同志。并再三交代要好好照顾他,准备他去主持东北大学。谁都知道萧军的脾气很大,但我们一路相处得很好,他没发过一次脾气。

因为国民党军队已占领了锦州,我们只好改道赤峰,但战争情况一再变化,队伍三进三退赤峰,最后,从赤峰向西北,经过内蒙古大草原,到达白城子,总算是进了东北的地界了。从白城子到吉林延边地区——中共吉林省委所在地接受分配工作,已经是1946年10月。从延安出发,在路上将近一年,距离今天已整整60年了!你说,人怎么能不老了呢?老话就不说了吧。

义无反顾请缨办“特区”

关:深圳、珠海、汕头三个经济特区的创办是改革开放初期的大动作,能不能讲讲这一段历史?

吴:1979年初,省委(广东)分工我到汕头传达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在那里呆了两个多月时间。汕头是我的老家,是一个开放比较早的城

市,连恩格斯的著作里都写到这一点。解放初期,汕头还是个繁荣的地方,和香港差不多。30年过去了,我看到的汕头破败不堪,比我小的时候还穷一些。那段时间我是吃不下睡不好,我们当年拼命闹革命,可不是让老百姓越过越穷,我们真是有愧于那些流血牺牲了的先烈,有愧于当年出生入死支持革命的父老乡亲啊。我不禁想起叶帅多次对我说的话:南生啊!我们的家乡很穷啊!你们有什么办法没有?快想想办法,把经济搞上去!

我50年代曾参加过香港部分工作,在海外有许多爱国朋友,我向他们征求意见,其中有一位对我说,你敢不敢办像台湾那样的出口加工区?新加坡、香港那样的自由港?如果敢办,你们的经济肯定会很快上去。听他这么一说,我恍然大悟,忙去征求汕头地委和乡亲们的意见,他们都举双手赞成。

1979年2月21日深夜,这个日子我记得很清楚,当时虽然感冒发烧,但“心潮澎湃”,连夜迫不及待地把我的设想给广东省委发了一份长达1300字的电报。2月28日我从汕头回到广州,晚上,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同志就到我家,我又详细地汇报了我的想法。他说,我赞成,过两天开常委会议,你讲。3月3日,在省委常委会议上,我又谈了我的看法,我说:“先走一步”。如果省委同意,我愿意到汕头搞试验,如果失败了,要杀头,就杀我好啦!当时常委们都表示赞成,省委在这个问题上意见是一致的。习仲勋还当即表态:要搞,全省都搞。要求先拿出个意见,他4月份到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时,带去上报中央。

当时,叶帅在广东,我和仲勋同志去向他汇报,叶帅很高兴,很支持。老帅是第一位支持办特区、也是第一位视察深圳(1980年4月)、珠海特区(1981年2月)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是他亲自主持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决定公布的。

4月1、2日,在杨尚昆同志的主持下,省委讨论了给中央的报告,要求允许广东“先走一步”。明确提出要在深圳、珠海、汕头划出一定范围的地方,进行试验,但名称一时还定不下来,叫“出口加工区”,会与台湾的名称一样,叫“自由贸易区”,又怕被认为是搞资本主义,叫“贸易出口区”,却又不像,想来想去,只好临时安一个

“贸易合作区”的名称,写了报告给党中央和国务院。

关:名不正则言不顺嘛!至于讲到特区名称的由来,我2004年率《永远的春天——邓小平与广东改革开放》采访组采访谷牧同志时,他倒讲得很清楚。

吴:是的,谷牧同志最清楚。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谷牧向小平汇报说,广东提出“先走一步”的设想,但对深圳这些地方,不知定个什么名称才好。小平很赞成“先走一步”的做法,说:“就叫特区嘛,陕甘宁就是特区。”

关:是呵,谷老说,当天傍晚他在中南海散步又碰到小平同志,小平同志说:谷牧,上午给你讲的,记清楚了吧!就叫特区,不要改了。谷老说:明白了。当天晚上就打电话告诉了习仲勋、杨尚昆。

吴:谷老说的是事实。至于流传很广的小平同志1979年4月说的那三句话:“就叫特区嘛,陕甘宁就是特区。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搞。要杀出一条血路来!”并不是他一次一下子讲的,是我综合起来讲的。2001年底,我写的《真实的历史——“敢闯”的记录》一文中说得很清楚。

还要再讲一句,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是华国锋同志主持的。1979年5月3日,习仲勋同志在省委常委会议上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时说:“我讲的华主席很重视,政治局很重视,紫阳同志也很支持。”又说:“华主席说,要进行体制改革,广东可以搞一个新的体制,试验进行大改革。”这是历史,应该实实在在记下来。

南生,你去当中国的孙悟空吧

关:您兼任深圳市委第一书记是什么时候?

吴:197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中发[1979]50号文件,批准了广东、福建两个省委的报告,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创办“出口特区”。当时还未叫经济特区。将“出口特区”改称“经济特区”,是1979年12月我到北京向中央汇报建立特区工作时提出来的,被中央采纳确定下来。



1983年春,胡耀邦和吴南生在深圳经济特区

1979年9月,谷牧同志到广州与我们省委负责同志座谈时说:“办特区,就看你们广东了,你们要有点孙悟空大闹天宫的精神。”仲勋同志当场就说,南生,你去当中国的孙悟空吧。本来在省委分工中,我就是分管特区工作的,因此,省委决定我兼任广东省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主任,兼任中共深圳市委第一书记、市长。

关:啊,那后来金猴是如何奋起千钧棒的?

吴:筹办特区要做的事情很多,但最重要、最紧迫的第一件事就是研究、起草特区《条例》。这个只有2000多字的条例,从起草到公布,却用了一年的时间,作过13个草案文本。当时不少海外朋友对我说,你们中国没有法,无法可依,无规可循,外商哪敢来投资。对这第一件大事我是抓得很紧的。《广东省经济特区大事记》中记载:1979年7月15日,中央、国务院决定试办出口特区。8月15日,由省委书记吴南生主持,邀请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院、省委党校、中山大学、暨南大学部分学者起草特区条例,8月21日又邀请港澳经济界及有关人士45人举行座谈。

特区是要同国际市场打交道的,没有法,那不是开国际玩笑!可我在这方面一点也不懂,其他人也不懂,国内无法无天几十年了,老人家就



1984年春,邓小平视察深圳、珠海后回北京时,与吴南生等合影。
前排左起:吴南生、马万祺、邓小平、马万祺夫人、卓琳

说他是“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怎么办?还得请海外朋友帮忙。当时主要是通过香港南洋商业银行董事长庄世平先生、香港《大公报》社长费彝民先生等老朋友,收集世界各地出口加工区和自由贸易出口区的资料。我们对这些收集来的海外许多有关的法规进行了分析研究,适用的就照搬过来,要修改的就修改后再用。印象最深刻的是关于“地租”的问题。

有人说,我们是社会主义,打倒了地主,怎么又要收地租呢?后来我们就改称“土地使用费”,大家都觉得很好,很社会主义,反对的人也没有意见。说“地租”就不行,中国人很重名分的!其实,解放以来,我们在社会主义的名分下干了多少非社会主义甚至反社会主义的东西,在马克思主义旗号下干了多少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像“十年浩劫”,你说,那是什么东西啊!

特区条例公布后,当时深圳最严重的问题——大量外逃现象突然消失了,当时我们感到很意外,也很高兴,这说明我们改革开放、办特区的政策对路啊!

严峻的1982年

关:遇到了什么困难和阻力吗?

吴:那多着呢!由于长期的闭关锁国和“左”的思想影响,当时从中央到地方,对试办经济特区,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疑虑很多、阻力很大,有人对这一创举和试验,诸多非议,专挑特区的毛病。

1982年春,冷空气大量南下,什么《旧中国租界的由来》、什么《经济特区成了走私的通道》,什么“特区不是社会主义”等等,没完没了!尤其是国家计委专门召开半个月的会大批特批深圳,更是杀气腾腾!2月11日至13

日,中央召开两省会议(广东、福建),两省的常委都到北京参加会议,这是历史上很少有的。会议气氛非常严肃。开了一次,不行,又再开一次。我开玩笑说:“二进宫!”这个词,大家都觉得有趣,都用!这些,不少报刊都有披露,我就不多说了。需要说的只是:主持会议的耀邦、紫阳都心中有数,都是支持特区的。

特区最大的贡献是引进了市场经济

关:作为广东经济特区的主要拓基者,又是深圳经济特区的第一位“行政长官”,您认为特区对中国改革开放最大的贡献是什么?

吴:引进了市场经济,使中国经济进入了世界经济大循环。我认为这是特区对中国最大的贡献,也是特区之所以成功的根本原因。

当时别人明白不明白我不知道,但我心里很明白,办特区,就是要改掉那种苏联模式、自以为是计划经济,走市场经济的新路。我们在1980年底即特区条例经全国人大批准公布后,就明确

提出：特区要以引进外资为主，以实行市场经济为主。面对各种非议，面对当时重重阻力和压力，我和我的同事们有过“约法三章”：只做不说，多做少说，做了再说。总之就是一句话，要趁那些反对办特区的人糊里糊涂弄不清楚看不明白的时候把经济搞上去再说。

要知道，当时全中国都还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搞市场经济就等于搞资本主义复辟，罪大恶极啊！谁能想到，20年后的今天，我们中国却要求人家承认我们是市场经济国家。这种变化实在是太大了！

关：是啊，当时那么多“左”的思想，人民群众中也还有许多模糊不清的概念，你们当时有没有过犹豫？

吴：小平同志说，深圳的精神就是“敢闯”。从创办特区中我们深深体会到：要从事这项巨大的改革开放工程，在实际工作方面要有勇气，在理论思想上也要有勇气。没有两方面的勇气是“闯”不成的。

广东的理论工作者和各方面的学者们很支持改革开放，在理论工作方面做了许多研究。前面说过，1979年8月15日，我已邀请广东的多位学者一块研究特区条例，同时座谈、研究有关改革开放的理论。要闯过这一关，只好向老祖宗求救。1980年4月14日，我在向省人大常委会作《关于我省设置特区和制定特区条例的问题》的报告中，曾非常明确地讲出我们的观点（即广东理论界的观点）。

这是我们25年前的论点：

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从来都不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是绝缘的。按照马克思原来的设想，社会主义经济应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充分发展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将批判资本主义的不合理的因素，同时继承它的合理因素，并利用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物质财富来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但是事实上，首先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俄国，却不是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所以，列宁特别强调要吸收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和有用的管理经验。列宁讲过：“要乐于吸取外国的好东西：苏维埃+普鲁士的铁路管理制度+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总和=社会主义。”

（《列宁文稿》第3卷）

你看，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把“托拉斯组织”作为帝国主义的经济基础，而在这时，却把它作为“外国的好东西”吸取进来，成为构成“总和=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十月革命后，在俄国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过程中，列宁的思想前后有什么变化，我们没有再去研究，但从他这段话即“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内容来看，肯定不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

有了这些理论上的准备，我们才有勇气面向“左”派的挑战。“约法三章”也是因为有了理论勇气，对那些吵吵嚷嚷“不去跟他们一般见识！”“好！你正确”，你表演吧！我就不开口，你要吵就自己吵吧！我只做不说”。你能怎么样？

胡乔木同志谈经济特区的性质

关：据说胡乔木同志对经济特区有不同的看法？

吴：我手头存有24年前胡乔木同志谈经济特区性质的记录稿，原文如下：

1982年12月18日下午四时三十五分至五时三十分，乔木同志来蛇口工业区视察，交通部顾问潘琪同志当面向乔木同志请教了当前理论界和在总结蛇口工业区经验中所遇到的几个理论问题：1、我国经济特区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或是资本主义的；2、特区的经济管理体制是以计划经济为主还是以市场经济为主；3、对外来投资者的方针是否还是限制、利用、改造或采取什么新的方针等问题。乔木同志看了潘琪所递交的这几个问题后说：“你提的这三个问题都很大。”在他参观完毕将要离开蛇口工业区之前，向潘琪同志和陪同的其他同志，就特区的经济性质问题，谈了如下看法：

乔木同志说，特区的性质问题，恐怕不能说是社会主义的，因为如果说是社会主义的，那么全中国都可以建立特区了。特区要按特区的口径，那是区别于社会主义的，不然就不叫特区，恐怕还是国家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国家里面的一小片国家资本主义。本来列宁也没有搞什么全国范围的国家资本主义，我们跟他们的情况、条件更不同。但说成是社会主义的，这就更不好办了。

(梁湘同志说,但公开不公开讲是国家资本主义呢?)这个问题,公开讲不公开讲要看必要,就是在什么问题上,在什么时候,有这个需要才去讲,没有这个需要去讲干嘛!(梁湘同志说,我们内部要说清楚。)还是社会主义领导下,社会主义国家里面的国家资本主义。我们的国家在社会主义经济里面还有个个体经济嘛!就是这种关系。至于我们这些人当然是共产党,烧成灰也是。(梁湘同志说,因为文化大革命中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问题还是有精神压力的。)当权派嘛,还是社会主义的当权派。

我很尊敬乔木同志。他是我们党和国家著名的理论家。1960年初,他带领中宣部20多位同志来广州,编辑《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住了一个多月。同来的还有康生。我作为主人一直陪同。期间,我还陪他到深圳,这是他第一次到深圳。从那时到1982年已是22年过去了。这次可能是他第二次到深圳。

1982年秋天,我得了“心包炎”,病情较重,本来要去参加十二大,也去不成了。乔木同志来,我不知道。他到深圳由梁湘同志陪同。梁湘是一位很率直、很实干的老同志。他比我们晚到深圳,对创办特区早期吵吵闹闹的事不清楚,也不知道有“约法三章”这些事,所以就问了乔木同志特区的性质这一类问题。事后,他赶紧把记录送给我看,问:“……他说不是社会主义呵,怎么办?”我说:乔木同志的意见是理论探讨的意见。理论问题,有时几十年、几百年也说不清楚。如果我们不问,他不会说。问了,他不好不答。但他也还会再观察、再思考、再和大家——至少要和我们讨论的。不是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吗?我们才开始实践,不急于去讨论这些问题。

其实,前面讲过,1979年我们已集中多位理论工作者开始研究探讨过这些问题,我心中有数,不想再去问别人了,以免引起争论,一争论起来,没完没了,什么事也做不成。

一下子,又是24年过去了。现在的深圳与当年完全不一样了,似乎全中国20多年来走的路,和深圳是大体相同的,那么我们的国家又是什么性质呢?

我一直认为:列宁在十月革命后,从俄国的

实际中已经发觉许多问题,他认为,把世界上一切最好的东西包括美国的托拉斯(当然只是指这种经济形式)都加在一起就是社会主义,这是不无原因,也是很有道理的。

1918年5月5日,他在《论“左派”幼稚病》一文中指出:“只有那些懂得不向托拉斯的组织者学习就不能创造或实行社会主义的人,才配称为共产主义者”(《列宁全集》27卷324页)。1922年11月5日,他在答记者时说:“我们是否会倒退到什么‘封建主义’之类的时期去呢?无论如何是不会的,因为我们是沿着国家资本主义的路线前进,……这是一条引导我们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最高阶段)的路线”(《列宁全集》33卷365页)。

我们看看列宁这些话,会更多地去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我曾经开玩笑说过,如果再搞一次“文化大革命”,再来一次“路线斗争”,列宁一定会成为再一次路线斗争的“头号走资派”。

非常遗憾的是,不久,列宁就逝世了。

在这之后,斯大林搞的社会主义和列宁设想的是不一样的,他那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和无比专权的“个人迷信”,已经被历史的实践一再证明了是假马克思主义,是假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是人类共同的财富

关:我是从事理论工作的,但竟不知道广东的理论工作前辈们在改革开放中做了这么多的工作。

吴:是啊,这已是25年前的事了!

关:25年是四分之一世纪了,一定会有许多体会吧?

吴:体会?谈不上。不过,也常常会回顾过去的岁月,思考一些问题,有时,也有一点想法。例如:关于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问题。我认为,它们都是人类在社会实践中得出的经验,是人类共同的财富。它们都不是专属于哪一个阶级的。什么叫文明?这就是文明。

关于市场经济,还有一个必须不断规范的问题,但这已是属于实践中的问题了。从理论上进一步探讨、分析和确定对市场经济的认识,这是

中国理论界的历史任务,要下点苦功夫,不是给它戴上一顶“社会主义”的帽子就能解决得了的。

民主政治的问题,它涉及深化改革的问题,涉及我们的改革是只进行经济改革并取得了成就,因而就此止步呢,还是要继续深化,进行政治制度的改革呢?

前面讲过,延安时期,毛主席他老人家是不断提倡民主的。他对“自由”也讲得非常精辟。在“七大”的政治报告中,他说“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这几项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这完全符合《共产党宣言》中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的描述:“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恩格斯直到晚年还一再强调,这段话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信条。老人家在“七大”的开幕词中号召全党要“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为了建立这样的新中国,千百万人前赴后继,血流成河,人们应当永远记住这段历史!应当记住毛主席他老人家带领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的伟大功绩!

关:从“七大”到现在,已经整整61年过去了!

吴:是啊,在“七大”闭幕的35年后,即1980年8月改革开放刚开始时,小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这是一篇具有历史意义的讲话。小平同志说:“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达到上述三个要求,时间有的可以短些,有的要更长些,但是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我们能够也必须达到。所以,党和国家的各种制度究竟好不好,完善不完善,必须用是否能利于实现这三条来检验。”他还说:“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要记住,这是小平同志说的,是他亲自听毛主席他老人家说的。所以小平同志很遗憾地说:“他虽然认识到

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是“十年”啊!是“浩劫”啊!是在斯大林问题被暴露、被批判的十年后发生的,同样是以“个人迷信”为特征表现出来的。你说,这是什么问题?

“痛定思痛”的真话

关:小平同志的这一讲话,我看过。是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确实是一篇历史文献。

吴:是的。小平同志经过“十年浩劫”,眼见他同时的战友一个一个含恨远去,他自己又经历生死难料的两次大落大起,经过举国上下激烈开展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辩论,他痛定思痛,作出了这样历史性的讲话。这也是用实践来检验真理后作出的讲话。是“痛定思痛”的真话!你注意到吗?他讲话的时间是1980年8月18日,政治局讨论通过这一讲话时间是1980年8月31日。最巧合的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和公布《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时间是



1996年吴南生(左)陪杨尚昆视察汕头经济特区

1980年8月26日。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大起动的
时间啊！这也都是25年前的事了……

25年,是四分之一世纪啊！现在,我们回
过头来看,小平的三条要求,实现得怎样？这三条
要求的本质又是什么？

第一：“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
家”。2005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8万亿
元,是1978年3600亿元的50多倍,应该说,我
们在经济领域中的改革工作是有成效的。当然要
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还要作很大的努力。
但我们已形成了新的生产力,它正在迅速发展,
为了适应这一新发展,它正向我们提出强烈的要
求,这要求就是小平所说的第二条要求：“在政
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更高更切实的民主”。
至于第三：“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
的人才”。这也是正在发展中的生产力的要求。

恩格斯说过：“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
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自然辩
证法》)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生产力总是
最革命、最活跃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
是始终存在的,如果得不到正确的解决,就要阻
碍生产力的发展,就要引起革命。苏联解体、东欧
巨变,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的上层建筑与经济
基础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阻碍了生产力的发
展要求。苏联、东欧解体以后,经过这么多年的观
察,问题更加清楚了。如果我们党没有在十一届
三中全会上提出改革开放,没有试办经济特区、
广东先走一步,没有把市场经济引进来,并经过
差不多十年时间,把计划经济改掉了,把不适应
生产力发展要求的那一部分上层建筑改掉了,也
有亡党亡国的危险。

从国际上、从我们自身的实践,历史的经验
都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要重视科学社会主义理
论的指引,按照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改革我们的
政治体制,改革那些不适应于生产力要求的上层
建筑。

在这里,我想要特别强调的是:要警惕那些
已进入市场或可能要钻入市场的权力,警惕那些
与管理意识形态有关的权力。进入市场的权力之
危险,尽人皆知。贪污腐败的不断发生,矿难的不断
发生就足以证明这点。对管理意识形态的有关
权力,人们可能还认识得很不够,要特别注意改

革。因为这些“权力”会影响或造成错误的理论、
条文、规定、措施,甚至某种“人见不得”、“见不得
人的权力行为,在“上层建筑”的反作用下起着
破坏和阻碍生产力的作用。建国后,意识形态领
域是“左”祸的重灾区,多次有关政治、理论、文
艺等意识形态的“运动”所造成的历史错误,给
了我们沉痛教训,尤其“文化大革命”时期,那种
错误理论加权力“江青+康生”模式所起的破坏
作用,大家都是亲身经历了的,是万万不可再重
复的！

权力和资本都是无限地扩张的

再多说几句。要知道,权力和资本都是无限
地扩张的。资本的贪婪,尽人皆知,这不属于我们
今天要谈的问题。而“权力使人腐化,更大的权
力使人更多地腐化”这一警句,是古今中外有无
数事实可以证明的。只有民主政治是限制权力无
限量扩张的政治制度。所以,毛泽东说,像斯大林
那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
能发生”。但是,不从制度上解决,在他的晚年又
再次发生了。所以邓小平说,要“在政治上创造
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也
就是说要用高度民主的制度来保证国家不走邪
路,长治久安。我们不是天天都在说“稳定”吗？
这才是真正的稳定。两位老人说的两个社会主义
大国的沉痛教训和解决的办法,难道到现在我们
还听不懂吗？

要重视民主的共性

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国家
的民主应该有什么区别呢？

吴:每个国家的民主制度都有自己的特色,
都不可能是完全相同的,就像你不能找到两个一
模一样的人那样。毛主席老人家说的“英、法、
美”就不一样。但他们都有共性、一般性和普遍
性。也就是说,在民主这个概念下,不管是什么民
主,只要是民主制度,就都是大同小异,形式和枝
节上可能不同,但本质是相同的,否则,小同大
异,对民主各有各的说法,各有各的表述,那不乱
了套,那还有什么意义？

关：那你认为应当怎样表述才是比较准确呢？

吴：我认为，小平的讲话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那就是“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共性：民主政治；个性：比资本主义国家更高更切实。我想，没有什么解释能比他这句话概括得更好。

政治体制改革第一步我想应该是开放舆论

关：政治体制改革应该怎样进行才好呢？

吴：我是个积极主张改革的汉子，但我又是一个改良主义者，主张改良，不主张翻天覆地的革命。我认为，现在的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进行这场改革，一直改革到实现马恩所说的未来的社会那一崇高的目标，也就是改革到自己也消亡了。没有这种勇气和决心，就不是共产主义者！但如果搞什么“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搞什么“翻天覆地”，我也一定坚决反对到底！

办法是：逐步放开，逐步地提高民众的社会承受力，提高人民的理性，逐步地加大改革的力度，直至实现民主的目标。目标是唯一的，但具体的途径则不是唯一的。可以用办经济特区的经验，突破一点，带动全局。

我个人认为，政治体制改革第一步应该是开放舆论，这一方面可以发挥舆论监督作用，这在中国目前权力制衡不到位，法治不健全的情况下尤为必要；更重要的是在于开放舆论可以开启民智，开启官智，通过心平气和的理性讨论和意见交换，就民主化的利弊、目标、程序、时间表等种种具体问题展开充分的讨论，以达成基本共识，中国的民主转型就可望避免不良势力的扰乱，事半功倍，以较小的代价争取最大的成效。

我们有些官员，一听到“舆论监督”就脸色发青，少数或很少数人还“心怀愤恨”。这都是由于缺乏“民主锻炼”的结果。这种情况必须改变，



叶仲勋、吴南生向叶帅汇报经济特区工作

所以说还有一个“开启官智”的问题。

建议：“开放舆论”，不要一下子都捅上报纸，第一步可以先办若干个刊物，从理论上、实践上、外国的正反经验上……种种，让智者尽量发言，让官员们以及读者们增强思维、增广民主知识。然后一步一步开放，如何？

岂有文章倾社稷，从来佞幸覆乾坤

关：吴老，你讲的故事和意见有的听说过，许多是我们以前没听说过的。

吴：人老了，总爱说老话。故事，其实就是老话。你一定知道《海瑞罢官》和“三家村”的故事吧？

关：知道。这是启动“文化大革命”的一场惨剧。

吴：你想想，姚文元是什么东西？如果没有“权力”在他背后支撑，他连个狗屁也不如。所以，我说：要特别注意“江青+康生”的模式！这种邪恶的“权力”利用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间，极大地破坏生产力，把国家经济拖到了崩溃的边缘！

这是中国历史最黑暗的一页，也是我们党最沉痛的历史教训！所有正直的共产党员都应该世代代记住：永远不能再让这种邪恶的“权力”重演这样的惨剧！

邓拓同志惨死了，吴晗同志惨死了，“三家

村”幸而还有廖沫沙同志在，他写了《挽邓拓诗》：“岂有文章倾社稷，从来佞幸覆乾坤”，读了催人泪下。我希望，人人都能记住这两句警句。尤其是从事管理意识形态的同志们。

我还要多啰嗦几句：没有邪恶的“权力”在背后支撑着的文章，是绝对不会“倾社稷”的，如果有，你举给我听听？老子？孔孟？屈原？司马迁？韩愈？柳宗元？苏轼？直至罗贯中、施耐庵、曹雪芹、龚自珍、鲁迅？但是，上世纪60年代“文革”时，在错误的“权力”支持下姚文元等人写的“文章”，却是可以倾社稷的。我想，我应该给廖沫沙同志的诗加上这么一点点注读。你看，怎么样？

关：两句诗真好，加上这样的注读我以为更完整了！

吴：我是有报天天读的。在回顾这些历史的

同时，我也注意到当前的一些大事。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这一系列的理念，特别是“和谐社会”这一极具中国特色的构思。我觉得，这一构思很好。把世界上一切最好的东西都加起来的社会主义，不就是令人和谐的社会吗？在我们的实践经过检验之后，成功了，再加上“主义”两个字，不就是“和谐社会主义”吗？只要我们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认真行进，和谐社会一定能获得成功的！这可能就是小平同志所说的“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的社会。我觉得这种社会主义是会受到人民大众欢迎的，你说呢？

（本文经吴老亲自修改，有关建立经济特区部分参考了杨剑同志对吴老的访问，特此致谢。）（责任编辑 杜 晋）

（上接17页）批评及弹劾呢？农民及其代表能批评谁？弹劾谁？应受法律制裁的又是谁？

一部庄严的具有进步意义，符合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国家法律，连同其民主法治思想和将阶级斗争纳入法治轨道的尝试，在摇篮里就被扼杀了。这是领导人凌驾于法律之上随意毁法的严重事件，也是获取“无法无天”权力的一个突破。“和尚打伞”的角色在1950年就登上舞台了。

当年参加土改的大体上是三类人：①有一定文化的年轻新干部包括地下党员；②农民积极分子包括农村贫苦知识分子；③区委委员以上的南下干部。他们接受了暴力土改的阶级斗争“教育”与“锻炼”，其中参加过1946—1947年北方土改的南下干部更是第二次了。尽管接受程度不同，但“左”“勿右”等错误思想和作风的影响是巨大而深刻的。那些出身、成分好，“根子正”，文化低却适合干部政策的人，刻意受到提拔，逐步成为基层、中层乃至高级领导干部，暴力土改为极左路线训练了一支庞大的“左”倾干部队伍。在后来的“合作化”、“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反右倾”等运动中，他们总是有办法包括使用暴力和暴力威胁来完成或超额完成任务，极左路线畅行无阻。

土改的基本目的是实现“耕者有其田”，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暴力土改的结

果适得其反，抑制和破坏了农村生产力。耽误了生产季节，死了那么多人（其中不乏有用的人才），糟蹋了那么多东西，是其一。其二，由于它的野蛮残暴，在普通农民心中埋下深深的恐惧，土改后他们嘴里不说，心里嘀咕：“富了没有好下场！”有些报刊当时曾开展农民积极分子“消极退坡”思想的讨论，湖南的李四喜思想和北方的“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便是当时讨论的典型。

暴力斗争表面上轰轰烈烈，实际上不得人心。

1953年全国土改刚完成，同年冬开始，便相继实行粮棉油猪等农副产品由政府统购统销。城乡二元化管理体制从此发端，不几年就固定为中国社会独特的城乡二元化结构，至今仍在阻碍着国家的发展。到1956年，农民手里的土地所有权被他们极不情愿的“合作化”彻底化掉了。接着而来的是“大跃进”和“公社化”，无一不是破坏农村生产力的倒退性灾难，而且愈到后来破坏愈大，灾难愈重。

回首往事，可以清晰地看到，1950年反对和平土改，自毁国家法律，是在反民主法治、反人道、反科学的极左道路上，跨出了严重的一步。这是把新中国历史车轮推向倒退的第一步！

（责任编辑 李 晨）

德国总理和我们谈三农问题

● 春桃

2006年的春天以来,我和爱人陈桂棣一直就在中国南方的农村搞调查。5月9日这一天,我们的手机突然响了几次,因为当时正忙于采访,就没有理睬。但它随后竟不断地响着,似有要紧的事,看了一眼,见是北京的号码,还是接了。想不到竟是德国大使馆打来的,说给我们发来了一个电子邮件,希望我们能看一下。当晚,我们在一处网吧读到了这封信,才恍然想起,我们的《中国农民调查》那本书在柏林荣获“尤利西斯国际报道文学奖”一等奖之后,德国驻华大使馆曾邀请我们去使馆作客,那天负责接待并担任翻译的是杨佩女士,这封电子邮件也正是她发来的。她告诉我们,德国新任联邦总理默克尔将于5月22、23日首次访华,22日白天要同中国政府首脑会晤,当天晚上还准备在大使馆与来自中国民间社会的一些人见面。杨佩在来信中恳切地问道:“你们有没有兴趣参加?期待着你们的答复。”

我们首先感到的是惊异,接着,便是兴奋。因为我们不可能想象德国总理的这次访问,会与我们有什么关联,特别是在如今等级还甚分明的中国,尽管我们并不是那种传统的作家,但也不可能具备这等想象力。面对突然而至的这样一件事,我们想,这显然不是一个“有没有兴趣参加”的问题,是没有理由可以拒绝的。

第二天我们就作了回复,那边很快也就把默克尔总理的邀请函发了过来。

杨佩告诉我们,默克尔的这次访华,是她在出任联邦总理后的第一次国事访问,之前虽也曾去过美国,但那不过是工作上的访问。她于21日晚上抵达北京,22日与胡锦涛、温家宝等中国领导人会谈,当晚就要飞往上海,就是说,她在中国实际上只逗留一天半,却准备抽出半个小时的时间来会见我们这些中国人,足见她对这次会见的诚意与重视。

放弃这次机会是没有道理的,但是要不要给我们的领导汇报一下呢?尽管我们知道,一旦去汇报,也许会生发出一些不必要的麻烦,但我们毕竟不是地下作家,是有组织的,何况应德国总理的邀请进京会见,这不是一桩小事,于是我们就给中共合肥市委的一位主管领导打了电话。可打了数次却无人接听,问他的秘书,才知道他正在欧洲访问。又听说随团访问的市委秘书长手机是一直开着的,就又给这位秘书长打电话,竟也打不通。请示不成,眼看没有时间了,我们就直接从南国的农村进京了。

其实,自打2004年10月从德国领奖归来之后,我们就对这个引人瞩目的国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默克尔挑战施罗德胜出,成为德国历史上的首任女总理,自然而然地,我们就留意起她的故事。应该说,在世界的现代历史上,女人当政已不罕见。四十多年前自班达拉奈克夫人出任斯里兰卡总理,开创了女子担任民选政府首脑的先河,打那以后,亚洲就先后出现了八位女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包括最近被任命为韩国政府总理的韩明淑,在欧洲,挪威布伦特兰夫人三度出任政府总理,英国撒切尔夫人则担任首相长达十一年之久。不过,在这些叱咤风云、各具风韵魅力的女性政治家中,默克尔确实有着更多的传

奇色彩。据说,多年来,德国的民众早就已经习惯了默克尔的沉默与强硬,几乎忘了她是一个女人,忘了她应该拥有家庭的快乐和幸福,因此,被称为“德国铁娘子”。可是让人意想不到的,她发表的第一场竞选的演讲,竟是一改往日冷峻的风格,以从没表露过的女人的感性:柔缓的话语,温婉的面容,出现在民众的面前。那天,她没有去讲自己的政治抱负,而是饱含着情感地讲了自己的生活,讲了她外婆的故事。她说,在东西德国没有统一以前,住在西德的外婆每次总要先到泪宫办理入境的手续,然后才能来到东德探视她们。每次外婆回去,她都会和妈妈把外婆送到泪宫,直到开往汉堡的班车远去了,她和妈妈才会依依不舍地走开。她怕看到外婆变老,总担心自己会有一天再见不到她。终于等到东西两德统一的那天,她又去了柏林东西德边界的泪宫,但这时外婆已经不在了。她说到这儿时,突然变得声音哽咽,泪流满面,再说不下去。但是她却因此赢得了从来没有过的雷鸣般的掌声。

她是德国洪堡大学的化学博士,又是个出了名的音乐迷。自1989年加入“民主觉醒”组织,一脚踏入政治大门,她就成为德国人熟悉的一个冰冷的女强人,但是,在音乐节那天的开幕式上,她却又给大家一个惊喜,只见她一袭鲜靓的真丝红裙,浑身上下光芒四射地出现在人们的面前,并笑容灿烂地向夸赞她漂亮的人挥手致谢,令人难忘地让大家领略到了“铁娘子”火热与柔情的一面。

她是政治家,可她的先生约阿希姆·绍尔,竟是个眼里只有学问根本不问窗外事的人。他是她读博士期间的指导老师,双方都忙于各自的事业,结婚那天,他们居然没有举行婚礼,甚至没有声张,连亲人也没告诉。直到默克尔挺身而出,参加德国联邦总理的角逐时,施罗德的夫人多丽丝无处不在,千方百计在为丈夫摇旗呐喊,但默克尔却是一直孤身奋战,以至人们都在奇怪地谈论:默克尔有先生吗?

就是这样一个与众不同的“德国铁娘子”,要来中国访问了,并在极短暂的访问期间要会见我们——直到我们走在了北京的大街上,还依然觉得这一切好像并不真实。

5月22日下午五时,我们准时赶到了位于

北京东直门外大街的德国大使馆。使馆门口这时已是戒备森严,三五成群的中国警察在附近警戒。大约5时20分,几辆黑色的高级轿车鱼贯驶入使馆的前院,我们注意到,默克尔从中间的一辆车上出来,没有来得及看清她的模样,她就被一群人簇拥着走进了东首的宴会厅。

随后,杨佩女士就把我们引到了宴会厅旁边的一间会客室,那里已经按椭圆形摆好了十几张椅子,中间没有会议桌,只是简单地放着几个玻璃茶几,每张椅子的前面也没有摆出人的名字,显得十分随意,这和中国屡见不鲜的格调绝然不同。杨佩首先安排我们入座,她说默克尔马上将坐在左首的一个位置上。谁知默克尔走进来以后,十分随意地就坐在了我的边上,还让陈桂棣也坐在她的另一边去,我们就和她肩挨肩地坐在一起,这样,杨佩女士在内的两位翻译便只好坐到了她的身后去。虽然在这之前,我们已经在电视上和杂志上熟悉了默克尔的形象,但是,突然来到面前的默克尔还是令我们惊奇。这天,她穿了一身黑色的西服,身材高挑,眼睛很大,眸子很蓝,很漂亮,比电视和杂志上见到的更年轻。我们甚至怀疑坐在边上的就是鼎鼎大名的“德国铁娘子”,因为眼前的默克尔分明是一派学者的风度,温文尔雅,谦逊而又和善。她首先表示,非常感谢我们能赶来北京同她见面。这时陈桂棣就把一本《中国农民调查》的正版书,赠送给她。一年前我们去德国领奖时,开始,朋友们曾担心我们出不去,没想到竟是顺利地去了柏林,这至少说明,中国的民主和人权还是在进步。默克尔此时接过书,认真翻了翻,因为不懂中文,便关心地问:有别的译文吗?陈桂棣说,德文版很快就会出来。她听了点着头说:那我一定读一读。

因为同时被邀请的,还有北京帮助农民工维权组织的两个负责人,其中的魏伟没有按时赶来,默克尔就问坐在她对面的韩会敏,问她接到这次的邀请是否感到有压力?小韩说,压力倒是没有,就是比较紧张,因为自己还很年轻,这样的场面又是第一次遇到,很怕自己说不好话。默克尔笑了。显然是为了调节气氛,她首先让自己松弛下来,随手端起茶几上的一杯咖啡,然后,一边喝着咖啡,一边尝着点心,像聊天似地问着小韩,你能给我介绍一下你所从事的工作吗?民工在北

京都能找到工作吗?能够顺利拿到工资吗?他们的维权有困难吗?

小韩一一作答,不过,她没全讲真话,把事情说得太乐观了。

接下来,默克尔便开始问我们一些中国的“三农”问题。她说,中国和德国有些情况完全不一样,她对中国的农村就感到非常陌生。

对此,我们还是作了一些准备的。觉得没有必要去丑化或是粉饰中国的农村和农民,况且,新的一届中央政府已经确实将“三农”工作视为各

项工作的“重中之重”,因此,陈桂棣在介绍我们下去调查看到的一些情况时,谈得很坦率。

默克尔认真地听着,插话说,在我们德国,在农村过日子是很悠闲的。

我说,是这样的,我们前年到德国,曾去过一些农村调查,发现德国的农民比城里人过得还好。他们的生活富足,而且过得悠闲,这一点同我们中国正好相反,我们是城里人比农村的农民富。

默克尔于是就问,为什么中国的农民会比城市人穷呢?

陈桂棣说,有历史上的原因,长期以来中国搞的是“城乡分治”,牺牲农民的利益支援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的现代化,拉大了城乡间的贫富差距;也有现实的问题,农民的负担太重,就说几年前吧:城里人的年均收入将近是农民的六倍,这里包括只有城里人才能享受到的各种各样的社会福利,而农民无福利可言,但上缴的各种税费却是城市人的四倍。这种不顾农民承受能力的税赋政策,就把农民搞苦了。

我补充说,那时,农民上缴的税费多达一百多种,甚至荒唐到连农民在家里烧柴做饭烟囱里冒的烟也要交“环境污染费”。

说得默克尔笑了起来,她马上强调:城里的



陈桂棣(右)、春桃(左)和德国总理默克尔

烟囱冒烟是要管的。又说得大家全笑了。

这时,她望着陈桂棣,问道:我今天上午见了温家宝总理,他说农民已经不交农业税了,农民的日子是不是好过一些了?

陈桂棣说,从今年开始,中国的农民都免除了农业税,我国政府结束了两千六百多年的“皇粮国税”的历史,这对中国的农民来说确实是一件大好事,今日中国农民的日子好过了不少。但是,造成农民不堪重负的原因很多,也很复杂,比如,中国的农业基础本来就差,各级政府在农村医疗和义务教育的投入上又严重不足;臃肿的行政机构还有待改革;农资产品的涨价过快,也使得许多农民“增产不增收”,等等,问题是几十年积累下来的,所以中国政府今年虽免除了农业税,还采取了许多惠农政策,但相当数量的农村状况不大可能在短期内会有一个大的改变。

默克尔静静地听着,就连把咖啡放回茶几时,动作也特别地轻,生怕碰出了响声。

这时迟到的魏伟走了进来,他不好意思地解释说,今天路上堵车厉害,耽误了时间。默克尔一听,幽默地说:这也许怪我吧,我的来访给大家添了麻烦。说得我们又都笑了起来。

接着,我们就介绍了现在了解到的农村的一些情况。如针对农民看病难,很多农民因病返贫

的问题,一些省的农村搞了医保的试点;如针对农民的孩子上不起学,不少地方正逐渐免除九年义务教育期间学生的学杂费,有的省市农村的孩子上学已经不再交学费;如政府想方设法改善农民工进城工作和生活的条件,力所能及废除那些不应有的歧视政策。这些都给农民带来了不少实惠,是受到了农民欢迎的。

默克尔想了想问,中国一户农民有多少土地?中国的土地能养活这么多人吗?她提出这个问题,足见她对中国的农村有些问题还是了解的。因为中国农民的负担减轻以后,土地的问题就成为中国农村一个较为突出的问题。

陈桂棣说,各地农村的情况不同,农民占有的土地就不同。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中国的耕地养活中国十三亿、甚至更多的人口都是没有问题的。只是现在种地实在不赚钱,很多地方的农村以前都是种两季水稻,现在就只种一季了,那些农民说,粮食够他们自己吃就行了,有的甚至将土地抛荒,这个问题比较严峻。为鼓励农民种地,政府给予了一定的补贴。当然免除了农业税,这本身就提高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为禁止在城市化的建设中对农民土地非法的侵占,中央政府制定了严格的土地审批制度,而且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当然问题依然不容乐观。

默克尔这时转向我突然又问,农民非得进城吗?城里人本身也有个就业问题,农民进城真的就能找到工作吗?转了一圈儿,默克尔又回到了农民工的问题上。

我说,关于农民工,这两年我们也做了一些调查。进城的农民想要得到生存,确实是比较难的事情,因为城市里已经有了大量的下岗工人,他们想找到一份工作尚且不容易,对于那些文化很低离开农村便无一技之长的农民,自然就更加困难了。但是,中国的农村人口毕竟太多,再说种庄稼已经不能够使农民们脱贫致富,随着这些年逐步放松了对户籍的管制,现在至少有一亿多,甚至远不止这个数字的中国农民,走进了各地的城市。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只能从事着城里人不愿干的那些脏活、重活,有毒有害甚而是危及健康的工作;当然,其中的一部分人,由于不断地打拼,已先后变成“白领”;也有数量可观的农民工做出了让城市人也刮目相看的业绩,早已成

功地融进了城市。尽管社会生活中还存在着许多歧视农民的现象,但活跃在各地城市中的农民工,已经成为我们这个社会不可忽视的一个阶层。让农村中的一些农民变成城市的市民,这应该是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必然出路。任何一个国家,如果占百分之八十的人口都是农民,这个国家是不可能富裕,也是不可能实现现代化的。因此,要富裕农民,就必须减少农民,帮助大量的农民工进城,这应该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一个必然趋势。

整个会谈是随意而又愉快的。默克尔就这样零距离地坐在我们中间,忽而专注倾听,忽而插话或是提问。无论插话还是提问,她都微笑着打着手势,表示着对对方的尊重。显然因为气氛的温馨与和谐吧,我们有时竟淡忘了她的身份,似在同一个友好的学者,抑或一个熟悉的客人,在聊一个彼此都感兴趣的话题。

这些话题,其实大都被我们写在了《中国农民调查》一书中。按理说,对这种话题如此感到浓厚兴趣的,不应该是来自万里之外的默克尔女士,而应该是我们自己国家的党政官员。《中国农民调查》虽被一度封杀,但我们历经三年调查到的中国的“三农”问题,却是不应该也不可能回避的。可悲的是,我们工作的那座城市,甚或我们所在的安徽省,至今还没有一个党政官员,有兴趣和我们认真探讨这个话题。也许,他们是太忙了;也许,有兴趣的默克尔有着她政治上的目的,或是人权方面的考虑。但是,中国今天面临的最大的政治,不就是长期的城乡分治,导致社会不和谐,我们才需要建设和谐社会吗?不就是因为长期的二元体制,城乡贫富之间出现了巨大的差距,才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成果全民共享吗?说到底,还不就是一个“三农”的问题吗?说到人权,难道中国面临的最大的一个人权问题,不同样是如何去改变为新中国的成立和建设作出过那么大牺牲的九亿农民,他们遭遇到的不应有的社会歧视,今天不应该还他们以国民待遇吗?

默克尔对中国“三农”问题如此的关注,确实出乎我们的意外。原只安排三十分钟的会谈时间,她却让由她主持的另一个大型招待会一再推迟,以至结束与我们长达四十多分钟的谈话之后,她只在招待会上象征性地说了几句话,便匆

匆赶往机场,飞往上海。最能够体现身份和权力的大型招待会,她却“删繁就简”,匆匆走过;而最不需要权力和身份的与我们这些普通人的这种会谈,她却认真投入,以至忘了时间。用中国一句时髦的话说,这或许就叫“务实”,叫“不注重形式”,不过我想,默克尔可以告诉给我们的,显然远不止这些。

那天走出德国大使馆时,天已经不早了,但夏日热烈的阳光仍在各处晃眼地照耀着。北京的

大街上人声车声的喧闹,一下就将我们包围了。也就在这瞬间,鲁迅先生早就说过的一句话,突然浮现在我们的眼前。是呀,开放的中国,不应该是无声的中国。鲁迅在《无声的中国》一文中要说的,恰正是我们这一天最想要说的:

“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上世界上生活。”

(责任编辑 李 晨)

代购代邮

书 名	作者或主编	定价	邮 费
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	满 妹	39.00	7.00
胡耀邦传	张黎群等	50.00	7.00
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	戴 煌	35.00	7.00
恍若隔世——回眸夹边沟	邢同义	24.80	5.00
冷石斋沉思录	吴 江	16.00	5.00
苏共亡党十年祭	黄苇町	22.00	5.00
中国农民“反行为”调查	高王凌	15.00	5.00
李宗仁回忆录(上下册)	李宗仁口述 唐德刚撰写	68.00	8.00
周恩来的晚年岁月	刘武生	38.00	6.00
斗室中的天下	资中筠	30.00	6.00
梁漱溟与毛泽东	汪东林	16.80	5.00
中国共产党历届中央委员大辞典	中共党史出版社	285.00	20.00
红墙大事——共和国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上下)	张树德	69.80	8.00
文化大革命简史	金春明	28.00	6.00
走进怀仁堂(上下)	董保存	55.00	7.00
国事忆述	陈锦华	48.00	7.00
从陈独秀到毛泽东	冯建辉	22.00	6.00
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	熊向晖	29.00	6.00
陈独秀风雨人生	朱 洪	28.00	6.00
梁漱溟问答录	汪东林	25.00	6.00
刘少奇蒙难始末	图 们 祝东力	17.00	5.00
农业学大寨始末	宋连生	28.00	6.00
工业学大庆始末	宋连生	30.00	6.00
周扬与冯雪峰	徐庆全	28.00	6.00
抗战时期的蒋介石	江 涛	40.00	7.00
抗战时期的国民党军队	宋 波	40.00	7.00
侵华日军主要将领的最后结局	朱晓艳 班惠英	40.00	7.00
党史札记(一集)	龚育之	28.00	6.00
党史札记(二集)	龚育之	35.00	7.00
大突破——新中国私营经济风云录	马立诚	36.00	7.00
家书抵万金	抢救民间家书项目组委会	23.80	5.00
红色家书	抢救民间家书项目组委会	35.80	7.00

历史是一面镜子。读史可解惑,可益智。本社对读者函询较多的有关图书,开展代购、代邮服务。

《恍若隔世——回眸夹边沟》作者走访当时夹边沟、明水和十工等农场劳教右派中的健在者,查阅有关历史档案,历时一年半写成的心血之作。对于一切关心那段历史的人,是不可不读的一本书。

《李宗仁回忆录》(上、下)我国变乱百余年,民穷财尽,今日差得此和平建设的机会,我们断不应再使内乱出现于中国。至愿红色政权好自为之,毋蹈吾人昔日的覆辙。我个人戎马半生,不愿再见铜驼于荆棘中也。——李宗仁

《周恩来的晚年岁月》作者曾任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兼周恩来研究组组长,系统地阅读过大量档案材料,访问有关人士,发表过不少研究成果。本书将“文革”时期周恩来为尽量减少“文革”所造成的损失、保护大批党内外干部、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的史实展现给读者,有助于读者对这段复杂历史和周恩来这位人民总理的理解。

《红墙大事》作者从事党史和军史研究近20年,接触了许多当年的档案文献及当事人,本书记述了共和国历史上许多鲜为人知的重大事件的酝酿、争论和展开,许多重大事件的决策、制定和实行。以史实为准绳,以文献为依据,按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向读者真实地展示了那些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 编 100045

收款人 炎黄春秋杂志社

(注:邮购三本书以上,可按总书价的10%付邮费)

潘汉年在劳改茶场

● 黄禹康

潘汉年，一位参与过中国现代史上许多重大事件的传奇人物。他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忠实执行并多次出色地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对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特别是在开展对敌隐蔽斗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解放后，他历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中共上海市委社会部长、统战部长；上海市委常委、副书记，上海市副市长等职。1955年4月，他突然以“内奸”罪名被捕，并被判刑，开除党籍，酿成了共和国历史上的一大冤案。1982年，中央为潘汉年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1975年，潘汉年被遣送到湖南茶陵县洣江茶场劳改。1977年，他因长期的监狱生活和久病未能治疗，终于含冤去世。洣江茶场成了他人生的最后驿站。

分开关押8年的患难夫妇，相聚在洣江茶场

1975年5月，根据中央专案三办的意见，将潘汉年从北京秦城监狱移送到湖南省茶陵县洣江茶场“劳动”和“安置”。公安部秦城监狱移送潘汉年的公文这样写道：“湖南省公安厅：根据中央决定，将潘汉年放在你省劳改单位劳动。”潘汉年于5月27日在公安部十五局所属的专案组以及秦城监狱和湖南劳改单位派出的公安人员的陪同下，从北京乘火车，于29日到达长沙，当天即与3天前已赶到长沙的妻子董慧会合后同赴洣江茶场。

潘汉年夫妇被分开关在秦城监狱，已整整8年没有见面了。虽说潘汉年还重压着一大堆帽子，但他们还是抑制不住这次重又相逢的喜悦。他俩有说有笑，十分高兴。他们对前途已不抱什么奢望，只求能在相互依偎中了此残生。

洣江茶场，地处井冈山山下的湘赣边界的湖南茶陵县境内，这里除有少量的茶场干部职工之外，绝大多数是已判了刑被送来劳动改造的人。当时，无罪而被判有罪送到这里来的人也不少，包括“文革”前的一些“右派分子”；“文革”期间的一些所谓“现行反革命”。

为了安排潘汉年夫妇的住处，茶场还颇费了一番心思。最初是要在关押犯人的监房旁边，为他们单独修一座小平房，图纸画出来了，预算也造好了。但当时上面要求，潘汉年是“中央专案组单线审查对象”，属“敌我矛盾”，给他们的住房既不能和其他犯人在一起，同时又要要在管理干部的视线之内。于是，茶场为他们安排了一间土红色砖墙、瓦顶的小平房。小平房坐落在这场部办公楼与职工宿舍之间，原为男、女职工洗澡房，以后也住过人，大约有25平方米，内隔成两间，其中一间为灶屋，屋外有自来水，邻近是职工食堂。这对潘汉年夫妇来说，已经是相当满意了。所以当茶场征求他们的意见时，潘汉年连声说：“可以，可以。”潘汉年在这里一直住到1977年3月24日病重送长沙医治，历时1年9个月又5天。

患难夫妇相依为命，依依亲情苦撑余生

潘汉年夫妇俩，一个年近七旬，一个也接近花甲。潘汉年面容消瘦，行动已不太自如，但是每天总是5点多钟起床打太极拳，接着就打扫屋子周围的卫生。有时出去取报纸、买火柴、买菜。每逢买菜人多时，就在后面排队等候。潘汉年还读些从北京带来的马列经典著作和鲁迅文集。有时间就用手推车推着白发苍苍、下肢行动不太方便的董慧外出散步。因而董慧常开玩笑说，潘汉年

的劳改任务就是照顾我。

同在茶场“劳改”过的阳江,在谈到他1976年初见到潘汉年的情况时,回忆道:我第一次在茶场里看到潘汉年同志,是1976年春节的前一天。当时场部要举办文艺汇演,我在大礼堂布置舞台。休息时,我看到一位消瘦的老人,身穿着破旧的藏青色毛料衣服,手提篾织的圆篮,拄着手杖,从礼堂前面的小马路走向场部商场。他站在柜台边的人群后面,让其他顾客一个一个挤到前面买东西。一位女教师看到他,让他上前去买了味精、酱油、白糖、花生之类的东西。老人含笑点头致谢。走出店门,他又向一个农村妇女买了一些鸡蛋,蹒跚着走回场部职工宿舍区。这时几个儿童追上来,使劲地喊:“潘汉年,你买鸡蛋还没有找钱哩!”他回转身来,彬彬有礼地接过找回的钱,低声道了谢。随后,他的背影便消失在拐角的苦楝子树后面了。

一天傍晚,场部前坪放映电影《大浪淘沙》。我看见潘老推着一位头发苍白的老妇(董慧同志)乘坐的轮椅,停在场部食堂的避风处……当影片中的故事演到北伐高潮来临时,主人公每一次斗争的胜利都使这两位老人高兴,董大姐还报以“嘻嘻”的笑声。当“四·一二”事变后,反革命屠杀革命志士的场面出现时,只见潘老仰望星空,发出声声长叹……

潘汉年夫妇在涿江茶场生活期间,虽然蒙受冤屈,但从没有对任何人流露过半句怨言,他们坚定的生活信念,对党的挚爱之心和关心群众的高贵品质给茶场职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曾提出要把自己的旧衣服送给茶场的文工团作道具,把电视机送给场部让大家看。他们给职工讲故事,补习英语,有时还让去他们家串门的同志尝尝他们亲手做的饭菜。茶场的干部、群众从来没有把潘汉年当成犯人对待,而尊称他们为“两老”。每当潘汉年到食堂打饭菜时,大家主动让他先买。逢到场部放映电影,看到潘汉年推着董慧坐着轮椅过来,大家就让出好的位置给他们。甘场长的老母亲常常留他们在家里坐坐。有次,当他们经过蒋会计家门时,蒋会计热情邀请他们进屋,并拿出食品招待他们,这使潘汉年、董慧感动得掉下泪来。

潘汉年夫妇每月各有生活费100元。为照顾

董慧行动不便,茶场特征求他们的同意,选派了干部家属照料他们的日常生活。他们在生活上虽然得到了一些照顾,但在政治上仍然受到严格的管制。潘汉年没有公民权,没有通信自由,未经省公安厅批准,不能离开茶场。董慧虽有公民权,但也有茶场指定的人对她进行管理教育。她有通信自由,但又不准泄露包括她们夫妇情况的“机密”。她与香港亲属通信,要经省劳改局批准。

董慧的弟妹大多数居住在香港,有的还在国外,都是在事业上、学术上很有成就又很爱国的人士。他们从小受董慧的影响,对董慧和潘汉年一直很崇敬,根本不相信他们会有这么严重的政治问题。当他们得知身处逆境的潘汉年、董慧夫妇在涿江茶场劳改后,就不断地写信、寄药品、寄食品。董慧坐的轮椅就是她弟弟从香港送来的。他们给潘汉年夫妇的来信,充满了崇敬、关切之情,十分感人。董慧的弟弟在信中说:“我希望你的领导会让我来看你,我们大家都老了。但我永远记着你在青年时代给我指导和鼓励,此恩此德念念不忘!”在另外两封信里分别说到:“在我们兄弟姐妹一群人中,在事业上,我以为你成就最大,因为你能出生入死,参加了民族解放的工作,这是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我们曾经过1930至1949年这段时间,看到今天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中国人应感到光荣的,而你 and 老潘在那段时间参加了中国民族解放的工作,出生入死。明白过去的人,对那时所有参加过这项工作的同志都应感谢的。”他们还请香港知名人士费彝民先生转达对潘汉年、董慧夫妇的问候,要他们保重。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董慧的弟弟给他们写信说:“老潘同志身体好吗?切要叫他保重,光明就在前面。”并打算在这年12月到涿江探望他们。信上还说:“上一次做梦,梦着你(指董慧),就收到你的信,以后就没有梦了。可是于9月27日,我再做了一个梦,梦见老潘在20年前的影像,穿着长裤子与衬衣,样子很年轻,想不到见面时,我们都是白发苍苍的人了。”“四人帮”虽然被粉碎了,但“两个凡是”的紧箍圈还没有打碎,所以潘汉年夫妇的问题还是不能解决。也是由于这个原因,董慧的弟弟、弟媳在12月到湖南来探望时,被挡在离涿江茶场几百里的长沙,不能同

亲人相见。他们返回香港后来信说：“打算明年11月再来，那时‘四人帮’的事总该结束了。”但他们后来再次到湖南时，潘汉年已不在人世了，只见到董慧。

久病不医酿成重疴，一代英才含冤去世

1976年1月，公安部的专案组作出了潘汉年复查书面结论，并且到沱江茶场向潘汉年本人作了正式宣布。这份复查结论写明了1963年的判决和1970年的重判以及前后两次的批准过程等。虽然其中有矛盾、有破绽，但也没有再过多地顾及了。主管部门的负责人作出了一个含混不清、根本不理睬一切法律程序和手续的决定：关于潘汉年改判无期徒刑一事，不再重新起诉，也不再通过最高人民法院，一切必要的法律程序，都予以省略，而一切由专案组包办代替，由专案组向潘汉年本人宣布。所做的书面结论也不必再和本人见面，不再要求本人签字，等等。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一举粉碎，全国人民都在欢呼。遭受冤屈的潘汉年夫妇也非常高兴，董慧兴奋得丢了拐杖走路，潘汉年也对来看他的干部说：“江青这人我了解……”他虽然没有把话说完，但意思已能使人听懂了。有一次，董慧对人说：“老潘这人，在政治上比较敏感，他10年前就预计到‘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必然自取灭亡。‘四人帮’倒台后，问他为什么看得这么准？他回答我说：‘多行不义必自毙。’江青、康生这伙人已是恶贯满盈了！”

然而，不幸的是，潘汉年的冤案问题还没有重新审查，他的身体却每况愈下。他病倒了，患有多种疾病。由于南方气候潮湿，他到茶场后不久，就得了类风湿病，两手麻木，双脚浮肿，后来生活也渐渐不能自理。他被送进茶场医院后，又由于行动不便，医院缺乏护理，两次摔倒在地上，更加重了他的病情。

在茶场医院住了一段时间，病情不见好转；而且茶场医院医疗条件也不好，无法进一步全面检查。为此，潘汉年要求转入省城大医院去治病。对此请求，茶场领导固然不能决定，湖南省公安厅的领导也不能作出决定，因为据说这涉及到保

密问题，要请示公安部。公安部指示后，还要经湖南省委批准。如此上下请示研究，层层审批，经过两个多月的周转，1977年3月24日，潘汉年才被送到长沙市治疗。在上救护车时，潘汉年曾大声地对董慧说：“我一定会回来的，你放心！”到达长沙后，他由省公安厅的人员陪同，被送进湖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14病室，住110床。14病室是干部病房。

进医院时，省公安厅同志考虑到当时的政治环境，为有利于对潘汉年的治疗和护理，经潘汉年本人同意，使用了他过去曾经用过的“肖淑安”的化名。住进医院后，潘汉年的病情已相当严重了，近1个月时间几乎吃不进东西，全凭输液。但这时他神志仍然十分清醒，精神状态也还算好，还经常要医护人员读报给他听，有时自己拿着报纸反复浏览。然而他当时的心情是苦闷压抑的，常常仰望着天空，怅然若失。

经过检查，才发现这位瘦弱的老人，不仅早已患了慢性支气管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贫血，还患有多囊肝并消化道出血、肺部感染等病症。到这时候，虽采取了一些必要的药物治疗措施，但是一切都已经晚了。据查阅当时的病历档案发现，1977年3月29日的病历单记载：“体温下降，今日问婆婆（指董慧）在哪里，担心她没有人招呼，陪护人员进行解说。”4月6日，病情加重，进食即吐，全身浮肿，眼睛睁不开，提出要见妻子。4月8日，使用冻干血浆200CC。4月9日输血500CC。以后，经常处于神志不清状态。

潘汉年被送到长沙医治时，作为妻子的董慧竟连看望和陪同的权利也没有。她天天焦急不安地等着潘汉年的消息。直到潘汉年病危时，有关方面才匆匆通知还在数百里之外的董慧赶赴长沙。还算幸运，1977年4月14日下午，董慧终于能够赶来和潘汉年见上最后一面。夫妻俩一见面就抱头痛哭。董慧对潘汉年说：“你安心休息，要有信心，要安静。”当天晚上7点45分，潘汉年就停止了呼吸，一代英才含冤去世了，终年71岁。

董慧从长沙招待所赶到医院向潘汉年遗体告别。当时医院领导、医生把潘汉年的病情和抢救过程向董慧作了交代，并就研究病因需解剖尸体之事征求董慧的意见。董慧听了表示感谢，并

同意解剖。解剖所见,腹腔与胃部全部都是紫血,肝脏烂得像豆腐渣一样。医生认为腹腔恶性肿瘤可能性大。

4月17日,潘汉年的遗体在长沙火化,骨灰埋葬在长沙市南郊的金盆岭墓地西侧半山腰。董慧请求允许她在潘汉年的墓前立块碑,有关组织经过慎重研究同意了,但墓碑上不准镌刻潘汉年三个字。董慧只好用潘汉年曾用过的化名肖淑安为潘汉年立了一块墓碑。

为夫昭雪疾呼号：“老潘没有死！”

料理完潘汉年的后事,董慧又返回农场。失去了相依为命的老伴之后,她更加孤苦寂寞。她向中央写信,请求为潘汉年平反纠正。她还向专案组询问:她什么时候恢复党籍?因为她从没有被宣布开除党籍,而是说“停止党籍”。她希望有朝一日能够落实政策,重新成为一名党员,继续为党工作。

董慧下肢一直没有治好,生活不能自理,几年前就患有的精神分裂症复发了。茶场派王芝兰同志帮助照料她的生活。王芝兰性情温和,很体贴这位不幸的老人,为了让董慧能够多吃点饭,常为她做一些爱吃的菜。董慧每次吃饭,都要留下一半饭菜,多摆一副碗筷,说要等老潘回来吃。她对王芝兰说:“我刚才看见老潘了,老潘没有死,他会回来的。”然后又拿出潘汉年的遗诗说:“你看,他给我写的诗,写得多清楚。”接着她又念起诗来。当每月发生活费时,她总拿出一部分钱存起来,说:“留给老潘用吧,他太苦了,从来也不会照顾自己。”

因为董慧喜欢孩子,为了减轻她对潘汉年的思念和痛苦,王芝兰便叫自己刚上中学的女儿刘海燕课余时间来陪伴董妈妈,董慧很喜欢聪明伶俐的“燕子”,燕子晚上也留在董妈妈房里睡觉。有几次,燕子从睡梦中惊醒,只听董妈妈高声呼喊:“老潘回来了!”有时说:“老潘复活了,老潘平反了!”有时自言自语:“老潘你回来吧!你回来吧!”而后伴随着一阵隐隐的哭泣声,直到她全身发抖,昏厥过去。

当燕子放学回到董妈妈屋里,劝她“少吃点花生,免得增加脂肪,血压升高”的时候,董慧就

抱着燕子,深情地说:“好孩子,你是真心疼爱我的。”董慧眼里闪着泪花,马上把装花生米的食品盒盖上,继续读着《安娜·卡列尼娜》或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文学作品。有时向燕子讲述周总理、陈毅等革命前辈的故事,要燕子以这些老革命老前辈为楷模,做个党的好孩子。她还告诉燕子:看过的《参考消息》要好好保存起来,以免落到外人手里。

当燕子拿着英语课本在门外读单词时,董慧便靠着门仔细听着,而后说:“燕子,这样读不对,你要按照英语的发音规律,才能读准确。”说着要过课本,带燕子逐字逐句读起来。对难读的单词,反复耐心地给燕子纠正发音。从此,董慧每天教燕子读英语,帮助她理解课文,当董慧看到燕子克服了英语学习上的难关,不断取得进步时,脸上便泛起了愉快的笑容。燕子在董慧的循循善诱的辅导下,对英语有了特殊的爱好。

1978年国庆节,燕子陪伴在董妈妈身边看书。突然听到董妈妈自言自语地念叨着:“董慧纺出来了!”董慧纺出来了!”燕子听得莫名其妙,便问道:“董妈妈你说什么呀!”董慧用手轻轻地抚着燕子的头,出神地述说着:“那是我一生最幸福的时刻,因为我学会了原来不会的东西。延安当时开展大生产运动,男的开荒种地,女的纺纱织布,开始我纺不出来。当我第一次纺出纱来的时候,恰巧,毛主席走到我身边,他弯着腰,拿着我纺的纱,高兴地说道:‘董慧纺出来了!’董慧纺出来了!’”说到这里,董慧用颤抖的双手捧着手绢,揩着红润的双眼。

1978年5月,董慧的弟弟董锡权携妻子,受旅居英、美、澳洲等地亲人的委托,来到湖南探望姐姐。茶场派专车由王芝兰同志陪同董慧到长沙,在湖南宾馆同董锡权夫妇聚首5天。董锡权夫妇反复转达了海外兄弟姐妹们的心愿:“我们欢迎大姐回香港家中治病,不论饮食起居和医疗技术与药物,乃至护理条件都有利于大姐的身体健康好转。”董锡权劝道:“人生一世,弟兄姐妹一场,我们得尽到亲人的一点责任。大姐,您同我们去吧!”董慧紧握着董锡权夫妇的手说:“人们的情意我都领会。请你们代我表示感谢。我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富强回到祖国,那时才16岁,今年60岁了!请你们转告海外亲人:老潘的问题还

没弄清楚,我不能走!我也不忍心离开他含冤负屈的骨灰远走呀……”至此,董锡权夫妇忍不住落泪了。董锡权了解和敬重他的这位大姐,她坚持不出国就医,是她刚毅坚韧的性格所必然作出的决定,便示意他的夫人不要勉强劝说了。他提议:“我们陪大姐拍几张照片,带给海外的亲人吧!”拍照时,董慧把王芝兰拉到身边同大家一起拍了一张。她说:“这位姐妹,是我国内的亲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传出为彭德怀、陶铸平反昭雪的信息,给董慧很大鼓舞。她连续向党的一些老同志写信,希望潘汉年的冤案能引起各方面的重视。由于思想高度紧张,董慧的血压急剧上升了。1979年2月24日,因脑溢血抢救无效,在涪江茶场医院含冤逝世,终年60岁。

潘汉年、董慧夫妇没有子女,他们在涪江茶场的遗物经请示中央后由组织负责处理。一部分按他们生前愿望,送湖南省剧团做道具,一部分送茶场职工,一部分给潘汉年胞弟、胞妹、侄子。潘汉年在蒙冤期间写的诗词手稿,他视之如命的一箱鲁迅全集,部分随身日常用品(如表、钢笔、印章)等均放在上海档案馆保存。从潘汉年遗物中清理出来的诗词手稿有20余首,内容大多是回忆过去革命岁月和怀念董慧的诗句。潘汉年生前一直把一套精装鲁迅全集带在身边。从秦城监

狱到涪江茶场时,这箱书是随身带来的。董慧常对人说,这箱鲁迅全集是他的命,装这套全集的木箱是专门精工制作的,箱盖上“鲁迅全集”字样,是当时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写好后刻出来的。

1982年,中央为潘汉年平反昭雪,公开为他恢复名誉。根据中央关于潘汉年、董慧夫妇的骨灰移送北京八宝山公墓安放的决定,湖南省委首先把埋葬在金盆岭公墓潘汉年的骨灰坛取出,送到湖南省革命陵园大厅,把骨灰从坛子移入骨灰盒。同时,又把安放在涪江茶场的董慧的骨灰盒送到湖南省革命陵园,和潘汉年骨灰盒放在一起。

1983年4月14日上午,载着潘汉年夫妇骨灰的火车从长沙启程。到车站送行的有湖南省委主要领导以及潘汉年生前在湖南的友好。4月15日,在北京火车站贵宾室举行了为潘汉年夫妇骨灰盒覆盖中国共产党党旗的仪式。骨灰盒然后被送往八宝山公墓安放。潘汉年的骨灰盒安放在副一室,董慧骨灰盒安放在东院二室。

27载的沉冤终于昭雪,一个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形象,又矗立在人民的面前,并载入中华民族的英雄史册。

(责任编辑 吴思)

《炎黄春秋》创刊15周年 精品书系再版隆重推出

1998年推出的《炎黄春秋》精品书系,系从1995年以前45期650万字中精心筛选出150万字的文章,分类编辑为《政坛高层动态》、《重大决策幕后》、《历史迷案揭秘》、《名流写真》、《血荐轩辕》。书系出版一年后,即脱销。在纪念《炎黄春秋》创刊15周年之际,应广大读者的要求,书系再版发行,以弥补本刊早期合订本销罄之不足。

本书系全套5本,定价125元;另加邮挂费12元(因存书不多,恕不分卷出售)。



李少石事件 —— 暗杀还是意外

● 秦立海

1945年10月8日,在重庆谈判行将结束,毛泽东离渝返延的前夕,突然发生了一件令人十分震惊的事件:十八集团军(即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秘书李少石,在当天下午五时许乘车陪送柳亚子先生回沙坪坝寓所,返城途中行至下土湾时,突然有人自车后开枪射击,弹穿车皮和靠垫,并由背腋射入,击中李少石肺部,顿时血流如注。虽急送城内市民医院,但因伤势甚重,失血过多,经抢救无效,当晚不幸去世。李少石的突然遇难,究竟是国民党特务蓄意暗杀还是纯属意外事件,无论当时还是现在,一直持有不同的看法。

李少石突然遇难,中共怀疑政治暗杀

事件发生时,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正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大礼堂出席张治中为欢送毛泽东返回延安而举行的盛大晚宴,气氛十分热烈。突然,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的同志向周恩来紧急报告了李少石遇难的惊人消息。为了避免惊动毛泽东,周恩来随即沉着冷静地悄然离开会场,找到负责治安警卫的国民党宪兵司令张镇,向其提出质问和抗议,要他立即彻查此事。随后,二人于当晚8时50分赶到市民医院,看望死者及其家属,表示哀悼和慰问。

李少石突然遇难,不但令中共方面深感震惊,也让国民党当局十分紧张。这是因为此事不仅发生在国共重庆谈判尚未签字、毛泽东即将离渝的敏感时刻,而且李少石本人身份特殊,是著名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和何香凝的女婿。因此,国民党当局在未弄清事实真相之前,一时有口难辩,很难脱得了干系。起初,中共方面怀疑是国民党特务预谋的政治暗杀,因此极为愤慨。当晚,周恩来在市

民医院曾悲切地说:“二十年前廖仲恺先生遭反革命暗害,其情景犹历历在目,不料二十年后,他的爱婿又遭凶杀。”次日,中共《新华日报》即以《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秘书李少石同志突遭暗杀》为题报道了此事,并对李少石个人生平作了简要介绍:“李少石同志今年三十九岁,广东番禺县人,共产党党员。他长期为革命事业艰苦工作,并因此而入狱,出狱后,继续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工作不懈。为人温静和蔼,寡言笑,不善交游,平时足不出户,且向无私怨,此次偶因送其岳父至友柳先生返寓,竟遭毒手,殊令人愤慨不已。”言外之意,像李少石这样的共产党员,在国统区突然遇难,十有八九是国民党特务所为。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与判断,中共方面特别是周恩来本人,对尚在重庆的毛泽东的人身安全极为担心。因此,从市民医院返回宴会现场后,周恩来为确保安全,严正要求张镇在散会后用自己的汽车亲自护送毛泽东回红岩。张镇基于职责所在,也深恐毛泽东万有闪失,只得按照周恩来的要求,在深夜十一点多钟亲自为毛泽东执行了一次最高级别的警卫行动。这表明,国民党当局在弄清事实真相之前,的确也感到紧张和心虚。李少石遇难的消息传出后,在社会上引起很大震动。次日上午,宋庆龄、邵力子、沈钧儒、陈铭枢、郭沫若、茅盾等社会各界知名人士纷纷前往医院进行吊唁。重庆各报记者及在渝外籍记者十余人,也先后去医院探视采访,使这一事件迅速传遍了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

国民党连夜彻查,发现事件纯属意外

李少石事件发生后,国民党当局一方面应中

共强烈要求,另一方面为证明自己的清白,当即决定连夜进行彻查,以求尽快弄清事实真相。当时,宪兵司令张镇得知消息后即急电宪兵司令部警务处长卫持平 and 宪兵第三团团长张醴泉,责令其立刻连夜进行侦察破案,不得延误。与此同时,李少石遗体所在市民医院外科室,也加紧准备会同法官检察官及治安有关各机关进行遗体解剖,检取子弹,以配合破案。次日上午,重庆卫戍总司令王缙绪、警察局长唐毅及卫戍部宪兵司令部公安局人员等,也都赶到市民医院查询事件发生经过,了解情况。在短时间内,国民党当局各有关部门迅速行动起来,出现了少有的高效率办事现象。

经过连夜奋战,至次日(9日)凌晨二时许,案情即基本告破。据具体负责侦破此案的卫持平和张醴泉先后向张镇报告说:10月8日下午五时许,适有陆军重迫击炮第一团第三营七连中尉排长胡关台率武装班长6名,新兵30名,携带中正式步枪6枝,每枝配子弹4发,奉命由其驻地来重庆领取棉军服240套后,行抵红岩嘴六号门前附近,即在马路左侧休息,其时有弹药一等兵吴应堂蹲伏路旁,适有黑色轿车一辆,由小龙坎方向驶来,将该兵左臂部辗伤甚重,并撞伤右肩上方(中共方面的说法是,当时吴应堂正在路边小溲,汽车驶至时,因躲避不及,当被撞倒,头部受重伤,势甚危殆)。该车司机于肇祸后,向城内急驶图逃,该连下士班长田开福出于悲愤,即鸣枪一响制止,不意竟将该车击中,导致李少石意外遇难。查明上述情况后,国民党当局随即将当夜宿营于小龙坎松鹤楼的鸣枪班长田开福予以扣押待审,将其所使用的中正式15993号步枪1枝和射击的弹壳1枚、余弹3枚,一并予以缴扣。至此,“凶手”被迅速缉捕归案。

与此同时,卫持平等人会同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处长钱之光赶赴曾家岩,勘察被枪击出事的国10375号汽车。该车司机熊国华(又名熊维屏)是十八集团军办事处新雇用的,他在出事后将李少石紧急送往市民医院,并驱车至《新华日报》营业部,将两名报社同志送至医院负责照料李少石后,又将车开回曾家岩,锁入车库,即称病逸去,不知去向。经国共双方共同勘验该车中弹处,发现子弹是经车后的工具箱部分,穿过座后的钢质弹簧,致使弹头破裂成数碎片,故穿出靠垫处有数小孔,经

判定确是步枪弹片所射击。这与上述调查结果及有关尸检结论基本一致。至此,虽然肇事司机仍在逃,但案情已基本查清。

中共确认事实真相,妥善处理善后事宜

李少石事件真相大白后,钱之光随即代表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发表谈话称:“政府当局与社会各方对此经过都非常关心,幸赖本市宪兵司令部与警察局协力侦查,得在最短期间使案情大白,疑云为之一扫。”这是一个非常悲痛的偶然事件。感谢宪警治安机关医院法院的努力及各方人士的关心。”接着,钱之光简要介绍了事件经过,并指出:“李少石同志被枪击逝世,是革命事业中一个很沉痛损失,因此自此事件发生后,不但李同志家属,本办事处同人,新华日报同人一致痛悼,社会各方人士也都纷纷吊唁慰问,殷勤备至。而宪警治安当局与病院人员,更是夜以继日地紧张工作,张镇司令以及王缙绪总司令、唐毅局长与地方法院检察官,对于案情的探究,都很认真。对于这种热心关怀,本人敬表谢意。在事件初发生时,由于事出突然,肇事的汽车司机熊国华又已不知去向,大家对于李同志的死,都不免愤慨。但张镇司令指挥的宪兵司令部与警察局,努力侦查,同时本处亦派人赴肇事地点详细探访,并向有关人员一一询问,所获结果大致符合。所以虽然主要人证熊国华尚未到案,案情基本上仍可谓已经明了。”钱之光的谈话,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实事求是,在国统区产生了良好影响,体现了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的一贯工作作风。

如果说国民党当局对处理李少石事件尚能认真负责,不敢怠慢的话,那么对该事件中的另一名受害者,被汽车撞伤的弹药兵吴应堂则是另一番态度。吴应堂受伤后本已被送到条件较好的中央医院医治,但当得知其与李少石事件有关后,国民党当局将仍处于昏迷之中,生命危殆旦夕的吴应堂用汽车从中央医院转至市民医院,并将其安置在李少石原住病房对面,任人参观,以便作为“人证”,来证明自己的清白和无辜。中共方面则对吴应堂表示了慰问,并愿意担负他的医药疗养费,如万一不幸因伤逝世,并愿负责予以殓葬抚恤”。

10月12日《新华日报》还特地对其康复情况进行了及时报道,认为“这两日来伤势颇有进步”。周恩来还在百忙之中亲自前往市民医院看望吴应堂,嘱其安心治疗和静养,并重申一切医疗费用全部由中共方面负责。这种对生命的关爱与负责态度,的确令人感动。

10月11日,中共方面在小龙坎举行了李少石棺柩安葬仪式。当时,国民党当局竟出人意料地为身为共产党员的李少石棺柩上覆盖了一面中华民国国旗。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周恩



周恩来、董必武在红岩村同八路军办事处、新华日报馆工作人员合影

来等人则送了花圈,以示悼念。毛泽东还为李少石遇难题词:“李少石同志是个好共产党员,不幸遇难,永誌哀思!”周恩来亲自出席李少石棺柩安葬仪式并在墓前讲了话,认为李少石这样一个好同志的不幸死去,实在是很大的损失,他感谢死者生前为革命事业的努力,并感谢生者。李少石事件的圆满解决,迅速化解了国共之间可能出现的误会,因此并未对重庆谈判产生任何消极影响。10月10日《双十协定》正式签字,11日,毛泽东在张治中陪同下安全返回延安。

家属心中存有疑问,案情另有新的发现

李少石事件虽然很快结案,但其家属心中一直存有疑问。根据李少石的女儿李湄对事件的回忆,其中有两点值得特别关注,一是解剖结果证明,爸爸是被一粒“达姆达姆”弹击中的。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对妈妈说:“达姆达姆”弹是用来打野兽的,全世界都禁止用于打人。因为用普通子弹打野兽,如果野兽不死反扑过来很危险,所以要用体内开花的“达姆达姆”弹。这是必欲置诸死地时才用的。”二是周恩来在李少石公祭仪式上致悼词说:“敌人无论怎样残暴,共产党人是吓不倒的!敌人越是疯狂,死亡得越快。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显然,这是话中有话,绝非无的放矢。同时,李湄还提出了自己对事件的看

法:“据国民党重庆宪兵司令部的调查,爸爸的死是由于汽车压伤路边一个士兵,士兵的班长便向汽车开枪。由于爸爸已死,司机失踪,我方便没有目击证人。而证人的证言是查案的重要依据。如今,惟一提供证言的,只有蒋军士兵和红岩嘴路边的茶馆老板。国民党宪兵司令部的调查报告成了案件定性的惟一依据。虽然十八集团军办事处也派人到现场进行过了解,但军警宪特都掌握在敌人手里,事情是无法查清的。”10月8日,正值国共和谈经过一个多月拉锯战好不容易达成协议,过两天就要签字的关键时刻,再加上毛泽东冒死犯难去重庆进行谈判,他的安危举足轻重。爸爸的死,无论是什么原因,追究下去都对大局不利。因此当时妈妈什么都没有说。”但这并不意味着李少石的夫人廖梦醒就接受了事件纯属意外的结论,因此事后并没有放弃对事件真相的进一步调查。

当时,社会上有一种观点认为,国民党特务想要谋杀周恩来,因为李少石长相很像周恩来,所以误杀了李少石。建国以后,廖梦醒在重庆公安局查阅李案有关材料时发现,据重庆市纺织工业局在肃反时挖出的潜伏特务钱忠(又名钱振翔、金秉生)交代:“侍从室、稽查处、侦缉队都参与了李少石事件。参与者名单:侍从室——王群、蒋荣根、王启民、周炳辉、金革先;稽查处——陈毅、郭英启、陈锡明;侦缉队——顾立峰、钱振翔、陈国清、李白林、朱辉。新兵队班长开的枪。熊国华化名黄炳光,

在上海整修一厂当副厂长，已入党。”1981年7月，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廖承志收到一封由“知情者”林祖德寄来的与李案有关的信函，提供了如下资料：“1945年秋，国民党反动派指使军统分子、重庆市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行动队第十组组长兰白旗在重庆李子坝到小龙坎之间开枪杀害了李少石，蒋帮阴谋得逞后，以狡诈卑劣的手段伪称追逃新兵开枪误事造成，用以掩盖其残酷罪行。凶手兰白旗因所谓‘功劳’提升为队长。”这两份新的材料使案情本已基本明了的李少石事件变得扑朔迷离起来。

熊国华回忆事件经过，邓颖超否定暗杀之说

建国后，意外之说也不断得到新的资料佐证。其中，最重要的是当年汽车司机熊国华在晚年接受了学者吕荣斌的采访，详细谈了李少石遇难的经过。据熊国华介绍，10月8日，国共两党谈判接近尾声，毛泽东准备返回延安。为此，国民党代表张治中将军要于当日晚在军委大礼堂举行盛大宴会，欢送毛泽东。8日早上，熊国华接到任务，让他准备好车，下午5时30分毛泽东用车。当天下午，关心时局的柳亚子先生来到曾家岩50号拜见周恩来副主席，了解谈判情况，为了不影响周副主席参加宴会，畅谈一会儿就起身告辞，周副主席派他的秘书李少石送柳先生。这样，我们一位同志通知熊国华，让他先把柳先生送回沙坪坝中央大学附近的住宅。此时是下午4时45分。熊国华担心时间来不及，怕影响主席的活动，不想去。这位同志说，你把车开快点，5点半赶回来就行。这样，熊国华急速启车上路，行到中央大学门前时已是5时10分，他急坏了，转身对柳先生说：“我5点半还有要事，必须赶回去，就不能把您送回家了。”柳亚子先生马上下车，步行一段路回家。熊国华拉着李少石急速往回返，离5点半不足20分钟了，他心急如火，一路加大了油门，小车飞也似的在弯弯曲曲的山道上奔驰。行至红岩嘴时是下坡路，左侧是波涛滚滚的嘉陵江，江岸的山崖旁边是八路军办事处。办事处门前一位同志见车速太快，招手示意让慢一点，可是熊国华顾不了这些，小车箭一般地顺着这下坡冲了下去。下坡后，他看见一队国民

党士兵正在峭壁下的山路上向前走，突然一个国民党士兵于车前要横穿马路。在这突发情况下本应急刹车，但刹车不灵，紧急中的熊国华只有迅速调整方向躲开前面这个士兵，但是还必须防止汽车坠入左侧的嘉陵江。由于躲闪不及，这个士兵还是撞在汽车后门上摔倒，但熊国华并没有觉察，继续前行。后面士兵大喊大叫，他也没听见，一个班长竟朝汽车开了枪。熊国华听见枪响急忙回头，只见李少石用手捂住胸部呻吟着。他又急又气，更痛苦万分，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赶紧把少石秘书送入医院……这与当时由国民党当局调查并经中共方面确认的事件经过基本一致，没有实质性的出入。这是主要当事人在事隔半个多世纪后公开表态，再次证明李少石遇难属于意外事件。

此外，据20世纪70年代曾是《人民日报》总编室机要秘书室工作人员的温宪回忆，1976年底，在周恩来逝世一周年前夕，《人民日报》将三篇悼念文章送邓颖超审阅。12月30日晚8时40分，邓颖超给报社机要秘书室打来电话，请值班人员向总编辑转告对这三篇稿子的意见，要求对稿子中某些不实之处加以修正，其中就涉及到李少石事件。邓颖超指出：“1945年主席到重庆去谈判。一天，突然听到李少石被枪杀。当时以为是特务要谋杀恩来。恩来同志知道后，指示要提高警惕，限期查清。第二天查清李少石并不是特务暗杀的。那一天，由于我们那个车要赶时间，有什么急事，走得很急。前面有一群伤病兵，车在超过的时候，碰了伤病兵，结果我们的车没停，一直跑。伤病兵手里有枪呀，他们就开枪。碰巧，那一天车上就坐着李少石一个人，子弹正中要害，死了。后来那个司机一看闯祸了，就跑了。以后，我们再也没看到过那个司机。所以这件事，开始我们以为是谋杀。后来一查不是。我今天还又问了童小鹏，他也说不是那么回事。原来有一个写恩来同志的单车册子也那么讲，总理曾当面进行过批评。我的意见，在这篇文章里，这事就不要提了。不说实话怎么行？！”邓颖超还强调：“对于历史事实，最重要的是要确切，要完整，要弄清楚。”历史就是历史，事实就是事实，不能胡说。”作为与廖家三代关系密切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邓颖超的谈话无疑为李少石遇难属于意外事件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责任编辑 吴 思）

井冈山走来的女战士彭儒

● 唐 瑜

彭妈妈今年 92 岁了,看上去却不像。知情人人都知道目前她已破了四项“纪录”:她是中央纪委唯一健在的大革命时期的女同志;是从井冈山走下来的唯一健在的女红军;是声名远扬的红四军“彭家将”中唯一健在的女将;是“朱毛会师”中唯一幸存的女战士。

92 年,是一段历史,它既记录着一个革命老人南征北战、赴汤蹈火的一生,同时也印证了无数同她一样的革命先烈、仁人志士,为了民族的解放和强盛抛头颅、洒热血、出生入死、死而后已的光辉历程!

92 年,是一个符号,它既铭刻着老一辈的高风亮节、丰功伟绩;同时也启迪着年轻一代开拓进取、奋勇直前,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开创新的辉煌!

为党的事业奉献一生,坚定不移

1928 年 3 月,湘南大地冰封雪裹,寒风刺骨。积雪中,一排杂乱的脚印穿过一片蓊郁的杉树林,一直向罗霄山脉延伸……

在一个小山村旁,围满了衣衫褴褛的人。人群中,一个身材娇小、大约十四五岁的小姑娘正和几个年龄稍大的红军女战士一起振臂高呼:“乡亲们,红军是我们自己的队伍,我们要联合起来,支援红军……”

天气寒冷、空气干燥,再加上连日奔波、过度劳累,一股殷红的鲜血突然从正在喊话的小姑娘的鼻孔中渗了出来。小姑娘皱了皱眉头,走出人群,从路旁摘下一片树叶,揉成一团,将鼻孔堵上,又重新走进了人群……

这个小姑娘便是当年的彭儒。这个小故事,是



井冈山时期,彭儒(坐者右)与贺子珍(站者右一)、康克清(站者左一)等合影

她在参加湘南起义后,跟随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保留部队上井冈山途中,发动群众支援和加入红军的一个片断。

彭儒生于一个开明乡绅的家庭,父亲曾经参加过辛亥革命,当过四届县议员。依她家的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她完全可以过那种安逸舒适的生活,但是,她却走上一条充满艰辛,随时都可能付出生命的革命道路。对此,彭儒说:“一个人要有理想、有信念、有追求。我的信念就是要为党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奉献自己的一生。这个信念一旦形成,我就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1927 年,彭儒正在湖南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读书。当时正值大革命风起云涌之际,各种新思潮吸引和熏陶着她。在学校,她接触到了共产主义



陈正人、彭儒夫妇

的ABC,并且在哥哥、姐姐、嫂子的帮助下,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因此,当湘南起义爆发时,她便毫不犹豫地参加了起义,后又加入了红军队伍,被分配在红四军29团。1928年7月,红四军29团攻打郴州失败,彭儒的叔伯哥哥彭晒、姐姐彭堃、彭娟在战斗中被冲散,最后英勇牺牲。特别是彭娟等人,在郴州战斗中被俘,解回宜章,最后被土豪劣绅游街示众,凌辱而死。面对白色恐怖,当时很多人不愿意干了,跑回了家。彭儒虽然也很难过,但是,为了自己心中的信念,她没有退缩,毅然跟随部队返回了井冈山。

在井冈山,一个严峻的问题摆在他们面前,粮食、衣被、住房、医药都十分紧缺。彭儒所在的29团,枪支少,妇女老少多,问题显得尤其突出。但面对困难,彭儒始终没有动摇革命的决心,她和红军战士一道自力更生、勤俭节约,渡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1928年秋,彭儒在贺子珍、康克清等大姐的帮助下,和当时任湘赣特委副书记的陈正人在革命最艰难的时候结了婚。

1934年10月,由于王明路线的错误领导,中央苏区历时一年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共中央决定长征。当时,中央将彭儒列入了参加长征的名单,而陈正人却留守苏区。夫妻俩面临生离死别,但彭儒没有多想,她坚决服从组织,毅然踏上了长征的道路。然而,队伍出发两天后,因为过河受了凉,彭儒开始打摆子、发高烧。当时,组织上见她病得不轻,就由董必武出面找她谈话,要她留

下,彭儒又一次服从了组织,她被老表们用担架抬回宁都,找到中央分局,从此在中央苏区一带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游击战斗。直到1935年苏区中央分局决定,要她随同丈夫陈正人突破封锁线去白区治病,才离开了苏区。

在白区陪丈夫治病的近两年时间里,彭儒和丈夫始终没有忘记心中的信念,他们每天都在关注国内形势,每天都在打听党的消息,并且为重返党的怀抱做着各种准备。

1937年5至6月间,彭儒和丈夫在经历千辛万苦后,先后来到延安,又见到了毛泽东同志。毛主席见他们俩都还活着,非常高兴,给予他们很大的安慰和鼓励:“你们这些留在苏区的同志能冲破艰险,战胜敌人,来到延安,真是不幸中的万幸。许许多多优秀的同志都牺牲了,但是红军是不可战胜的,红军的党员、红军的干部是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的。”

这时候,抗日战争已揭开序幕,彭儒和丈夫又以更大的热情投身到了抗日战争中去。

消费不是浪费,勤俭节约不能丢

1928年秋,井冈山的枫树林已脱掉青绿的夏衣,换上了一身红妆。这一天,毛泽东同志正和贺子珍坐在一起吃饭。

“子珍姐!”随着一声清脆的叫唤,一个轻盈的身影闪进了屋里。贺子珍抬头一看,原来是彭儒。毛泽东和贺子珍很喜欢这个小妹妹,便叫她坐下,和自己一起吃饭。彭儒答应一声,坐了下来,拨弄着碗筷,却并不怎么吃。待毛泽东一碗饭快吃完时,彭儒突然伸过头去,瞧了瞧毛泽东的碗,然后就起身告辞了。彭儒的举动,让毛泽东和贺子珍觉得奇怪,却弄不明白是什么原因。

其实,小彭儒是来他们家“打探情报”的。原来,彭儒听到一些战士风言风语说:“毛委员表面上跟我们吃一样的饭,实际上好东西都放在碗底。”彭儒很生气,便去一探虚实。经过几次打探,结果令彭儒很“失望”,毛委员吃的菜无非也是茄子、辣椒之类,根本没有肉,和战士们吃的没有什么区别。

这件事引起了彭儒由衷的钦佩。革命战争时代艰难困苦,不仅磨练了老一辈的坚强意志,同样

也在他们的身上形成了勤俭节约、吃苦耐劳的优良作风。彭儒的一生十分节俭,直到现在,老人家还保持了穿着朴素自然、吃饭简单不浪费的良好习惯。

彭儒一上井冈山,就和饥饿、严寒结下了不解之缘。

“红米饭,南瓜汤,秋茄子,味道香,餐餐吃得精打光。”这是一首彭妈妈至今还难以忘怀时时吟唱的歌。当年井冈山人口不满两千,产谷不满万担,老百姓除了自己吃用外,剩下的就不多了。红军上山后,老百姓为了不让红军饿着冻着,宁愿自己少吃点。毛泽东当然意识到,军队要尽可能减少群众的负担,不然时间一长会造成军队脱离群众。因此,他规定无论官兵,每人每天只有5分钱菜金,有时甚至连5分钱也保证不了。山上的南瓜最多最贱,南瓜汤就成为每顿必不可少的菜。生活虽然艰苦,大家却非常乐观。

到了冬天,山高风大,雨雪交加。许多战士穿着单衣、夹衣,有的连草鞋也没有,打着赤脚。盖的东西也很少,每人只有一床军毯或夹被,大家便在地上铺一层稻草,有的同志干脆把稻草塞在夹被里,说这叫“金丝被”,当时有一首歌这样唱道:“干稻草来软又黄,金丝被儿盖身上,哪怕北风和大雪,暖暖和和入梦乡。”

1929年1月13日,湘粤赣三省的敌军分三路进攻永新、宁冈、遂川等县。当时坚守井冈山的红军还不到1000人。经过7天7夜的浴血奋战,终因敌强我弱和叛徒为敌人带路,井冈山失守。白色恐怖笼罩着井冈山,湘赣特委只剩下彭儒、陈正人和王佐农在山上。

那年冬天出奇地冷,一连下了40天大雪,彭儒他们拄着竹棍在雪地里艰难地行走,而此时彭儒正怀着第一个孩子。当时,最严重的问题是没有吃的。一连20天,敌人天天搜山,到处烧杀,彭儒他们只有靠从被敌人烧焦的废墟里找一些烧糊了的谷粒,和着挖来的野菜、竹笋,熬些汤喝。更难受的是没有盐吃,人人腿发软,心发慌。晚上没有盖的东西,只能用杉树皮当垫被,盖着一条破了十几个洞的棉花套,冻得整夜难以入眠。这种恶劣的境况一直到宁冈中心县委书记何长工及时派人找到他们才好转。

1929年秋,彭儒在永新大湾生下第一个孩

子。当时连被褥都没有,只好垫着稻草生孩子,生下这个孩子,彭儒只吃了一个鸡蛋。孩子生下来不到3天,就送给了老乡。后来才知道,这个孩子6岁那年生病,因没钱医治死了。

回忆起这些往事,彭儒感慨万千,她说,为了让人民群众过上好日子,革命前辈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受尽了生活的磨难,我们这些活下来的老同志和现在年轻的党员干部们应当继承老一辈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作为共产党人,要时刻规范自己的消费行为,看是否积极健康,是否勤俭节约,是否想到了人民群众的温饱冷暖”!

为人民办实事,而不是谋取私利

1960年3月5日,明媚的春阳映红了首都北京古老的城墙。

这一天,全国妇联主席蔡畅在纪念“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50周年的广播大会上,宣读了从全国各地遴选的首届“三八红旗手”及“三八红旗集体”名单。

作为当选的首届“三八红旗手”之一,彭儒那天特别高兴。“这并不是因为我得到了一项荣誉,而是我为人民‘干实事、务实绩、创实惠’的观念得到了党和人民的肯定,党和群众的满意是我至高无上的荣誉!”彭儒说。

荣誉的获得,凝聚着彭儒艰辛的工作。1956年,国家农垦部成立,彭儒被任命为农垦部人教司副司长、机关党委副书记。当时,由于机构刚成立,工作人员少,工作任务十分繁重。为此,彭儒总是不分昼夜地工作。大家见她玩命地工作,而且身体又那么瘦弱,就劝她多休息。但她口头答应了,却仍然坚持每天工作到深夜。

不仅如此,她还经常下农场参加劳动和调研。她经常到北大荒、海南岛等垦区去,每次上午一到农场,下午就开始干活。她总是深入到生产一线和群众见面,她说:“要想掌握第一手资料,不仅要跑一个生产队,还要跑更多的生产队,不仅要去看好的生产队,还要去看差的生产队。”

1959年1月,她到粤西团结农场参加劳动时,坚持要到离场部30多里外的开荒前线去,她

说：“现在我们工作的重心就是推动开荒，怎么能不去现场呢？”因为路远，场领导要用车送她，她坚决不要，说：“别人能走我也能走。”

在海南岛东昌农场工作时，她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有一次，她同群众一起开荒，大家怕她累着，便说：“彭大姐，您不用干了，站在旁边看看，就给我们很大鼓舞了。”但她却说：“这样不行，我下来就是要通过劳动向你们学习的。”工人们很感动：“您年岁这么大，又是女同志，还这样干，我们青年人更应该鼓足干劲，加油干了！”

在任的时候，彭儒一心扑在工作上，就是离休了，她还是不肯闲着，时刻关心着民生疾苦。1985年9月，她从中央纪委专职委员的位子上离休。但是，一些群众有什么事情，还是给她写信，有时候一天就收到好几封。对群众的来信，她每一封都十分重视，并且分好类，叫自己的女儿或者秘书转交给中央纪委有关部门，还时不时打电话询问办理结果。

除了努力工作，为人民“干实事、务实绩、创实惠”，彭儒从政观的另一个重要内容便是廉洁自律。她说：“当干部，第一要执政为民，第二要廉洁自律，这两点缺一不可。”

彭儒平易近人，没有一点架子，部下不叫她领导，而是亲切地叫大姐。她把部下当亲人，把他们的冷暖挂在心头。1960年，她一个部下的爱人刚调到北京就生下一个孩子，可他家里还有两个年迈的老人和一个盲女，生活十分困难。彭儒知道后，连忙从家里拿出仅有的几斤红糖和一袋黄豆送到他家里，并从自己也并不宽裕的生活费中拿出20元钱给予支援。这位部下的爱人1994年临终时，还叮嘱女儿要一辈子牢记彭奶奶的大恩大德。

到北京工作后的彭儒，对家人的要求更加严格了。她不允许孩子们坐父亲的公车，说：“那是公家配给你父亲的工作用车，你们没有资格享受”；她要求孩子们打电话的时间不能太长，说：“那是公家的电话，不能占公家的便宜”。凡是和公家沾边的东西，她都严格要求孩子们不要去碰。“母亲对我们的要求十分严格，有些事情现在说起来都叫人不敢相信，但母亲确实是那样要求我们的！”彭儒的小儿子陈洪生说。

离开彭妈妈的家，我们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她从一个娇弱的富家千金，成为一位坚定的红军女战士，并成长为一位坚强的革命女干部，支撑其一生的精神支柱，是她那对革命事业的执着追求和坚定的理想信念。也许当年的小彭儒，是在一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中国传统的爱国理念和共产主义信念的感召下，走上了革命道路。这些宝贵的东西，在经过战争岁月的洗礼和革命浪潮的熏陶后，已深深地沉淀在了她的血液里，使她一生的革命行动变得就如同吃饭穿衣般自觉平常。

彭儒同志的革命人生

彭儒，原名彭良凤，湖南省宜章县迎春镇石彭家村人。1913年3月6日生于一个乡绅家庭，1926年考入湖南衡阳第三女子师范学校，1927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1月参加湘南起义，后参加红军。

1928年，彭儒随朱德和陈毅同志率领的南昌起义保留部队和湘南农军来到了井冈山。上井冈山后，负责湘赣边界妇女工作。1928年秋，和当时任湘赣特委副书记的陈正人结婚。1930年由团转党。历任江西省行委、赣西南特委、永吉泰特委妇委书记。1931年至1934年先后担任江西省委妇女委员会委员，福建省汀州市委组织部部长、代理市委书记，中央苏区中央局妇女委员会委员等。出席了中华工农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34年秋参加长征，不久因病经组织批准返回苏区中央分局，任江西雩都县委宣传部部长。1937年到延安，在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政厅工作，后到延安马列主义学院、中央党校参加学习整风，任党总支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彭儒曾北上吉林省，任延吉市委组织部长、中共吉林省委妇委常委。1949年南下江西，任江西省总工会副主席。后调往北京，历任农业部监察室副主任，农垦部人教司副司长、机关党委副书记，国务院农林办公室机关党委书记，中直机关党委委员等。“文化大革命”时期，受“四人帮”迫害，后在周总理的直接关怀下恢复工作。1972年任国家水产总局顾问、全国政协委员。1979年，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专职委员、“两案办公室”副主任。1985年9月离休。

（责任编辑 李 晨）

马寅初—— 单枪匹马 战死为止

● 杨勤明



马寅初

2005年1月6日,中国人口达到13亿(不包括港澳台约3000万),占世界总人口65亿的五分之一。13亿是个巨大的数量,需要多少粮食、多少棉花,才能使人人都吃饱穿暖?虽然,我国从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执行“控制人口,计划生育”的国策,但由于基数大,目前每年净增人口即达1400—1500万。据预测到2040年,中国人口将达16.5—17亿。过去有科学家测算,根据我国的自然资源和地域环境,只能养活16亿人口。如此,到本世纪中叶,中国人口已呈超饱和状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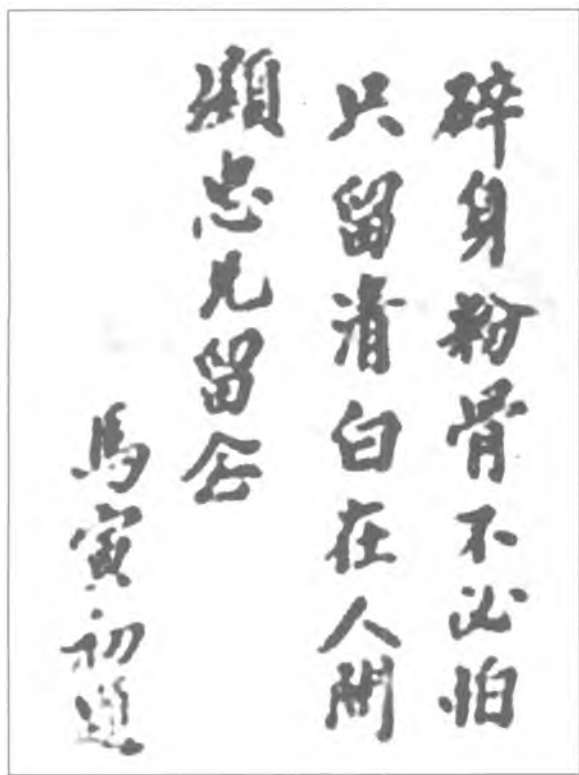
新中国建立56年,由于全国人民的努力,经济总量已达到世界第七位。但按巨大的人口总数平均,人均GDP(国民生产总值)2004年仅为1270美元,不到世界平均水平5800美元的四分

之一,列全球第130位。按我国现行标准,年收入少于668元人民币者列为贫困人口,有2610万;而按国际标准,每日少于1美元即列为贫困人口,则达2.8亿,占我国13亿人口的21.5%,即每5个人中还有1个穷人。

1949年新中国建立时,人口约为4.5亿,到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时,已突破6亿大关。1979年夏,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兼组织部长的胡耀邦为著名经济学大师、因人口问题遭殃的马寅初平反,含着眼泪说:“当年毛主席要肯听马老一句话,中国今天的人口何至于突破10亿大关啊!批错一个人,增加几亿人,我们不要再犯这样的错误了。共产党应该起誓,再也不准整科学家和

知识分子!”当时马老已经98岁高龄,下肢瘫痪,耳朵也有点背,他在轮椅上听了为他平反的通知,只淡淡地说了一句话:“二十年前中国的人口并不多,现在太多了,你们不要再误事了。”从1953年到1979年,26年就增加了4亿人口,而从1979年到2005年,也是26年,由于实行了计划生育,只增加了3亿人口,少生了3亿。

上世纪50年代初,马寅初回浙江老家研究人口问题,随后给周总理写了一份报告:“人口问题是关系到中华民族前途和命运的一件大事,必须引起重视,早为之图。”建议全国进行人口普查并提出了控制人口的意见。当时人口增长率已达20%以上,周总理支持并鼓励马老专注于人口问题的调查研究。马老时已年逾古稀,不辞劳苦,率领助手和学生,奔赴浙江、江西、陕西、山



马寅初手迹

东、上海、江苏和北京郊区各县进行调查,掌握了更多的人口增长数据。1953年12月7日,在刘少奇召集的“提倡节育”专门会议上,马老谆谆告诫:“人口问题,千万千万大意不得!现在不努力,将来后悔莫及!”但毛泽东持不同看法,多次批评马寅初等学者“杞人忧天”,有的地方还在号召学习苏联的“母亲英雄”,对多生育妇女进行奖励。

1954年,马老以人大代表身份第三次回到浙江农村调查,在调查报告中写道:“人口出生率高得不得了!人口增长速度快得不得了!这样发展下去简直不得了!中国人多地少,人口增长的速度大大超过了生产增长的速度,长此以往,国家怎么能富强?”三个不得了,表达了马老的忧心如焚。他和老朋友邵力子、李德全等商量说:“现在我国人口增长率已达22%以上,甚至达到30%,每年净增人口1300多万。如果不采取措施,我们会犯极大的错误,会给国家带来极大的困难,新中国将会背上一个极其沉重不易摆脱的包袱。”在他们支持下,马老参阅了古今中外有关人口问题的典籍,写成《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的长篇论文,于1955年7月召开的人大一

届二次会议上,以正式提案提出。却遭到康生、陈伯达等人的围攻和批判。马老不为所动,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主张是正确的。

1957年春,在中南海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当着毛泽东的面,马老再次提出人口问题,直言不讳地说:“人口太多,是我们的致命伤。1953年普查已经超过了六亿,如果按净增率20‰计算,15年后将达到八亿,50年后将达到十五亿。这绝不是我马寅初的哗众取宠,危言耸听……如果不控制人口,不实行计划生育,后果不堪设想!”刘少奇、周恩来表示赞同,毛泽东则笑了笑说:“人口是不是可以搞成有计划的生产,可以进行研究和试验嘛!言人之未言,试人之未试嘛!”马老以为这次“廷诤”有了结果,加紧人口问题的研究写作,完成了他的名著《新人口论》,于1957年6月提交人大一届四次会议。7月5日《人民日报》整版刊登,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不久康生首先发难,用化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说有人借人口问题搞政治阴谋,这完全是右派进攻。6月1日《红旗》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毛泽东《介绍一个合作社》的文章,针对“中国人口多,难于前进”的“反动观点”,提出“人多是好事情不是坏事。除了党的领导之外,6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但年近八旬的马老并不准备投降。

随着“反右”运动的深入,全国主要报刊纷纷发表批判马寅初的文章达200多篇,给他扣了三顶大帽子:宣传马尔萨斯主义,反对“人多好办事”的唯物史观,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马老要求会见毛、刘、周三人中的任何一人未果,却传来毛的话:“马寅初先生不服输,不投降,可以继续写文章,向我们作战嘛!他是个很好的反面教员嘛!”马老义无反顾,公开发表文章宣称:“为了国家和真理,我不怕孤立,不怕批斗,不怕冷水浇,不怕油锅炸,不怕撤职坐牢,更不怕死。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都要坚持我的人口理论。”

1958年对马寅初的批判,已从学术范畴升级为政治斗争和人身攻击。1959年夏,马老随人大视察团赴外地视察,目睹大跃进、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给人民群众带来灾祸,感到痛心疾首,未免发些牢骚。回京不久,周总理代表毛泽东、党中

央找他谈话,要他作检讨。但谈来谈去谈不拢。最后周总理几乎用一种哀求的口吻说:“马老啊!你比我长19岁,你的道德学问,我是一向尊为师长的。1938年你我在重庆相识,成了忘年之交,整整有20年了啊!人生能有几个20年呢?这次你就答应我一个请求,对你的《新人口论》写出一份深刻的检讨,检讨了,你好我好大家好,也算是过了社会主义这一关,如何?”马老明白不到万不得已,总理不会说出这样的话,但要马老违心作检讨,也实在办不到。他沉思良久,最后进出这样两句话:“吾爱吾友,吾更爱真理。为了国家和真理,应该检讨的不是我马寅初!”几天后,马老写了《重申我的请求》,交《新建设》杂志发表,文中说:“有几位朋友,劝我退却,认一个错了事。要不然的话,不免影响我的政治地位,甚至人身安危。他们的劝告出于真挚的友谊,使我感激不尽,但我不能实行。这里,我还要对另一位好友准备谢忱,并道歉意。我在重庆受难的时候,他千方百计来营救,我1949年从香港北上参政,也是应他的电召而来。这些都使我感激不尽,如今还牢记在心。但是这次遇到学术问题,我没有接受他真心实意的劝告,因为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的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只得拒绝检讨。我希望这位朋友仍然虚怀若谷,不要把我的拒绝视同抗命,则幸甚。”最后他严正声明:“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显然这位好友就是周总理。

毛泽东读了《重申我的请求》一文,指示秘书:“反右斗争已取得全面胜利,马寅初仍然向我们下战表,可说是茅坑里石头,又臭又硬,马寅初不愿自己下马,我们只好采取组织措施,请他下马了。”1959年12月5日,康生向应召而来的北大党委书记指示:“马寅初仍在负隅顽抗,死不投降,他是在搞右派进攻,反党反社会主义,矛头指向党中央,一定要从政治上把他批臭,不能再做北大校长,通知他不辞职就撤职。”这番话当然不是康生个人意见。一夜之间,上万张大字报贴满了北大校园,甚至马老的院子里、书房里和卧室里都贴满了大字报。小会批也成了大会斗,彻底批判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新

人口论》!“打倒中国的马尔萨斯——马寅初!”马寅初不投降,就叫他灭亡!”这些口号声响彻北大校园。

1960年1月3日,马老被迫搬出北大燕园,迁到城内东总布胡同32号居住,规定他不得发表文章,不得公开发表讲话,不得接受新闻记者采访,不得会见外国朋友和海外亲友,他的一举一动都在街道派出所和居委会的监视之中,实际上遭到了软禁,被冷藏了20年。1965年夏,他从报端敏锐觉察到个人崇拜之风开始弥漫全国,如不纠正,将会祸害无穷。他又上书党中央,希望人民领袖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作风,保持客观冷静头脑,决不可行“领袖至上”那一套。1966年夏,文化大革命狂飙席卷神州大地,马老这个“反共老手”“漏网右派”“反动学术权威”被红卫兵上门轮流批斗,动嘴加动手,既触及灵魂又触及皮肉,后周总理发话:“马寅初是只死老虎,早就批倒批臭,再批他意思不大吧!”才幸免于难。

马寅初铮铮铁骨,为坚持真理而威武不屈、万死不辞的崇高精神,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将传世于中华民族千秋万代。实践已经证明,他的人口理论是正确的。如果当初听他一句话,现在人口不是13亿,可能是8—9亿,可减少4—5亿。这个沉重包袱已经背上,后悔莫及,但愿如胡耀邦所言:“共产党应该起誓,不准再整科学家和知识分子了。”但愿决策者以史为鉴,汲取教训,多听取专家、学者的意见,不搞“一言堂”,坚决地、真正地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和“言论自由,言者无罪”的政策,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真理会愈辩愈明,则国家幸甚!人民幸甚!(责任编辑 李晨)

敬告读者

《炎黄春秋》合订本库存数量已不多,欲购请速汇款。历年合订本价格如下:

2005年精装	75元;	简装	70元
2004年精装	75元;	简装	70元
2003年精装	75元;	简装	无

注:以上均免收邮费

汇款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收款人:炎黄春秋杂志社

邮政编码:100045 电话:010-68532048

核物理学宗师王淦昌

● 顾迈南

我国原子弹、氢弹的研制工作,之所以走在世界前列,除了党的坚强领导、全国大协作外,还因为我国有一批饱经忧患、历尽沧桑,了解中国国情,又有强烈爱国心的科学家。他们之中,就有在国内外享有盛名的核物理学家王淦昌。

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我曾多次接触并采访过王淦昌教授,在他北京的寓所里,在他领导的北京原子能研究所,以及中国核武器研究院,听他和他的助手们讲起过他非凡的人生经历,以及他的科学成就和他参与带领年轻人研制中国“两弹”的故事。人们不会忘记,正是王淦昌教授积极倡议创建了中国的核电事业;正是他和一些著名科学家联名写信给党中央,提出了目前正在实施的“863”计划。

清华园岁月

1928年深秋季节,清华园里一片秋色。

上课的铃声响过后,刚从美国留学归来的吴有训教授快步走进了物理系教室。在国外,他亲眼目睹了欧美正在日新月异进步的科学技术,心里很着急。这天,他在黑板上写了一长串数学公式,然后回过头来说:

同学们,翻开近代物理史就可以知道,人类的认识,是随着科学上层出不穷的新发现前进的,假定光是由名叫光子的微粒组成的,那么,当一个光子射到一个静止的电子上,又被散射到另外的方向时,它们的能量变化将是怎样的呢?

课堂上十几位大学生出神地听着,坐在前排中间的王淦昌思索、计算了片刻,举起手来,腼腆地回答了吴有训教授的提问。

“说得对,说得对!”吴有训听了连连点头。

王淦昌刚一讲完,其他同学也举起手来报告说,自己也找到了答案。吴有训耐心地听完,笑着说:“同学们说得都对,这种散射就叫‘康普顿效应’,它是美国一位叫康普顿的科学家首先发现的,因此而得名。在美国,我曾经和康普顿教授一起就这个问题做了一系列的实验,所以有的时候,人们也叫‘康普顿——吴有训效应’。”

讲到这里,吴有训勉励大学生们说:

“这都是历史上的事情了。人类对自然界的探索是无止境的。就拿近代物理来说吧,还有许许多多的效应、规律、原理,没有被发现,被认识。我希望同学们树立远大志向,去发现一个又一个效应和规律,在世界科学史上,让更多的效应和规律,用我们中国人的名字命名。”

吴有训的话,像一团火,点燃了年轻的王淦昌为科学献身的激情。

在这之前,王淦昌从故乡江苏常熟来到清华大学读书。他深知上大学的机会对他来说是多么难得。四岁时,他的父亲去世,13岁时母亲又死了。后来,他只好投靠哥哥抚养。不久,哥哥也去世了。幼小的王淦昌依靠外婆抚养长大。离开家乡的时候,外婆拉着他的手送了一程又一程。嘱咐他说:“孩子,你长大了,你生活得不容易啊。进了大学,要好好地用功读书,不要忘了你死去的母亲……”分别时,他和外婆都哭了。

进了清华园,他的勤奋和好学,很快得到了老师们的青睐。

王淦昌在吴有训、叶企孙教授的直接指导下,进步很快。从这时起,就养成了自己动手做实验的习惯。1929年他从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时,用自己制作的简单仪器,测量了学校周围氢气的强度和每天的变化,然后把自己得到的实验结

果,写成了毕业论文《清华园上空大气层的放射性》。这是研究中国上空放射性物质含量的第一篇实验报告。王淦昌作为清华大学的第一届毕业生,走出校门以后,便以实验物理开拓者的姿态,走上了艰苦的攀登之路。

在德国留学的日子

1930年王淦昌赴德国柏林大学留学。他在犹太籍女科学家梅特纳教授指导下,从事 β 衰变能谱的研究。于1933年获得博士学位。

王淦昌在德国留学时,正是希特勒上台前夕,柏林到处乱哄哄的。宁静的实验室里,不时传来刺耳的警报。空气里充满了火药味,战争仿佛就要来临。

三年半的研究生生活结束以后,一天,梅特纳教授忽然向他告别说,她要到瑞典去了,而且不能够再回德国,因为她是犹太人。使王淦昌感到震惊的是,这样一位对原子核物理学做出了卓越贡献的科学家,也无例外地受到了迫害。几天以后,梅特纳就被驱逐出境了。

“是继续留在德国呢,还是回国?”梅特纳教授走后,王淦昌沮丧地想。这时,他从德国报纸上已经知道,中国的大片国土已被日本侵略军占领,人民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看了这些消息,他的心情十分焦灼不安。

一天,柏林大学的学生们聚集在校园里,七嘴八舌地议论纷纷,讨论的中心问题是:怎样看待“九·一八”事变。

“中国人太无能了,日本人的进攻节节胜利,是在预料之中的事情!”有的学生说。

“优秀民族统治落后民族,理所当然嘛!”

“不管怎样,日本人干的是侵略别国的行为,理应受到谴责!”

王淦昌在一旁听了德国学生们的议论,觉得脸上火辣辣

的。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使他心头燃起了雪耻的欲望。他决定赶紧收拾行李离开德国,与祖国共存亡。

这时,王淦昌的卓越才能和工作成绩,已经被德国核物理学界注意上了。他要回国的消息传出后,德国同事劝他说:“你如果愿意的话,你可以在德国长期工作下去。”

“不,我不准备留在德国,我是个中国人!”

“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你是一位科学家,留在德国,会有很好的前途!”

“是啊,科学是没有国界的,可是人却是有国界的!”他从梅特纳教授的遭遇中,已经深深地懂得了“祖国”两个字的神圣含义。虽经劝说,最后他还是斩钉截铁地拒绝说:“我是个中国人,现在,我的祖国正在流血,我要立即回去报效她!”

1934年,王淦昌回到了战火纷飞的中国。

终生的遗憾

王淦昌从万里之外归来,他先是在山东大学任教授,1936年以后又到浙江大学教书。



本文作者(右)与王淦昌(左)合影

“八·一三”事变后,日本侵略军迅速向全中国进犯,大片的城市和乡村硝烟四起。

王淦昌带着全家人随着浙江大学的队伍开始逃难。这时,他已是5个孩子的父亲,他和全家人从杭州出发,经过江西、湖南、广西,沿途搭车乘船,有时还要步行,历尽跋涉之苦,最后到达贵州的湄潭。

在湄潭郊区,王淦昌一家7口人住在一间只有十几平方米的草泥房子里。白天,他到浙江大学教书,靠着有限的收入养活妻子和孩子们,晚上常常工作到深夜。有时候,睡在阁楼上的孩子们一觉醒来,从楼板缝里发现,他们的父亲还在小油灯下伏案工作呢。

在战争年代里,孩子们见父亲越来越瘦,就在屋后的山坡上养了一只羊,为的是挤些奶给他增加营养。王淦昌也很疼爱孩子们,他永远忘不了给生病的孩子买二两猪肝而经历的一段辛酸往事。有一天,他走进一家肉店,央求店老板卖给他二两猪肝。

“不卖!”肉店老板冷冷地说。

“我的小孩子病得快不行了,卖给我一点吧!”他几乎是在乞求。

“不卖就是不卖,对于你们这些穷教员,有钱也不卖!你的小孩子死不死,和我有什么关系!”他就这样两手空空地回到了生病的孩子身边。

.....

“唉,真是太困难了。不然,我还可以做更多的事情。”回忆往事,王淦昌感慨地说。在艰苦的战争年代,像王淦昌这样一位连二两猪肝都得不到的科学家,朝思暮想的却是如何多为国家和人类做贡献。

谁会想到,世界核物理史上的一块丰碑,竟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树立起来的。

1986年10月,著名物理学家严济慈在《王淦昌论文选集》的序言中写过这样一段话:“王淦昌同志是我国实验原子核物理、宇宙射线及基本粒子物理研究的奠基人之一.....抗日战争期间,浙江大学几经搬迁,到贵州湄潭不久,他独具卓见地提出了验证中微子存在的实验方案,然而在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却不可能付诸实施。于是他写了一篇短文寄往美国的《物理评论》,发表于

1942年1月。不数月,美国阿伦博士(J·S·Allen)按照这一建议初步证实了中微子的存在。以后,实验核物理学家们继续按照王淦昌同志的建议,进行了一系列工作,最终确认了中微子的存在。”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上个世纪30年代初期,科学家们曾经预言,自然界存在着一种“鬼粒子”,并预言说,这种粒子可以人不知、鬼不晓地从宇宙空间飞来,穿透地球上最坚硬的岩石,然后到达很深的地下。

这种学名叫“中微子”的“鬼粒子”,究竟有没有呢?如果有,怎样才能捕捉到它?王淦昌经过反复研究,提出了一个验证中微子存在的实验方案。这个方案,当时在国内是不能实施的,因为缺乏仪器设备。1942年他把它写成一篇论文,寄给了美国的《物理评论》发表了。

半年以后,美国科学家阿伦根据王淦昌提出的方案,证实中微子确实是存在的。这次发现,被当做人类认识微观世界的里程碑载入了史册。中国人王淦昌的名字,也因此写进了全世界第一本原子核理论教科书上。

然而,当人们赞扬这个伟大发现,纷纷向王淦昌表示祝贺时,他却并不以为然,他说:“中微子的实验,没有在中国进行,是我终生的遗憾!”

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

1960年3月26日,苏联塔斯社向全世界发布了一条重要新闻:“设在莫斯科附近杜布纳的联合核子研究所,一批科学家获得了一项有重大科学价值的发现,他们发现了科学界过去不知道的一种新的基本粒子——反西格马负超子。”

塔斯社在另外的一条新闻中还宣布说:“这一批科学家中,包括中国的王淦昌教授和苏联的维克斯列尔院士.....”

王淦昌在解放前就开始了宇宙线的研究。1947年,他在美国利用宇宙线研究了 $\mu\mu$ (拉丁语)介子衰变的特性。回国后,在浙江大学因陋就简地筹建了宇宙线实验室。解放后,1950年他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1952年,担任了该所的副所长,在国家有关部门的积极支持下,在1953年到1956年期间,他领导建立了

云南落雪山的宇宙线实验站,利用多板云雾室和磁云雾室研究基本粒子及其相互作用,取得了一大批奇异粒子事例,研究了奇异粒子的性质,使我国宇宙线的研究进入了当时国际先进行列。

1956年,王淦昌作为中国专家组组长奉派赴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工作,1958年担任了该所的副所长。他直接领导的研究组发现了反西格马负超子(Σ^-),成为该研究所100亿电子伏特质子同步稳相加速器上最重要的研究成果。

关于这个发现在科学上的意义,22年以后,中国发明制造评选委员会给予了这样评价:“反西格马负超子的发现,是项了不起的重大发现,它是实验中第一个发现的荷电反超子,它的发现,填补了粒子——反粒子表上的一项重要空白。这个发现,在科学上的意义,仅次于正电子和反质子的发现!”

最后,由钱三强、钱学森等人组成的评选委员会,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一致决定:授予王淦昌等发现者一等自然科学发明奖。

反西格马负超子的发现,在当时引起了巨大轰动。世界各国报纸纷纷刊登了关于这个发现的详细报道,王淦昌本人更是受到了苏联科学界的高度重视。有关部门又是派画家给他画像,又是写文章赞颂他的才华,美丽的姑娘也被派到了他的身旁……

金钱、荣誉,都未能使王淦昌久留异国他乡。当时,国内正值三年困难时期,使王淦昌魂牵梦萦的是国内的形势。一天,他独自一人走出了杜布纳核子研究所所在地的森林,乘火车到了莫斯科,直奔中国驻苏联大使馆,找到一位负责人,从自己的皮包里拿出了10万卢布,说:“这是我在国外工作期间节省下的钱,请使馆收下,转交给祖国和人民吧。”

那位负责人听了迟疑半晌,说:“这合适吗?”

王淦昌激动地对使馆负责人说:“请收下吧,这是我的一点心意。游子在外,给父母捎些家用钱,是应该的。”

从使馆出来,他独自一人走在莫斯科大街上,不禁又想起了柏林大学校园里的讥讽,想起了战火中在大后方经历的困苦生活,想起了新中

国诞生时人们的喜悦和期待。他喃喃自语说:“新中国啊,我不能没有你。”

不久,王淦昌便奉命回国了。回国后,一件意料不到的重任,落在了他的肩上。

一切为了“596”!

“淦昌同志也是我国核武器研制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他于1960年从苏联回国,次年3月调任核工业部第九研究院(简称九院)副院长。他不仅参与了我国原子弹、氢弹原理突破及第一代核武器研制的实验研究和组织领导,而且在爆轰试验、固体炸药工艺研究和新型炸药研制,以及射线测试和脉冲中子测试方面,指导解决了一系列关键技术问题。在开展地下核试验过程中,他花费了巨大的精力和时间,研究与改进测试方法,使我国仅用很少次数的试验,就基本上掌握了地下核试验测试的技术关键。”著名物理学家严济慈教授在《王淦昌论文选集》中的这些评价是不过分的。严济慈在该书的序言中还说:“淦昌同志一直十分重视核武器研制中的基础研究工作,早在1962年,他就领导开展了新兴的脉冲 χ 射线技术的研究,用于测量瞬时压缩度的问题。在他的指导下,建成了大型强流脉冲电子加速器。”

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苏联毁约停援后,中国的核工业建设进入了全面自力更生的新阶段。当时,国际上有人认为,苏联毁约停援,是对中国核工业的毁灭性打击,从此以后中国将处于核技术的真空状态,再过几十年也搞不成原子弹。国内有些人也信心不足。为了打破霸权主义的核讹诈,造出中国自己的“争气弹”,为了让人们记住苏联撕毁协议的日子,中国前核工业部负责人刘杰,提出把原子弹的研制工程命名为“596工程”。一时间,一切为了“596”,成了全国一致的行动。

原子弹研制是一项涉及多种学科、综合性很强的工作,需要有多种专业、高水平的科技人员通力协作。苏联毁约以后,王淦昌二话没说,告别了妻子儿女,打起背包,穿起布衣服,化名“王京”,三天之内便奉命到核武器研究院报到了。

“失踪”之后的王淦昌在四年时间里,时而

奔走在长城内外的荒山野岭,时而到茫茫的戈壁滩风餐露宿,在凛冽的寒风里,在炎炎烈日下,他和参加研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人们,历尽艰辛,利用极为简陋的条件,从理论物理、爆轰物理、中子物理、金属物理和弹体弹道等几个方面,进行了探索。

在荒凉的戈壁滩,在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平均海拔 3200 米,年平均气温在摄氏零下 0.4 度,高寒缺氧,自然条件十分恶劣。王淦昌等人,喝的是煮不沸的水,吃的是夹生饭,粮食、副食供应不足的时候,他们就打骆驼草子,开荒种地,打猎捕鱼,千方百计地补充主副食品。1968 年,王淦昌与朱光亚、郭永怀三位科学家准备一起去基地,他和朱光亚因为临时有事未能成行,郭永怀因飞机在北京机场上空失事而遇难。听到这个消息,人们十分震惊,设想如果三位杰出的科学家同乘那架飞机,中国的核科学事业将是一种怎样的局面。

1979 年冬天,72 岁的王淦昌教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那天,他说:“生命毕竟是有限

的,我要把余年用来给人民造福,尽一个科学家的本分!”

在北京西山脚下的原子能研究所里,古稀之年的王淦昌还在孜孜不倦地带领年轻人研究受控热核聚变。人们问他为什么年逾古稀还不知疲倦地工作时,他说:“要知道,一升海水所含的氢放出的能量,相当于 300 升汽油燃烧后放出的能量呢!我们的实验如果成功了,我国的能源就不愁了。”

王淦昌又说:“受控热核反应的实现,将是人类解决长远能源问题的根本途径。我要在有生之年,竭尽全力研究它,争取早日在中国实现受控热核发电,让大海为人类提供无穷的能源。”

由于王淦昌教授对中国科学技术事业和国防建设的卓越贡献,使他成为两项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和一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的主要获得者之一。在近 60 年的漫长岁月里,王淦昌教授一直奋斗在科研前沿,为中国核科学技术的发展,不断开拓新的科学领域。

(责任编辑 李 晨)

全 球 社 区 人 文 杂 志 市民



P1	卷首语: 开放时代的居住理想
P4	读者广场: 让社区来救助“问题少年”(6则)
P8	观察
	中国需要更均衡的增长(2则)
	社会主义不是“画蛇添足”(3则)
	民众反腐至关重要(3则)
	行走四省,感恩珠江(3则)
	无聊也是生产力(12则)
	讲真话需要制度环境(5则)
P14-82	独家策划
	大局篇
P16	[政策观察]

赵 晓: 以政治文明重构地产模式 (3篇)

P20 [现象感言]

温铁军: 公民权利要反制资本力量 (5篇)

P26 [人间故事]

刘亮邦: “地下人”的梦想 (2篇)

P27 [奇思妙想]

东莱马汉三: 闲置房变旅社 (2篇)

城市篇

P30 [城外看城]

俞孔坚: 这是个山河破碎的时代? (5篇)

P36 [新乌托邦]

薛 涌: 周末陶渊明 (3篇)

社区篇

P40 [自治理念]

陈幽泓: 让社区走向开放 (3篇)

P46 [创新思路]

缪国斌: 明购: 从择房到择邻 (5篇)

P50 [群居感言]

刘广生: 小区要有自由民主的空气 (4篇)

吾庐篇

P54 [艺术眼光]

罗 旭: 要住得自由和自信 (9篇)

P60 [学人情怀]

鄯烈山：我的《白兔记》（8篇）

P66 [居家心语]

李育中：免于恐惧的自由（14篇）

天地篇

P72 吴强：从简单生活到和谐世界（3篇）

P82 [新浪TOP10]

大侠小虾的居住理想

P86 新公民

矢志赴坎坷，痴心到白头（石地）

——82岁网友萧一湘的“寻火”之旅

P90 特稿：高架桥下忘年交（周炯）

P94 地球村

P94 球歌嘹亮（杜伊客）

P96 博客时代，人人都是政治家（路加父）

P100 思想与文化

P100 黄苗子和郁风：一流人物一世情（李怀宇）

P105 写实主义的诱惑（刘瑜）

P108 城市人文阅读榜（黄明雨）

P110 随笔

P110 [非常道] 善意之骗（余世存）

P111 [汉字心解] 王（王以培）

P112 [打个哈欠] 粉红色的松绑（吴稼祥）

——看超女长沙赛区五进三

“笔挟风霜” 的《点将录》

● 李 乔

明末崇祯年间,常熟有个叫秦兰徵的秀才,写了一百首宫词,题曰《熏庙拾遗百咏》,咏明熹宗天启年间的宫廷史事,其中有一首云:

星名次第列银光,点将标题当饮章。

圣主青年方好武,卷头先问李天王。

从字面上看,这首宫词冲淡闲适,颇有“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的韵致。但实则其中却包含着一段严酷的历史。

秦兰徵诗末有段自注,云:

邹之麟用《水浒传》天罡地煞星名,配东林诸人,以供谈谑之资。如托塔天王,则李三才也。天罡星(笔者注:应为天魁星)及时雨,则叶向高也。崔呈秀廉得之,名之曰《点将录》。佳纸细书,与《天鉴录》、《同志录》,同付忠贤。忠贤乘间以达御览,上不解托塔天王为何语,忠贤述《水浒传》溪东西移塔事,上忽鼓掌曰:“勇哉。”忠贤于是匿其书不复上闻。

这段自注,实际是明末阉党迫害东林党人的历史的一个侧影。

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是明末政坛上最黑暗、最丑恶的政治势力,东林党人则是一批较为正直、有骨气的士大夫。阉党势焰熏天,东林党则势力较弱。阉党对东林党人的迫害,既有血腥的肉体消灭,也有流氓无赖式的攻讦陷害。其攻讦陷害的一个毒招,就是编拟东林党人的黑名单。秦兰徵诗注中所举的《点将录》、《天鉴录》、《同志录》,就是这种黑名单。实际上,当时各种名目的黑名单还有很多,如《东林朋党录》、《盗柄东林伙》、《伙坏封疆录》、《初终

录》、《同心录》、《石碣录》、《伪鉴录》、《蝗蝻录》、《稊稗录》等等。在这诸种黑名单中,最阴险歹毒、最具攻击力的,当是《点将录》。

《点将录》,全名《东林点将录》,即秦兰徵诗注中所说的那份“用《水浒传》天罡地煞星名,配东林诸人”的名单。这份名单,一共有109位东林党人的名字,每个人的姓名前,都冠以《水浒传》中梁山头领的星宿名和绰号。如名单中的前几位:

开山元帅托塔天王南京户部尚书李三才

天魁星及时雨大学士叶向高

天罡星玉麒麟吏部尚书赵南星

天闲星入云龙左都御史高攀龙

天杀星黑旋风吏科都给事中魏大中

天勇星大刀左副都御史杨涟

天雄星豹子头左佥都御史左光斗

这当中的第一、二名李三才、叶向高,秦兰徵诗注中作为例子提到了。在《水浒传》里,“梁山泊英雄排座次”时共有头领108人,加上早亡的晁盖,共计109人。《东林点将录》中的109人,就是按照《水浒传》上的这109之数配定的。“点将录”三字中的“将”字,暗指这109名东林党人,如同梁山上的108将。《点将录》中的东林党人的排序,是阉党按照自己眼中各党人的重要程度排列的,而究竟以哪个梁山头领的星宿名和绰号配给哪个东林党人《点将录》的作者则是经过仔细推敲后,以牵强比附的手法确定的。

关于《点将录》的作者是谁,秦兰徵的诗注

中说是邹之麟,但《明史》魏忠贤传和王绍徽传皆说是王绍徽。《四库全书总目》也确定为王绍徽。王绍徽,咸宁人,出身于官宦之家,中过进士,官至吏部尚书,本“以清操闻”,但后来投到了魏忠贤的旗下,认魏忠贤做了干爹。《明史·王绍徽传》记载:“初,绍徽在万历朝,素以排击东林为其党所推,故忠贤首用居要地。绍徽仿民间《水浒传》,编东林一百八人为《点将录》,献之,令按名黜汰,以是益为忠贤所喜。”按照这里所记,王绍徽是亲自把《点将录》献给魏忠贤的,但秦兰徵诗注则说,是阉党崔呈秀在市上廉价购得后呈送魏忠贤的。这两种情况,我想可能都有,因为魏忠贤的党羽甚多,他完全可能从不同渠道得到多部《点将录》。从秦兰徵诗注中可以看出《点将录》当时在社会上已经流传开来。

何以说编拟《东林点将录》是个险恶的毒招呢?或许更有疑者问,这份名单以梁山好汉的绰号来称呼东林党人,应属美称,谈何是毒招?

那就让我们先来看一下魏忠贤得到这个名单时的反映。据无名氏《遣愁集》一书载,魏忠贤看了这份名单后,非常兴奋,说了这样一句话:“王尚书妩媚如闺人,笔挟风霜乃尔,真吾家之珍也。”大概因为时任户部尚书的王绍徽有妇人相,故魏忠贤说他“如闺人”。魏忠贤的心肠,无疑是绝顶的又黑又硬,又是个惯使毒计的阴谋家,但连他看了这份黑名单以后,都感到“笔挟风霜”,可见这份黑名单端的是厉害。厉害在何处?就在它用牵强比附的手法,把被人称作“魔君”、“贼人”的梁山头领的绰号,安在了东林党人的头上,以暗指东林党人是与梁山“贼人”一样的恶徒邪党。

阉党在这里,实际是袭用了讼师、恶吏借绰号以整人的老谱。鲁迅先生曾说:“中国老例,凡要排斥异己的时候,常给对手起一个诨名,——或谓之‘绰号’。这也是明清以来讼师的老手段;假如要控告张三李四,倘只说姓名,本很平常,现在却道‘六臂太岁张三’、‘白额虎李四’,则先不问事迹,县官只见绰号,就觉得他们是恶棍了。”(《华盖集·补白》)历史上的流氓、盗贼,大都有自己的绰号,他们的绰号,又都具有凶悍、刁蛮、猥琐的色彩,因而,人们往往一听

到这种色彩的绰号,便会猜想绰号的主人决非善类。正因为有此社会心理,讼师、恶吏便得以借此整人。《水浒传》写清风寨的知寨刘高,捕获宋江后,宋江不肯吐露真名,只报以张三,刘高为了把他坐实为贼盗,就上报其名为“郓城虎张三”。《点将录》用的正是这种手法。王绍徽这个阉党,把不知从哪儿学来的讼师恶吏的手段,也用到党争上,用到迫害正人君子上了。

梁山头领,我们今天称之为好汉,称为造反英雄,但在明朝人的眼里,特别是在上层阶级眼中,梁山头领都是贼人、豪猾、草泽无赖。不仅阉党这样看,东林党也是这样看的。对于《水浒传》,明朝廷向来都采取厉禁的态度,认为此书“以杀人放火为豪举”,应当“速令尽行烧毁”。(左懋第为陈请禁毁《水浒传》题本)所以《点将录》给东林党人冠以梁山头领的绰号,就等于给他们扣上了“恶徒、贼人”的帽子,就是要告诉世人:这伙东林党人,都是像梁山贼人一样的混世魔头,是该杀的逆种。翻开《水浒传》第一回,开宗明义就说108将是洪太尉不慎放走的魔君,再看看“黑旋风”、“活阎罗”、“立地太岁”、“母药叉”、“拼命三郎”、“赤发鬼”、“丧门神”这些充满鬼气和杀气的绰号,确实极易让人产生联想:名单中的这些东林党人,都是和梁山头领一样的魔头。魏忠贤说这份名单是“笔挟风霜”,真是有眼力的评语,这份名单着实带着一股强烈的阴冷肃杀之气。东林党人看到这份名单后,感受如何,不得而知,但我猜想他们一定是极为恼火和愤恨的,胆小者也许会心惊肉跳。这份黑名单,实际是阉党下决心清除东林党的一个信号,是一纸向东林党下的战书。这份黑名单的直接后果,就是《明史·王绍徽传》里说的,“按名黜汰”东林党人,东林党人遭到了无情的清洗和迫害。

秦兰徵诗注说,魏忠贤曾把这份黑名单给熹宗朱由校看,但这位“好武”的皇帝只问了一下托塔天王是怎么回事(“卷头先问李天王”),完全没弄明白阉党的意思,还傻乎乎地夸奖晁盖“勇哉”,于是魏忠贤赶紧把名单收了起来,不敢再给皇上“御览”了。这位熹宗朱由校,是明史上有名的“至愚至昧”的童蒙皇帝(孟森语),好驰马,好看武戏,又好水戏,更好

做木匠活,而把政事全推给了阉竖魏忠贤,从而使阉党一手遮天,搞得天下糜烂,更整苦了东林党人。这是皇权专制主义所产生的一个典型恶果。

王绍徽这本《点将录》问世后,因其手法新颖,阴险超群,引来了很多阉党的仿效。一个叫卢承钦的阉党所拟的黑名单中,把王图、高攀龙等称为“副帅”,把曹于汴、魏大中等称为“先锋”,把丁元荐、沈正宗等称为“敢死军人”,把孙丕扬、邹元标称为“土木魔神”,明显地带有《点将录》的胎记。还有其他许多黑名单,也都是极尽丑诋之能事,拼命把东林党人妖魔化。《东林朋党录》之“朋党”一词,本指结党营私的团伙,孔子说“君子群而不党”《东林朋党录》暗指东林党人都是小人。《石碣录》之“石碣”,出自《水浒传》里的石碣村,而这里正是梁山骨干头领阮氏三雄的家乡。《盗柄东林伙》、《伙坏封疆录》中的“盗柄”、“伙坏”,是在骂东林党人如同盗贼匪伙。《蝗蝻录》、《稗稗录》把东林党人贬喻为有害人类的蝗虫、莠草。仅从这些黑名单的名称,便可以看出阉党整人招术的毒辣和下流。

明朝最终在农民造反和清兵的铁蹄下灭亡了,阉党迫害东林党人的那页痛史,也化作云烟了无踪迹了。但《东林点将录》式的陷人于罪的招术,却并未绝迹。国民党曾给新四军政委项英起了一个绰号,叫矮脚虎王英,意思是骂项英和新四军是匪徒、匪军。“文革”中,各种黑名单大行于世,各种帽子花样翻新,目的都是要把好人定为贼人魔君。虽然没有用讼师恶吏和阉党起绰号的办法,但借恶名以臭(批臭)人之法,却很是得了《点将录》的真髓。那些“笔挟风霜”的大字报、大帽子,虽然早已销声匿迹,但至今让人想起来都会感到胆边生寒。

《随笔》2006年第4期目录

总第 165 期

狗年初一 \ 吴小龙

慈禧垂帘时代的宪政萌芽 \ 傅国涌
读梁遇春的《小品文选》 \ 缪哲

听局中人谈幕内事 \ 朱正

“激进的”马尔库塞和“理性的”波普尔 \ 沈展云

年画 \ 陈四益

纸上的风景 \ 周涛

牵牛花 \ 谈瀛洲

一张银票 \ 钟叔河

辞典中的历史 \ 王彬彬

《梦醒莫斯科》序 \ 邵燕祥
两份“遗言” \ 散木

四问怒江 \ 汪永晨

说不完的高尔夫 \ 夏歌

俄狄浦斯的灵魂 \ 杜高

读《百世门风》有感 \ 钟里满

世事关心天地间 \ 蓝英年

——读资中筠《斗室中的天下》

我们只能是自己的道德法官 \ 陈远

空一缕余香在此 \ 章诒和

——奚啸伯往事

一峰先生与我 \ 流沙河

写在《垂死挣扎集》的前面 \ 王得后

窄门:关于马槽 \ 留白

地址: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随笔》杂志

邮编:510075 电话:(020)37592344

邮发代号:46-90

欢迎邮购,免收邮费,每册定价 6 元



开始 订阅喽

订户必读:全国各地邮局
订费标准:全年 50 元

什么最重要? 家庭!
什么不能少? 保健!

家庭保健报

让生活不留遗憾
订阅家庭保健报

统一刊号:CN62-000001
邮发代号:15-112
零售每份 0.5 元
全年 50 元
邮费另加:0.45 元
电话:0451-8465242 8465227

良知与责任

——纪念卞仲耘校长殉难四十周年

● 裕 雄

岁月沧桑，血雨腥风的文化大革命已过去了30年。当年的一代青年学生也已两鬓斑白，进入了回首人生的老年。

—

我于1965年从北京师大女附中(现名北京实验中学)毕业，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1966年文革开始不久，即得知师大附中卞仲耘校长遇难的噩耗。一位中学女校长丧生于自己的学生——而且

是女生——的皮带与棍棒之下，这本是古今中外少有的惊天血案！然而，继之而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十年文革，无数的血案，无尽的冤魂，麻木了人们的神经，也掩埋了人们的记忆；卞校长的遇难很快便被淡忘了。

20年以后，我来到加拿大温哥华留学，并定居于这座美丽的城市。又是十几年过去了，文革中的一幕幕已如前世一般。一日，与在美国的老同学通电话时说起母校，方知卞仲耘校长于我恩重如山，而我竟数十年浑然不知。

现在的年轻人，很难设想文革是怎样一回事。而对于我们这红旗下成长的一代，阶级斗争、政治运动中成长的一代，那个年代的经历却是刻骨铭心，挥之不去的。刚刚懂事就经历整风、反右；读初中时的大饥荒、反右倾；高中时经济好转了，却大抓阶级斗争，大树特树领袖的绝对权威。记得初中时虽然国民经济极其困难，但学校里的政治气氛还不致于太紧张。高中后搞所谓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学生以阶级出身划线，分为三六九等，一批人整另一批人；学校引导学生，特别是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自我批判，大胆暴露各种错误思想，愈来愈让人感到“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凶险。



文革前，卞仲耘一家六人邀师大女附中学生宋淮云（前右二）、李梅承（后右二）及邻居学生张路旗（后左一）同游紫竹院公园

我的父亲是留学归国技术人员，母亲为中学教师。祖父母那一辈是地主或破落地主；自然被归为出身不好的一类，思想上产生自卑感。“三面红旗”，国民经济困难，个人迷信，等等，又给人带来满脑子的疑问。由于缺少人生阅历，误以为自己的异端思想是出身所致，是罪过。那种矛盾惶惑的心态，那种精神上痛苦的挣扎，不是亲身经历很难体会。结果，我老老实实地“向党交心”，将自己的异端想法都讲了出来。

我的“反动思想”，文革中成为我父亲的一大罪状。奇怪的是，我自己的升学却未受到影响。我向来麻木，想也不曾想过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几十年后才明白，当年全仗卞校长的保护。她坚持不将学生们暴露的思想记入档案；她对

北大招生人员保证，说我是好学生，只是一时认识糊涂，这样北大才录取了我。否则我的人生轨迹可能完全不同，我的命运也将与许多文革受难者一样悲惨。

我在师大女附中读书六年，与卞校长没有说过几句话。只记得她母亲一样安详慈善的面容，和那微微发胖、踽踽独行的身影。想不到她的内心实如钢铁般坚强，无私无畏。我出于无知与恐惧做了蠢事，卞校长则出于仁爱与无畏保护了我。她保护的不只我一个，还有其他一些与我同样幼稚的青年学生。在那个年代，对于政治上的问题人们避之犹恐不及；为了保全自己而出卖良心的大有人在；更有的人邀功请赏，助纣为虐。而我们的卞校长，为了她的学生的前途与命运，甘冒政治上的风险，



2006年，是卞仲耘校长诞辰90周年，殉难40周年。3月间，女附中学生裕雄由海外归来，和同校毕业的姐姐一同登门向卞校长遗像致敬默哀。遗像下的艺术浮雕，是她奉献的祭品。4月间，女附中学生刘进也特携鲜花一束，邀约由美国归来的叶维丽和常来的于羚同学，前来向卞校长遗像致敬祭奠，慰问亲属。图为刘进和王晶垚老人合影。

抱着“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信念，为我们撑起一柄保护伞。我们幸运地躲过了劫难；而她，她的家庭，却遭遇了惨烈的不幸。

二

卞校长为共产党的事业奉献一生，却被它的政治风浪无情吞没。为青年一代兢兢业业，呕心沥血，最后竟惨死在学生手中。人生之痛，可有更甚者？世道之残酷，又有几个可以相比？！年少无知的青年学生怎样沦为暴政的工具？我们的国家又是怎样走到了这既无国法，又无天理的地步？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建国后十几年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使斗争哲学泛滥，道德标准颠倒，人类的同情心泯灭；加上宗教般狂热

的个人崇拜和血统论的推波助澜，文革只是这一切合乎逻辑的总爆发。文革是思想奴役的结果，是人性扭曲的必然。成年人尚且把握不住自我，遑论这样环境下教育出来的青年学生？可偏偏文革之初，国家的最高权力者将尚方宝剑交给了一群少不更事的学生，一群不知人间疾苦、优越自负的贵族子弟，从而导致了一幕幕的人间惨剧。

师大女附中与一般学校不同，带有皇族学校的性质。大多数中央领导人，包括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女儿们，都在这里读书。当然学校也接收成绩优秀，出身知识家庭或平民家庭的学生。这个学校的教师们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学校的教学质量在全国名列前茅。但学生们由于出身与家境带来的优越感和骄、娇二气，则深为北京其他中学的学生所

反感。

一个学校汇聚了各种不同阶层出身的学生，自然成为社会的一个缩影。即使不将学生人为地分等，等级也是客观存在的，尽管共产党的理想是消除社会的不平等。父母为革命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学生在班级里占据主导地位，出身下层或被打倒阶级的学生感到压抑，被边缘化，除非懂得趋炎附势，这种状况高中后日益严重。我虽然由于书读得好受到学校的奖励，也作过学生干部，对这样一种气氛却始终不能适应。文革前两年贯彻阶级路线，美其名曰“讲成分但不惟成分论，重在表现”，实际上却将原罪加之于另类出身的学生，将他们（她）们降到二等公民的地位。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很多出身于非工农家庭，却违心地夸大阶级烙印，否定人性向善的一面，为了功利的目的祭起封建血统论的法宝。血统论加倍地助长了高干子弟的优越感，误以为自己是国家与社会的主宰。这是文革初期以高干子弟为主的红卫兵运动的直接原因。

我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干部子女都趾高气扬，不是的；有些干部家庭出身的同学很朴实，很平易。也不是说一些学生是绝对的加害者，而另一些则是绝对的受害者。高干子女的命运大多随着父母的命运起伏，其中不少人遍尝了人世的艰辛，而且由于落差之大，更有“天上人间”的体验。其他学生，不论出身如何，亦为多年阶级教育的产物，不会用平常心看待事物，斗争哲学，动辄上纲上线的思维方式已深入血液之中。扪心自问，如果自己处在卞校长的位置，会去保护学生吗？如果卞校长遇难时自己在场，敢于挺身而出吗？或者起码有明确的认知与判断，知道谁是谁非，孰善孰恶吗？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整整一代人都是受害者。

不幸中的万幸，文革也促成了我们这代人不同程度的觉醒。经历了一段文革的大起大落之后，忽然发现，神是不存在的。真神在我们心中，那就是人类的良知。只要不说违心的话，不做违心的事，人生之路就不致大错。改革开放，中国打开关闭了三十年的大门，既带来了国民经济的腾飞，也开放了人们的思想，虽然与真正的思想言论自由尚有相当的距离。来到加拿大之后，更体验了西方民主制度下的社会，了解了这里人们的思维与行为方式。加拿大有阶级差别，却无过分剧烈的阶级

冲突。人们心态平和，除政党之间的攻击之外，一般就事论事，而不上纲上线，夸大其词。

三

以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与上一代更多地吸收了中外传统文化的营养并经历过抗战洗礼的父辈比较，不能不承认他（她）们中的许多人是非常优秀的。卞仲耘校长和她的丈夫王晶垚先生都是一直追求民主自由的理想主义者。卞校长以自己的政治生命为代价来保护学生，她是我心目中的一尊女神。在她出之于自然的行为，实则出之于其高尚的人格，出之于深植内心的是非判断与道德准则。高山仰止，当引起人们灵魂的震撼。和卞校长一样，王晶垚先生也为自己选择了一条荆棘丛生的人生之路。卞校长殉难之后，这位社会科学工作者多年来奔走呼号，既是为的相濡以沫的妻子，更是为了正义能够伸张，社会不致倒退。前不久，我去看望了这位可钦可敬的老人。八十五岁高龄，他耿耿于怀的，仍然是人民的福祉、国家的命运。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全民族卷入的人整人的运动，是中华民族耻辱。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虽然皇权达到了极致，意识形态上却从未这样高度“统一”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几十年间，领袖既是国家最高领导者，又是思想上的绝对权威。这样，不但民主社会的制衡谈不上，连封建社会臣下对君王的进谏亦不可能。文革就发生在这样的体制之中。从另一方面来看，文化革命之能够横行无阻，在于人们——包括当权者与普通老百姓——对于邪恶的服从，对于权力迫害他人的容忍。只要人们像遇罗克、张志新和卞仲耘校长等人一样敢于说“不”，历史就会改写。无奈就是这一点差别，造成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浩劫。

虽然文革早已过去，却无人能保证它不再发生。只有全民族反思与忏悔，从鲜血与生命中得出教训，才能防止历史悲剧的重演。让我们这代人肩负起责任，告诉后代我们走过的路：我们的迷茫、错误甚至罪过，以及我们的觉醒。让我们为社会的进步尽一份力，以补偿卞仲耘校长和其他千千万万殉难者的牺牲于万一。

（2006年3月于加拿大温哥华）

（责任编辑 李晨）

大跃进奇闻拾屑

● 李凯源

公社食堂要吃猴头、燕窝、海味

“大跃进”中，中央一些领导干部到基层宣传、描绘共产主义人民公社的美好前景，以鼓励人民的奋斗热情。当时国务院一位副总理在河南省遂平县讲得最为具体，不妨抄录下来。他说公社的好处在哪里？

“首先，有好的食物，而不仅仅是填饱肚子。每顿有肉、鸡、鱼、蛋，还有更精美的食物如猴头、燕窝、海味等，都是按需供给。第二，衣服穿着方面，一切要求都可满足。有各种花色和品种的服装，而不是清一色的黑色和蓝色。将来，普通服装仅作为工作服使用，下班后，人们就换上皮服、呢绒和羊毛制服，当人民公社都养了狐狸，那时外套就都是狐皮的了。第三，房屋都达到现代城市的标准。现代化是什么？人民公社。在屋子的北厢有供暖设备，南厢有冷气设备。人们都住在高楼里，不用说，里面有电灯、电话、自来水、无线电和电视。第四，除了跑步的选手外，旅客和行人都有交通工具，航班通向各个方向，每个省都有飞机场，每个地方都有飞机制造厂的日子也不远了。第五，每个人都受高等教育，教育已经普及。”这幅人民公社的美景，真让几亿农民乐得合不上嘴。只是谁也没有去想一想，那稀有珍贵的猴头菌菇从哪里获得？价格昂贵的燕窝（大饭店里名为“一品官燕”）从哪里进口？得养多少亿只狐狸才能让农民都穿上狐皮大衣？时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康生拟写了一副对联：“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先把人民公社这座桥梁架起来，过了桥就是天堂了。河北省徐水县是大办公社食堂的一面旗帜，领先发出了

“吃饭不要钱”的口号。全县有64000多户，320000人口，248个农业社。在“大跃进”中全县建立了1777个公共食堂，有285000人到食堂吃饭，实现了全县食堂化。为了适应不同工作、任务的需要，还建立了野外战斗随军食堂1410个，幼儿食堂119个，老年食堂248个。家家户户都把家中储蓄的粮食无偿地献给食堂，如吴庄社一连的社员献粮1296斤，刘花子一户就交出粮食500多斤。当时被认为是削弱家庭私有观念，共产主义因素萌芽的新事物。在办食堂方面较为消极的南张丰乡，受到县委批判后，第二天一天之内就建起92个食堂，实现全乡食堂化。后来，人民公社这座桥在九百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大地上耸立起来了，公共食堂遍地开花。但是好景不长，人民过桥以后看到的却是与梦幻中的天堂完全相反的一幅图景。莫说吃猴头、燕窝、海味，连稀粥也喝不上了。

评教授以产粮多少为标准

“大跃进”是全方位的，教育自然也不例外。1958年3月成都会议，柯庆施提出15年全民都成为大学生。同年9月，刘少奇在河南说：要采取新的办法办工厂、办教育。新工厂也可以办学校，招一批中学生，就在这里上课，一个工厂就是一个高中，一天读几小时书，做几小时工，工厂即学校，学校即工厂。将来出来，既是大学毕业，也是技术工人，这也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个条件。

河南方城县城关镇，共有人口1万1千多人，在几个月之内就建起了综合红专大学、卫生、戏剧音乐、舞蹈及师范等9所专科学校。各地工农大学、红专大学，如雨后春笋，茁壮出生。

1958年7月至10月“大跃进”期间,康生以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的身份,到北京与河南省的一些学校视察“教育革命”的进展情况。在北京师范大学,他说:“师大有两大任务,大办学校,大办工厂。每一个班都可以办一个工厂。大办学校,可以从小学、中学到大学,1958年至少要办100座这种亦工亦学的学校。至于有没有条件办,他不管。既然农业生产可以‘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办学校不也可以‘人有多大胆,多少都能办’吗。在河南他又说:‘学校是社会劳动大军的一个组成部分。学生可以每天上课2小时,劳动3小时;也可以上课2小时,劳动6小时。在大炼钢铁的热潮中,农民可以撇下农活不干,都去大炼钢铁,学生也可以只参加劳动,不读书。看起来,‘文革’中的‘读书无用论’、‘白卷先生’、‘凭双手的老茧上大学’的构想,在10年前的‘大跃进’中,就已经在这位摇羽毛扇的人物心中形成了。”

关于评教授,康生在“大跃进”中又有高论。他视察北京农业大学时,明确指示:“学校最少要挂五块牌子:一、学校,二、工厂,三、农场,四、研究所,五、农林局。如能挂十几块牌子则更好。教授要按所种作物的产量评级,亩产1000斤的只能当五级教授,2000斤的四级,3000斤的三级,4000斤的二级,5000斤的一级。按照大理论家康

生的这个标准,学识渊博、白发苍苍的老教授只能下岗待业,年轻力壮的农民不但能聘为一级教授,当院士也是有可能的。这可不是什么笑话,是“大跃进”中“教育革命”的事实。

粮食太多就吃五顿饭

1958年8月4日,毛泽东到河北省徐水县第八瀑河农业社视察。村里墙上画着鲜艳的壁画:年轻人攀着刺破蓝天的玉米秸爬上天空;老汉乘着比船大的花生壳,飘洋过海,周游世界;嫦娥从月宫下凡,到农田采摘斗大的棉桃……县委书记汇报,今年全县平均亩产麦子达到2000斤,总产量达到12亿斤。此外,还要放大卫星,山药亩产120万斤,一棵白菜520斤,小麦亩产12万斤,皮棉亩产5000斤。

毛高兴地问:“要收那么多粮食呀!你们全县31万人口,怎么能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呢?你们的粮食多了怎么办呢?”“粮食多了换机器。”又问:“换机器也用不完,又不是光你们粮食多,你换机器,人家不要你的怎么办?”“我们用山药造酒精。”“那每个县都造酒精,哪里用得那么多的酒精啊!”“我们只是在考虑怎么多打粮食。”也要考虑怎么多吃粮食呢,其实粮食多了还是好。多了,国家不要,谁也不要,社员们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顿饭也行!”

毛泽东又说:“你们这么多粮食吃不完怎么办?粮食多了,以后就少种地,一天干半天活,另半天搞文化,学科学,闹文化娱乐,办大学、中学,你们看好吧?”

当问到生产社改什么名字时,社长说叫“农庄”。苏联已经有集体农庄这个名称了,毛说:“还是叫人民公社好。”从那以后,“人民公社”就在全中国普遍开花了。以天津市为例,1958年



大跃进中诞生的中国第一所农民大学——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延吉县东盛乡黎明业余农业大学举行开学典礼

8月23日,距领袖指示不到20天,4个郊区的59个乡镇、240多个农业合作社的40多万人,就成立了9个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的人民公社。其中最小的有6千多户、3万多人口;最大的人民公社有1万8千多户,8万多人口。

后来毛到安国县,看到红旗招展、热火朝天的景象,就问安国县长:“你们愿意修个飞机场吗?用这条马路,把树挖掉?可这得要用一部分土地。”县长忙说:“我们非常想修个飞机场,县里地多呢,占地没问题!”毛又具体指示:“把马路搞成洋灰的,弄宽点,修个飞机场。今后国际友人来,从北京半个小时就可以到你这里。”于是各地修飞机场的计划纷纷出台,有的公社还加修直升飞机场,使村与村之间的联系更方便、快捷。修飞机场可不像修打麦场,最终全国公社飞机场一个也没建起来。

炼钢铁加中药

“全民大炼钢铁”,是工业大跃进的核心。1958年11月,毛泽东访问苏联时提出,中国要在15年左右的时间内,在钢铁等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12月2日,刘少奇在向全国工会第八次大会致祝词时,正式宣布了这一口号。

1958年1月下旬,北京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十五年后,要搞4千万吨钢,5亿吨煤,4千万千瓦电力。”从此,不断批判保守思想。6月21日冶金部在“大跃进”思想指导下向中央报告,1959年钢产量可以超过3000万吨,1962年可达到八九千万吨。这个报告被批转全国。8月17日至30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的公报,全民大炼钢铁的熊熊火焰,燃遍全国,甚至在中南海里都建起了小土炉,点火冒烟。农村、城市,到处有小土炉。机关大院、工厂、学校、街道,也都投入炼钢热潮中。北京、上海等11个城市的18所大学,每年可以炼钢692000吨,相当于1949年全国钢产量的4.38倍。济南市的中学在一个星期内建成77座小高炉。哈尔滨市19中学有10名少先队员5天学会炼铁,1天盖起小

厂房,又用1天零半夜安起炼铁设备,在全校少先队员支援下,3天挖出3000多斤废铁,办成一座“少年卫星炼铁厂”,在7月中旬,炼出第1炉铁水。这个小工厂一年的产品够1800台拖拉机零件使用。少先队员10多天就成为冶炼工程师,能不是奇迹?

谁都能炼钢。某市中山路的十几个家庭妇女,白手起家,不懂技术,缺乏材料,硬是当天建起小高炉,当天就炼出了钢。副食店的职工奋战两昼夜,建起各种土炼钢炉9座。河西区委机关,用1斤无烟煤能炼出3斤钢。医科大学总医院的医生、护士,顾不上诊治病人,在医院里砌高炉,也炼出了钢铁。第二皮鞋厂土法炼钢更为简单,他们建造的坩埚土平炉,就是在地面上挖个坑,用普通砖和耐火砖砌成,一次可以放8个坩埚,炉内不用焦炭作燃料,而使用劈柴和普通的块煤,下面用鼓风机吹风,两个半小时就可以炼出100多斤钢来。尤为奇妙的是,一家手工业社办事处,大胆试验用中药炼钢,在小土炉内,加入中药槐角、鸡内金和龟甲等,这些中药可以起到去氧脱硫、调解炭素的作用。中药炼钢据说已试验成功。看起来中药治疗痔疮的槐角和治疗消化不良的鸡胃,竟然有炼钢功能,应该获得诺贝尔奖金。

别说炼钢,就连制造原子弹的铀,农民都能炼出来。他们用木桶装满铀矿石、硝酸、硫酸,反复浸泡,最后用布袋豆腐包过滤,用铁锅当反应器,再把溶液慢慢烤干,就炼出铀来了,方法就像是民间做豆腐。

狂热躁动的“大跃进”歌谣

“大跃进”歌谣,像一面镜子,折射出那个狂热浮躁时代的社会面貌、人民心态。全国人民充满幻想,在歌谣中编造着亿万个美丽的神话。像《举得起天提得起地》:“天有把,我们举得起,地有环,我们提得起。毛主席叫我们做的事体,你看哪项不胜利?”西域边陲维吾尔族的歌谣《毛主席向高山招手》:“一座高山顶破天,山顶上有无尽的清泉,毛主席向高山招手,泉水就奔下来灌溉我们的花园。”赞颂伟大领袖是贯穿“大跃进”歌谣的一条中轴线。

农村是“大跃进”的主战场,所以反映农村

变化、农业生产的歌谣数量最多,寄托了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四川一首出现较早的歌谣写道:“稻米赶黄豆,黄豆像地瓜;芝麻赛玉米,玉米有人大;花生像山芋,山芋超冬瓜;蚕长猫一样大,猪长像大象;一棵白菜五百斤,上面能站个胖娃娃;鱼苗撒下千万条,条条养得扁担样;玉米秆儿穿九天,浑身棒子有几千……”既具体又富于想像力。再如《惊动天上太白星》:“一阵锄声卷入云,惊动天上太白星,拨开云头往下看,呵!梯田修上了南天门。”甘肃一首改造山河的《两只巨手提江河》也很有气势:“一铲能铲千层岭,一担能挑两座山,一炮能翻万丈崖,一钻能通九道湾。两只巨手提江河,霎时挂在高山尖。”《大山被搬走》与上首有异曲同工之妙:“山歌一声吼,万人齐动手。两铲几锄头,大山被搬走。”比起愚公移山,社员真是神威无敌。陕西安康的一首《我来了》,在全国传诵,具有更大的震撼力:“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

“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的“人民公社”,曾有两句歌谣概括:“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于是把“人民公社”比喻为通向“共产主义”桥梁的歌谣遍地皆是。河南有一首《人民公社是金桥》:“单干好比独木桥,走一步来摇三摇;互助好比石板桥,风吹雨打不坚牢;合作社铁桥虽然好,人多车稠挤不了;人民公社是金桥,通向天堂路一条。”全国最早办“公社食堂”吃饭不要钱的河北徐水下属的谢坊,公社社部的高墙上写了一首赞颂人民公社的长诗,开头4句是:“谢坊是个幸福庄,幸福全在公社长。公社好处唱不尽,集体力量造天堂。”其中“造”字堪为诗眼。

“全民大炼钢铁”也是“大跃进”中的一大热点。山东青岛有一首《小高炉》:“小高炉,像宝泉,铁水源源汇成川。小高炉,像笔杆,蘸着铁水画乐园。小高炉,真好看,吞下矿山吐铁山。小高炉,全民办,全国竖起千千万。”全国机关、工厂、学校、农村,甚至医院、幼儿园竖起的小高炉何止千千万。河南洛阳有一首《铁水滚滚似火龙》:“炼铁要登云梦山,云梦山上把家安。白云深处搭帐篷,铁炉建在高山巅,拉起风箱火焰高,炼出铁水像山泉。别看俺的铁炉小,产品堆起撑

破天,铁水滚滚似火龙,能把地球缠三圈。英帝看见心发慌,美帝气得干瞪眼。”还真有点儿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味道。

有些歌谣的题材既广泛又具体。如《深翻》:“红色大军千千万,深翻土地突击战,冲天干劲如猛虎,铁锹飞舞似闪电。寒风凛冽汗满面,手中血泡磨成串,保证质量深二尺,超过定额驾火箭。”“大跃进”时提倡“深耕密植”,在农田上掘出二尺的深沟,大把地撒入麦种。麦种有多大力量才能顶出二尺的生土生芽成长?麦子都烂在沟里,颗粒无收。这样的歌谣确是当时农业生产的真实写照。“大跃进”中有一次“全民除四害”运动,大概也是一项世界纪录。《擂鼓鸣金除四害》:“老鼠奸,麻雀坏,苍蝇蚊子像右派。吸人血,招病害,偷人幸福搞破坏。千家万户快动手,擂鼓鸣金除四害。”人们上房敲铝锅、脸盆,真的把麻雀震得发昏,头朝下跌落地上。几年后发现麻雀不是害虫,而是益鸟,又下文件予以保护,才使麻雀在中国大地上没有绝种。军队战士的歌谣也是铺天盖地,如《英雄本色就是诗》:“战士人人是歌手,战士人人是作家,歌声直冲九天外,新诗多如五月花。字字如珠放异彩,句句如鼓震人心,英雄本色就是诗,唱绝前人启后人。”当时职业作家、诗人,更是挥舞如椽大笔,豪情万丈地写了很多“大跃进”诗歌,真不知道几十年以后,他们还敢不敢再吟诵那些锦章绣句?“大跃进”歌谣,白纸黑字为我们留下了那个热火朝天时代的雪泥鸿爪,未来的中国文学史,一定不会忽略这一特殊时期的诗歌创作奇迹的。

公墓编号:“多、快、好、省”

“大跃进”如狂飙海啸,一时间席卷全国。各地为了表示紧跟,纷纷改地名,改单位名,改人名。时至今日,近半个世纪了,各地不是还有很多地名为跃进道、红旗路、卫星里、跃进里、东风里、红旗饭店吗。有的大学改名东风大学、红专大学。1958年出生的孩子,名叫“跃进”的,不下数万人。可见“大跃进”对社会、人心的影响是何其深远了。

有些事邪乎得不可思议。某市有一座规模最大的北仓公墓。1958年建立土葬公墓群时,恰逢

“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招展高潮。为了宣传配合政治形势，依照1958年3月中共中央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把土葬公墓分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等若干区域。每个区域都有几百个坟头。为了便于管理及尸主家属扫墓时寻找辨认，每座坟前石碑或木桩的侧面，都用红漆写着“多字第xx号”“快字第xx号”等字样。有人推



成车的麻雀被作为战利品送上除四害展览会

测，当时决策者的动机，可能是不仅让活人记住“总路线”，死人也应该烙上时代的标记吧。

每年清明节前后，附近农民扛着铁锹，在公墓门前等候扫墓者，为旧坟添新土、清杂草，挣些辛苦钱。见到扫墓者第一句话就问：“什么字多少号，我带您去找。”来说：“多、快、好、省都有。”农民工前头带路，说：“咱们按顺序，从‘多’字开始吧。”也有的扫墓者特忌讳“争”“上”“多”“快”这几个字，谁愿意家人争着死、上前死、死得多、死得快呀，就换一种说法：“第1个字xx号”或“第2个字xx号”。打工者心领神会：“明白，跟我走吧。”某家比较幸运，其父1959年10月辞世后，遗体葬在“省”字区，也是巧合，其后40年内家中竟然没有一个人亡故。人们开玩笑地说：“他们家碰上了‘省’字这块风水宝地，省着死，多好呀！”这块土葬公墓存在40多年后，因城市扩建已于前两年推平改葬。但遗骸火化后的登记顺序号仍是“总路线”那12个字。看来上帝那边也不得不服从“总路线”的口号，按顺序接待了。

还有一个听来的真实故事。某地公墓扩建，在新的入口处，临时搭建一个牌楼，正面用红布书写一副对联，上联为“跃进跃进大跃进”；下联是“增产增产再增产”。横批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也许是天意难测，不幸而言中，两年后渡

荒，这个公墓果然爆满，争了上游。多年以后，一些计划生育的标语，不知什么原因，竟然贴在北京八宝山公墓，内容是：“生产搞上去，人口降下来。”误会巧合，实在是文不对题，令人哭笑不得。

为首用“跃进”一词的人颁发博士头衔

1957年末“反右派斗争”取得全面胜利。据不完全统计，共揪出右派分子552877人。1959年又补漏一批，右派总数约为百万人左右，约占知识分子总人数的10%—20%。抓右派告一段落，反右倾仍在继续。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发动全民，讨论40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新高潮》。社论中提出：“有些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得很慢，他们不了解在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这是第一次提出“大跃进”的口号。

中央某领导赞扬最早使用“跃进”这个词的人“功不在禹下”，并在有关这篇社论的批语中说：如果要颁发博士头衔的话，我建议第一号博士，赠予发明“跃进”这个伟大口号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责任编辑 李晨）

用信念浇铸的书

——《起来》序言

● 徐庆全

赵杰兄比我年长 10 多岁，且又是国内外知名的张学良和抗战史研究专家，我仍然愿意以“兄”称之。中国传统中文雅的学界和喧闹的江湖称呼是一样的——区别是学界称“兄”，江湖称“哥”或“大哥”而已。这样称呼他是我的一种攀附心理在作祟：他的学问，有那么多他写过的书在那儿摆着，称他为“兄”，自己岂不也可划入学界？幸好，赵杰兄还很江湖，在一片“赵教授”、“赵主任”的称呼声中，还能容忍我这个在学界本不入流的小字辈的放浪。

最初认识赵杰兄，是从读文开始的。他的散文集《情奉张学良》是一本薄薄的小册子，但以情入史，读起来让人耳目一新。虽说传统中一直有“文史不分家”的说法，但“文”与“史”毕竟是两个范畴，想让二者有机结合，既不失史的真、又能“散”的有文采，却不那么容易。而赵杰兄这本小册子做到了。

我那时正在《炎黄春秋》作编辑。相对于一些正史刊物来说，这份刊物只能说是“姨太太面孔”——追求史的真，又苛求文的美。赵杰这样写史，正合本刊的要求。所以，在别人的介绍下，我们建立了作者和编者的关系。后来，我参与了另一家与《炎黄春秋》风格大致一样的刊物创刊后，赵杰的文章也随之到了这里。总之，成为我的固定作者了。

随着与赵杰兄交往的加深，对他的学术成果也了解的更多一些。他主编的《张氏帅府》、《在同张学良相处的日子》、《张学良将军资料选》、《张作霖被炸前后》、《西安事变后的东北军》等一系列的有关挖掘张学良史料的书籍，对国内外张学良的研究有开创之功；而他的著作《张学良去台之后》、《世纪沧桑》、《不愿作奴隶的人们》、《留住张学良》等等，则奠定了他在国内外张学良研究的学术地位。

随着对张学良研究的深入，赵杰兄更关心的是与张学良研究密切相关的另一个题目：“九一八”的历史。

“九一八”发生在赵杰兄供职的沈阳，这使他来研究这段令中华民族刻骨铭心的历史有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但更重要的是，他认为，只有研究透这段历史，才能弄清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早在 1995 年抗战胜利 50 周年之际，他曾在《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和《国歌的故事》两书中，提出了这样一个学术观点：“九一八”是国耻日，也是中华民族抗争之时。赵杰的基本思路是：以《义勇军进行曲》的诞生到国歌的确立，确立中华民族抗日战争起始时间，确定东北义勇军的抗日斗争是中国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60 周年的今日，这样的观点并不新鲜，但在 10 年前，却也并不寻常。

记得有那么一段时间，每次赵杰来京或我到沈阳参加由他主持的张学良国际学术研讨会，我们把酒浅酌，他的话题总离不开“九一八”。在谈到沈阳的“九一八”博物馆时，他说，我准备联合一些委员来搞一个提案，在博物馆里建立“国歌墙”，标明《义勇军进行曲》和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渊源关系。他是辽宁省政协文史委员会副主任，做这样的工作自然是分内的事情。他阐述说：到 1934 年，尽管东北义勇军风起云涌的抗日斗争，在内敌外患的夹击下，已经处于低潮，但以东北爱国民众为主体的抗战中，用抗争和鲜血孕育了《义勇军进行曲》的主旋律。它表达了人们对东北义勇军的敬重，也寄托着在中华民族的危亡关头，全国人民同仇敌忾、抗敌御侮的愿望。

2001 年，我收到了他和辽宁政协的 9 名委员们联名“关于在‘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建立国歌墙，提高精神文明水平的建议”的提案。这一提案，不仅在辽宁省引起了很大反响，在全国也产生了影响。《人民政协报》在“民意周刊”中开辟专栏，加编者按对这一提案予以登载；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专程赴辽宁，以《永远的国歌》为题，结合义勇军的遗址、遗迹拍摄，并对知情人作

了专访。现在“国歌墙”已经矗立在“九一八”历史博物馆里了。

2004年春节刚过,赵杰兄给我打电话,兴奋地告诉我,他得到了一大批珍贵的资料。原来,随着他对“九一八”历史的研究,日本方面逐渐关注他的研究成果。一位友好的日本人给他提供了“九一八”事变期间,日本国内的《号外》杂志上刊登的日本记者在中国拍摄的图片。这当然是当年日本人为庆祝胜利的举动,而现今则成为日军在东北烧杀奸淫、无恶不作暴行的历史写真。赵杰兄打了一个多小时电话,详细地给我介绍了这些图片的历史价值,并问我如何围绕这些资料做文章。我说:明年是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你可以这些图片为引线,以钩沉的方式,将日军在东北的暴行一一揭露,为六十周年庆典作点有意义的事情。而且,稿子成了以后,可以先在杂志上发表,最后成书。其后,我们电话不断,“伊妹儿”不断。他不断地写,我不断地读。意见是提不出来的,但作为第一读者,我的鼓励或者说是鞭策,还是有一些作用的。

2004年8月初,赵杰给我传来了第三篇稿子,告诉我,他要到青海征集史料,回来后要集中精力把这部书稿完成。并叮嘱我,帮他在京联系一家出版社。不料,他在青海期间,却因高原反应而突然中风失语。我因与一些老同志接触得多一些,亲眼见过那些历经艰难岁月而在晚年依然生龙活虎的老人们,因中风失语后的凄惨景象,所以,一直觉得,中风失语这种病,对有思想、能写作的人来说,是最难以承受的痛苦。所以,听到赵杰兄居然在这个年龄上得了这种病,心里陡然一沉:“完了,这位笔锋正健的汉子该怎样承受这种痛苦!”我不禁失声喊出这句话来。

得知赵杰回沈阳后,有一段时间,我时常给他打电话。当然,他住在医院里,无法接听,我只能通过他夫人和他老母亲来表达我的问候之意,关注之情。半个多月过后,我接到了他亲自打来的电话。他刚出院,说话不但不连贯,而且有些词不达意,但意思我听懂了:他说话不行,但思维还行,他不会趴下,还会写作!这样几句话,他说了足有十分钟!一直以为感情平静如水的我,竟然心头一热,热泪盈眶,不知说什么好!他好像感觉到了,断断续续地说出了这句话:我们是一条汉子!随后,他夫人接着和我谈。她告诉我,赵杰稍好一点后,就让她把有关《号外》的资料带到病房,在病床上看资料,作笔记。她读了赵杰写在纸上让她转告我的一段话:“上帝让我少说话,却给了我更多的动笔的时间,我要用行动证明,中

国人很有骨气!”

这段话,我知道,赵杰会完成《〈号外〉的自白》(当时的书名)一书的,而且他是以中国人的信念来浇铸这本著作的。

9月中旬,我到沈阳参加“纪念张学良将军逝世三周年暨张学良学术研讨会”,见到了赵杰兄。从外表上看,那场大病好像没有留痕迹,但语言表达依然是词不达意。我们只好写字交谈。他写的最多的一句话是:这本书是历史的见证,一定要让这些珍贵的资料公诸于世。

本来这次来沈阳,我的目的是与赵杰兄见面,也装满了一肚子鼓励鞭策之类的话。现在,我知道,这些话对这条硬汉子来说是多余的。我知道,在他看来,这本书不是普通的学术专著,而是历史的见证资料。他一定会完成的!

现在,这本书已经由出版社排出了清样。我又一次读完了。赵杰兄嘱我写个序言。序言不敢当,但既然是“兄”的话,当然要听。从学术角度怎么评判这本书,我不敢发言,但作为历史见证的分量是足够了。而且,再一次读,我感受更深的是:这条硬汉子是以历史的使命在写作。因为这使命,这本书的字里行间贯注的是一个中国学者的信念!



“秦家店”君主专制主义理论形成三部曲

● 尹振环

毛泽东曾说：“其教孔孟者，其法亦必申韩。”“在中国历史上，无论倡导黄老，还是尊孔孟，维持政权运作，都离不开申韩法家体制（引自《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130页）。此论至为深刻精辟和正确。所谓申、韩主要指韩非，而且韩又主要指它集君主专制主义理论之大成也。韩非子的君主专制主义理论的形成，经历了近二十个世纪。如果粗略将其划分几个阶段的话，那么它大致经历了三大阶段，姑且称之为君主专制主义理论形成的三部曲。

第一部曲：“九世乱”刺激了君主专制理论的萌生

传说尧舜及尧之前，实行禅让制，王位传贤不传子。自从夏禹传子之后，公天下变成家天下，从此争夺王位继承以及争夺王权控制的斗争就没有停止过。只不过或明或暗、或缓或激、卷入斗争的人数多寡不一罢了。君主专制及其理论就是适应这种斗争的需要而逐渐形成的。

《史记》载，夏的王位是父死子继制。因为这是个传说的时代，史料缺少，不去说它。殷商的王位世系已基本上为甲骨文所证实，所以可以从商谈起。殷商的王位继承是以兄终弟及制为主。也有少数是父死子继的。商王实行兄死弟及制的后果如何呢？王位如果由“嫡长子”继承，法定继承人仅只一人，其他兄弟叔伯不可能承继王位，这样觊觎者少，一旦扩大到弟“弟”就不止一人，再说弟既可传己子，又可传兄长之子，继承者扩大无数倍，这样一来争乱必不可免，所以《史记·殷本纪》说：中丁以来，因立弟引出了“九世乱”。乱成什么

样，史载不详，无从察考。好在西周、春秋兄终弟及之制远未绝迹，还可以从后世弟及制的结果来推测这“九世乱”。比如宋是殷商遗国，它保留商的若干古风遗制。从微子到景公，共传二十八君，其中弟及的八君，这八君当中有六君（炀公、庄公、游、御、恒公、昭公）引起了弑君。这就是《史记·宋微子世家》所说的《春秋》讥“宋之乱自宣公废太子而立弟，国以不宁者十世。”又比如齐，从齐太公至春秋末的齐平王为止，共传三十君，二十君子继，十君弟继，这十君的弟继中竟有九君引起弑君。其他各国都有这方面不少事例。弟继制易引起争乱是显而易见的。因此不难推测商王朝“九世乱”的大概：兄弟相争，叔侄相杀，宗室不宁，大臣纷纷卷进争夺王位的斗争，阴谋暗杀层出不穷，政局动荡，这种局面整整经历“九世”百余年的时间。长期反复出现的动乱，使商代后期的君王懂得了对于王位直接地、经常地威胁来自哪里，王位的巩固、王权的加强，关键就在处理好王位继承、宗室关系、君臣关系。事实上，商的后期已经开始接受教训：帝小乙以后的九帝，只见二起弟继，其余为父死子继，并且起码在纣王时，已有了区别妻妾子女贵贱的某种制度了。但是全面改革王位继承制，建立一套处理宗室关系、君臣关系制度的，还是西周。尤其是周公旦开创了一些重要的制度，以稳定王权，加强王权。

（1）确立传子的制度。周人从“九世乱”的教训中，看到大利莫如定，大害莫如争，王位素定，可以大大避免争乱。王国维说：传子的精髓是：“立子以贵（正妻所生）不以长，以嫡以长不以贤。”这是王位继承的基本制度。

（2）从而生出宗法制及服丧之制，即君天子、

臣诸侯之制。

(3)进而生出分封子弟之制,及分封功臣、同盟者之制。使诸昆弟、父辈兄长、宗室、功臣、同盟者通过分封,得到一定的土地和依附于土地上的人民。这就形成了“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以及“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谁非君臣”的局面。

(4)由于嫡裔贵于庶孽,他们在继承权上差别很大,这就需要辨贵贱、别亲疏、正夫妇,严格划分嫡庶界线。由此,嫡庶制、等级制产生和完成了。

(5)为了巩固嫡子制、宗法制、嫡庶制、等级制,讲求尊祖敬宗、等级名份等伦理规范的“礼”形成了,尊尊、亲亲、区别尊卑长幼等道德观念大大加强了。不仅宗法组织与政权组织合而为一,而且政权的行使与道德伦理合而为一。

(6)周天子保留并行使商代君王可以生杀废立诸侯、大臣的大权。《史记·殷本纪》说:殷纣王竟将最高辅弼的三公一个剁成肉酱,一个制成肉干,一个或变为囚犯。到了周初,人或讟(诬陷)周公,周公奔楚(《周本纪》)。作为成王之亲叔、开国元勋,大有恩于成王的人,竟因谗言出逃,说明周天子握有生杀功臣、父辈的权力。

以上六点是君主专制制度的基本框架。由此可见,商代的“九世乱”,对于孕育我国君主制,起了不可忽视的历史作用,尽管史籍没有详载,但口碑相传,自然会通过正反面历史经验总结,从而形成一定的君主专制理论。

第二部曲:弑君事件反复出现,促使君主专制理论的初步形成

西周实行传子传嫡制(终西周之世,只有一次传弟,即懿王崩,共王弟辟方立)。的确在统治阶级内部起到了求定息争的作用。除了厉王暴虐,幽王荒淫无道,废妻立妾,废嫡立庶引起动乱之外,一般说来是平稳的。它说明,西周创立的上述制度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但这种制度的致命弱点是:分封制渐渐形成了许多国中之国,尾大不掉,末大必折,祸乱由此而生。同时立嗣的主宰权在君王手里,君王常常忘记历史教训,物色嗣君时,任意废嫡立庶,废长立幼,因而有的以宠求嫡,争宠求立,插手立君的各派势力暗斗明争,酿成王

室宫廷内乱。这类宫廷内乱,西周各侯国就不时出现。进入春秋时期,由奴隶社会渐入封建社会,各诸侯国之间,兼并战争加剧,强凌弱,大吞小,大量小国被并吞。“周武王千八百国,春秋见于经传者四十余国,又并为十二诸侯”(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二)。政治动乱的频繁可以想见。而主要的诸侯国,又反反复复发生弑君事件,其次数之多,在我国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从东周王朝来说,有五、六次是见诸行动弑君事件,未遂而已。从诸侯方面来说:“臣弑其君,子杀其父,孽杀其宗,层出不穷。”春秋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史记·太史公自序》)。所谓“弑君三十六”,实际不止此数。从《左传》、《史记》记载看,春秋时期各国发生的弑君事件就有六十三起。《战国策·东周》所说“春秋记乃弑君者以百数”,看来不是没有根据的。此外,还有二十二起逐君、二十九起“执君”事件。在二百四十二年发生了这么多杀君、逐君、执君事件,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而且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这反复出现的杀君事件,就起因、过程、后果看,可谓多种多样,但又存在着某种规律性的东西。陆续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先有人作《春秋》,后有人为《春秋》作传《左传》、《国语》等相继问世。虽然当时的认识还显得凌乱,但如果集中起来,也蔚为大观。在他们看来,春秋时期对于君主来说,有哪些历史经验呢?

第一,“并后、匹嫡、两政、耦国、乱之本也”(《左传》桓公十八年)。这是说妾等同于后(小老婆等同于大老婆),庶子等同于嫡子,两人共同执掌政权,大城和国都大小一个样,祸乱会由此而生。最著名的故事,如晋献公宠爱与听信丽姬,“杀太子申生,而大难随之者五:三君死(奚齐、卓子、怀公),一君虏(晋惠公成为秦国俘虏),大臣卿士之死以百数”(《吕氏春秋·乱原》)。这是废妻立妾、废长立少、贪恋女色酿成的祸乱。又如,齐桓公是春秋五霸之首,在管仲辅弼下,立了太子,但桓公好色多内宠,妾媵(陪嫁女)同于妻后的数人。桓公死后,众子争夺君位,太子出亡,两个新君被杀。所以“(1)不可乱了嫡庶制、等级制。”内宠并后、外宠二政、嬖子配嫡、大都耦国(“宠妾与王后并同、宠臣与正卿并列、庶子与嫡子匹敌、大城和国都同存”)是不能允许的(《左传》闵公二年)。

(2)严格遵循嫡子继承制,切忌废立无度。“太子死,有母弟则立之,无则立长,年钧择贤,义钧则卜”(《左传》昭公二十六年)。(3)在某种情况下,可以对群公子和宗室作出必要的处置,如避,如“置”,如逐,甚至“诛”。但又必须处理好君王与王室宗族之间的关系。“公族,公室之枝叶也。若去之,则本根无所庇荫矣”(《左传》文公七年)。周初“封建亲戚”而制之,还是非常必要的。

第二,树枝不能大于树干,小腿不能肥过大腿,宗室大臣的富强不能超过君王。周削、鲁分、晋亡、齐易姓,就是由于末大于本。它也是导致杀君最多的一个原因。晋昭侯封其叔、即晋文侯的弟成师于曲沃,曲沃大于国都,而且成师很得人心,有人当时就断言:“末大于本不乱何待?”果然在不到五十年的时间里,晋出现五起弑君事件,终于政权易手。因而(1)不可使臣所在之城大于国都。孔子及其弟子就曾“堕三都”(《左传》定公十二年)。楚大夫范无宇说:“建城邑有如身躯,要分清‘首领股肱,至于手拇毛脉。’总不能让拇指比手掌大吧。城邑固然如此,权势亦应如此,方可‘大能掉小,变而不勤,动而不劳’”(《国语·楚语上》)。(2)“末大于本”将成已成之时,就要“大其柯(斧柄),去其枝叶,绝其本根,可以少间”(《国语·晋语八》)。无妨加长斧把,砍削一番,但最好还是经常砍削和调整。

第三,由于大权旁落而酿成弑君王事件是最多的。因此,军权、祭祀权、赏罚权应该牢牢在握。(1)“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废兴成亡昏明之术,皆兵之由也”(《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凡与“戎”(军事权)、“祀”(神权)无关的事,一般说来,“君不举焉”。也就是说,军权与神权乃是君主必须过问的根本大事。(2)孔子主张“臣无藏甲”(武器)(《史记·孔子世家》)。“君亲无将,将而诛焉”(《公羊传》庄公三十二年)。宗亲不得弄兵使将,异姓之臣更不例外。(3)为君慎“车服”(与名、爵号),不可以假(借)人(《左传》昭公二十二年),车服爵号不可借人,自然赏罚之权也是不能借人的。(4)借用外力来篡位夺权的事,屡有发生,因而“臣不得有越境之交”(《左传》曾多次提到这一点)。

上述各点虽然不是系统的理论,但综合来看,正是国君处理宗室关系、君臣关系的基本方针,正

是君主专制的关键所在。它载诸经史典籍,既指导了当时的君权行使,也为后代君主和大臣所运用,从而成为政治家、思想家理论之渊源。

第三部曲:韩非集君主专制理论之大成

战国时期弑君事件大为减少:二百五十多年里,燕、韩、秦、齐、赵、楚六国只发生了八起杀君事件。其中外力所杀的两起,臣弑君的只有六起。更有趣的是,法学家发源地的魏,竟无一起弑君事件。这只是一个极小的标志,但它说明君主专制已趋成熟。系统的君主专制理论,就是从反面历史教训和正面历史经验中,汲取养料,正式诞生的。

进入战国中后期,随着百家争鸣的开展,又有不少政治思想家,围绕加强专制君权,从不同角度总结历史经验。如法家学派商鞅、申不害等,以及《管子》一些篇章,多是从如何执“法”用“术”来总结经验的。所谓“术”,即是君主制御群臣之术,以免独专的大权旁落,这就抓住了君主专制的核心。《管子·任法》说:“明君所操者六,生之、杀之、富之、贫之、贵之、贱之。此六柄者,主之所操也。主之所处(指地位、控制)者四,一曰文,二曰武,三曰威,四曰德。此四位者,主之所处也。借人以其所操,命曰夺柄;借人以其所处,命曰失位;夺柄失位,求令之行,不可得也。”这是说,人臣的生、死、贫、富、贵、贱,握在君王手中,君王还必须独掌文、武、威、德四项大权。这当然是典型的君主专制理论。自然比《左传》、《国语》所述要集中、明确得多。但《管子》的这些学说,比较笼统、不够系统完整,有待于发展。而系统完整的发展,是由集法家学说大成的韩非完成的。

韩非处于战国末期,这时天下一统在望,兼并战争达最高峰,君主专制中央集权成为时代潮流的客观要求。而君主专制,不仅积累了春秋时期的反面教训,并且有了战国时期的正面经验。出身于王室贵族的韩非,耳濡目染,体会深刻丰富。他研究了上至商纣下至当时的臣弑君、子杀父及种种亡国实例,从中“知臣知民”,“审于是非之实,查于治乱之情”,同时完全“摆脱了道德,而对政治进行考察”,从而得出一套不为任何道德所掩饰的、系统完整的君主专制理论。这个理论,可分为

御臣观和御臣术两个方面。

(一) 韩非的御臣观

春秋六十起弑君事件中,子杀父者五起。楚太子商臣弑楚成王、莒太子仆因国人弑其父莒纪公、蔡世子般弑其父蔡景侯、莒太子展舆因国人杀其君父密州、许世子弑其君买)。属于兄弟、叔侄、宗室、妻杀夫的二十二起。臣杀君的二十起。国人或“盗”杀九起。外力所杀四起。这说明了对于君王,主要危险不仅来自统治阶级的上层,还来自君王的家庭、宗室。韩非正是基于这样的历史,对于家天下、嫡子继承制下的君臣关系,作了深入分析。

第一,在韩非看来,君仁臣忠之类的话并不可靠,甚至是空话假话。虽然君臣之间有利益相同的一面,但还存在利益不同的一面。这才是应该时刻加以注意的。比如,君王与后妃同床共枕,可谓亲密,但利益是否相同呢?韩非说:后妃的儿子立为太子,她就常常希望君王早死。因为夫妻爱则亲,不爱则疏,母好其子抱,反之其子释;男人到了五十岁依然好色,而女人三十美色衰,以衰美之色侍奉妻妾成群的丈夫,怎能不担心自己的儿子会不会失去太子之位呢?这就是后妃与太子希望君王早死的原因。卖棺材的望人死,卖车轿的愿人富,并非谁残谁仁,而是“利之所在”(《韩非子·备内》,下只注篇名)。君臣的这种利益不同,使得人臣会采取实现自己利益的行动。“翟璜,魏王之臣,但与韩善,阴召韩兵令之攻魏,因请魏王,为之讲和以自重。”只是为了“自重”,就搞出如此阴谋,一旦可以取人君而代之,“制万乘而享大利”,又该如何?“群臣孰非阳虎(鲁国著名之权臣、奸臣)”?之所以这些人没有行动,“其备未具”,“党羽不具也”(《内储说下》)。如君王果只看到君臣利益相同的方面、忠于一于君王的一面,而不看利益不同的、相对立的一面,那就非常危险。韩非说:“知臣主之异利者王,以为同者劫,与共事者杀”(《八经》)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和臣下共同执政的,就会被臣下杀害。韩非说得毫无掩饰。

第二,君王的危险,主要来自哪里?“爱臣太亲、必危其身;大臣太贵、必易主位;妻妾无等、必危嫡子;兄弟不服、必危社稷。”在太亲、太贵、无

等、不服的情况下,必然危害君主之人是爱臣、人臣、主妾、兄弟。“千乘之君无备,必有百乘之臣在侧,以徙其民而倾其国;万乘之君无备,必有千乘之家在其侧,以徙其威而倾其国”(《爱臣》)。在“无备”的前提下,倾国者、推翻王位者、乃地方或军队之重臣也。“犯法为逆以成大奸者,未尝不从尊贵之重臣也”(《八经》),说得赤裸裸,毫不掩饰。《八奸》说:人臣成奸之道有八,“一曰同床,二曰在旁,三曰父兄……”也说得毫不含糊。虽然听起来感到刺耳,但却与家天下的历史事实是相符的。无可辩驳的。

第三,上述君臣观必然引出的结论是:不要相信人,那怕亲生子、生身父,也要心存戒备。“人主之患在于信人,信人则制于人”,“为人主而大信其子,则奸臣得乘于子以成其私”。太信其妻更是这样,“以妻之近与子之亲而犹不可信,则其余无可信者也”(《备内》)。《内储说上》有一段说得更干脆:“尽敌之”,统统看成可能是敌人,只有“尽敌之、无患也”,因为统统不可信,然后统统加以防备,才能防患于未然。当然,所谓“不信”是说不要太相信,不能依靠人臣的信用和忠诚,而要依靠自己对于“法、术、势”的运用。“恃势不恃信,恃术不恃信”,只有我的权术是可信的。“不恃其不我叛也……恃吾不可叛也……恃吾不可欺也”(《外储说左下》)。(它的母型乃《孙子兵法·九变》:“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无恃其不攻,恃吾有不可攻也。”韩非还有不少将兵法移植到君道上来的东西。)只要有办法加以制御,“参验”(多方比较),依然可信可用,必信必用。不然,偌大的天下,君王一人怎能包、保得下来?

韩非的御臣术就是建立在上述理论基础上的。君王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不能不依靠文武大臣及宗室、妻妾等人。但又要时时防范他们,必要时加以打击的,又恰恰也是他们。正因为如此,既要依靠他们,这是须臾不可离的;又要防范他们,也得时时小心。君王用“术”,要“藏之于胸”,“密不示人”,不仅一般臣民,就连君王的父兄妻妾子女也是看不得、讲不得、想不得的。

(二) 韩非设计的御臣术

《韩非子》共五十五篇文章,二十余万言,其中谈“术”,大至掌权、用人,小至备内、听言,无所不有,可谓丰富多彩,所以,这里只能择其要点来说。

第一,御臣之辔在赏罚。用赏罚制导群臣,控制全国。臣下的生杀予夺,富贵贫贱,都应操在君王手里。他们的官爵、特权、财富、荣誉,既可以封赠赏赐,也可以抄没收回。韩非说:要是一个人不衣不食不饥不寒,再加上不怕死,他就不可能有“事上之意”(《八说》)。因此,应该向驯鸟人学习:“断其下翎”,使它“恃人而食”;“焉得而不驯”(《外储说右下》)。君王独操刑赏,还会有什么事不可办到呢?

第二,君王务必保持自己至高、至贵、至尊、至重、至隆的地位。“万物莫如身之至贵也,位之至尊也,主威之重、主势之隆也。此四美者,不求诸外,不请诸人,议之而得矣”(《爱臣》)。这“五至”只要跟臣属议论一番,甚至稍加示意就会得到。要是已经有了人臣之威势过盛,能与君王抗衡,则应“毋弛而(你)弓”,迅速改变“一栖两雄”(《扬权》)。

第三,刑过不避爱亲及大臣;“不赦死不宥刑”。有的人臣应质其妻儿于可控制的地方,有的用高俸禄,有的要特别加以警惕。如果这些还不起作用,则“除之”。“除”分“阴除”与“显除”。对“生害事,死伤名”者自然得“阴除”,收买他的仇人暗杀他,或“行饮食”(放毒)等(《外储说右上》、《八经》)。

第四,“备内”,即防备家内之乱。“虽有亲父,安知不为虎?虽有亲兄,安知不为狼?”自然,也有备内之种种办法。

第五,花草常打叶剪枝培土,君王也要经常砍削、调整人臣与左右的权势。“为人君者,数披其木,毋使木枝扶疏”;“毋使枝大本小”。一则要砍削,另则要增益。“厚者亏之,薄者靡(华丽)之,亏靡有度”,亏时要渐渐地,增益华丽时要慢慢地。同时任何“木枝”不得“外拒”——借外力实现自己的私利(《扬权》)。

第六,一切臣民的言行必须尊君利上。“大臣有行则尊君,百姓有功则利上”(《八经》)。要是当儿子的常对父母夸赞别的老人勤劳,这是“谤其亲者也”。同样,“为人臣常誉先王德厚而愿之,

是诽谤其君者也”。因此,“毋称尧舜之贤,毋誉汤武之伐,毋言烈士之高,尽力守法,专心事主”(《忠孝》)。当然更不许借古非今,说君王的不是。后来,就连非议本朝列主列宗也会杀头的。

第七,“朋党结私,乃臣之宝”,不能允许他们握有此宝。“朋党相和,臣下得欲,则人主孤;群臣公举(检举),下不相和,则人主明”(《外储说左下》)。任何朋党的“刍形”,都必须解散,这叫“必伐其聚”(《扬权》)。

第八,“官再大,也不能以其管辖的地盘成其势位。不能征税,不能拥兵”,“处国无私朝,居军无私交”,“随从车辆不得多于四乘,不得带奇兵,不得互相私自传递文书”(《爱臣》)。

第九,“稍举几条细小的‘术’”(1)即“迩以知其内”。通过他亲近的人,了解他的内情。(2)“疏置以知其外”。开导他委置在外的人,从外面了解他。(3)“设间以网独为”。对于专任独任的大臣,应设某种监视网。(4)“举往以悉其前”。了解他的过去,以知他的现在。(5)“渐更以离通比”。逐渐更调臣下的职位与辖区,不使常任,以免结党营私。(6)“论反以得阴奸”。伪论事情的反面,用以察断阴私奸行。(7)“作斗以散朋党”,挑拨离间,瓦解朋党。以上仅仅是从《八经》篇摘出,其他还有不少。

不论哪一条“术”,都要绝对秘密,“言通事泄,则术不行”。同时,“主上用之,若雷若电”(《扬权》)。雷一般地迅速,电一般地神秘。

可见韩非是我国君主专制的理论家。世界上有哪一位思想家在总结君主专制的经验教训上可以企及韩非?集中国君主专制之大成,韩非当之无愧。

所以当秦始皇看到韩非的书后,大发感叹:“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迅速派兵攻韩(《史记·韩非列传》)。可见韩非子理论对于秦家店的影响了。在赵高的教唆下,秦二世胡亥,篡夺皇位,破坏君主专制的基本制度,赐杀太子及他的兄弟姐妹二十六人,而且将秦始皇的滥用民力、滥用暴力更推向极致,从而招致王朝的天折。它从反面证明秦家店是不能背离韩非的理论的。

(责任编辑 致中)

纪念《炎黄春秋》创刊十五周年专辑

(上)



2006年7月14日上午,炎黄春秋杂志社在北京万寿宾馆举办茶话会,庆祝《炎黄春秋》创刊十五周年。

杂志社社长杜导正首先向各位来宾致谢,特别介绍了出席茶话会的年过九十的老前辈:杜润生、杜星垣、张致祥、于光远、李昌、凌云、甘惜分,随后介绍了本刊从创刊起逐步形成的特点和办刊宗旨。

茶话会由本刊常务副社长徐孔主持。张文彬第一副会长致词,代表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向杂志社表示祝贺。接着,杜润生、阎明复、高尚全、李锐、李昌、于光远、朱厚泽、袁鹰、冯健、李乔、孙大午、韩钢、王强华、钟沛璋、戴煌等同志先后发言,祝贺《炎黄春秋》十五岁生日,对刊物如何在历史进程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表达了看法。

杜润生同志回顾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探索的历史,阎明复同志谈了自己阅读一些历史文章的体会,李锐同志谈到他对一些历史和理论问题的看法,高尚全同志顺便介绍了西山座谈会的情况。朱厚泽同志在发言中讲到:忘记了历史的民族,无法预计未来,只能在原地踏步。他的讲话被掌声所打断。

本刊还收到不少贺函、贺电。

我们在本期先刊出几位同志的发言与贺函,其余同志的一些发言与函电,将在下期摘要刊登。

(与会人员名单见78页)

沿着这条办刊道路走下去



——纪念《炎黄春秋》创刊十五周年茶话会上的汇报发言

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

杜端正

《炎黄春秋》创办15年了。从体制上说,炎黄春秋是改革开放的产物。从创办至今,炎黄春秋没有要政府一分钱,也没有一个正式编制。她走过的15年历程,似可作为中国报刊史上体制的探索的一个版本。当然,这是和我党推行民主、科学执政和各级领导的开放和宽容分不开的,允许我们探索,允许我们在探索中发生失误。

从内容和观点上,我们力求真实反映历史;宣扬爱国大团结,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特别在坚持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方面,态度是鲜明的;“誉人不增其美,毁人不益其恶”的史德,我们始终不渝地恪守着。我们自认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主流派。我们党能取得胜利,能存在到现在,最核心的东西,主流的东西,就是实事求是,或者称之为科学精神。无论是毛泽东还是邓小平,都依靠这个法宝。

最大的实事求是,就是认清世界历史的潮流,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孙中山推翻帝制,就是那个时代最大的实事求是。毛泽东同志领导我们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也是那个时代最大的实事求是。邓小平搞改革开放,搞市场经济,也是当时最大的实事求是。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小平同志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进展不够大。促进这方面的改革,顺应孙中山先生和毛主席早就认识到的世界历史潮流,胡锦涛同志最近将它概括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我们认为,这就是当前最大的实事求是。

在对中共党史上的人物和事件的认识上,曾长期受到一种与之相反的非科学态度的影响。这种状况,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尤其是在思想解放路线不断推进后,有了很大的改观——当然,那种非科学的心态直至今天不能说消失了。这些残存着的非科学的条条框框,也或多或少地束缚着编者和作者的手脚。这就使杂志15年来在述史述人时,有时候难免会产生敢不敢、要不要讲真话的困惑。但从总体上看,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我们是坚持了。尽管有时候是进三步退一步,跌跌撞撞的,但我们毕竟前进了。这前进的步履,也是和我们党、国家探索发展的轨迹合辙的。

当然,我们还存在许多缺点,有让读者和作者不满意的地方。这些缺点,我们恐怕要随着政治体制改革一点一点地克服,体制改革多进一步,我们的胆子也会大一点,心里更踏实,多办一些事。

恩格斯说:“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的错误中学习来得快。”我们党今天倡导的科学的、民主的治国方略,正是建立在对以往的错误和教训认真总结基础上的。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就要让人民如实而全面地了解历史的本来面目。这是思想健全,心理平和,社会稳定的真正保障。这个道理,我们的祖先在“子产不毁乡校”中已经讲清楚了。这也正是以中国历史尤其其现当代历史重要人物和事件为主要内容的《炎黄春秋》的任务。

我们会继续沿着这条办刊的道路走下去!

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的十五年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第一副会长 张文彬

值此《炎黄春秋》创刊十五周年之际,我代表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表示诚挚的祝贺!

《炎黄春秋》创刊十五年了,这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生巨大变革的十五年。十五年来《炎黄春秋》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宣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路线,高扬爱国主义伟大旗帜,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持“百家争鸣”方针,以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总结分析党的历史经验,遵循以史为鉴,立足当代,面向未来,期望能为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保持国家长治久安作了若干探索。在国际社会动荡不安,国内社会结构调整和人们思想空前活跃的时代,能有《炎黄春秋》这样的期刊出现在读者面前,作为党史理论刊物,这是对党、对社会的一个巨大的贡献。

我是《炎黄春秋》比较早的读者之一。这也许同我所攻读的学科专业和个人兴趣有关。学生时期,我一直比较注意中共党史学习,凡出版的党史文献,我还是读过很多的,因而有许多疑问萦绕心间,希望得到解决。我们这一代人出生在抗日战争烽火年代,但没有能亲历革命战争那艰苦卓绝斗争的洗礼,对革命的复杂性知之甚少。改革开放以来,许多历史问题逐渐解密,使我们得到重新认识。尤其是《炎黄春秋》发表的许多文章真实的再现了历史问题真相,使我受到深刻的教益。我感受有三点:

一、坚定性——《炎黄春秋》每期发表的主旨文章或重要文章,都坚定不移地贯彻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邓小平理论。例如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纪念红军长征六十周年和中国抗日战争暨反法西斯战争胜



利六十周年的文章,发扬延安精神等文章,都坚定不移地宣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

二、学术性(思想性)——这也是《炎黄春秋》的特点之一。邓小平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也曾说过,“我们总结了几十年搞社会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这就是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就要弄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二要走自己的道

路,就要从中国国情出发,照抄别国经验是没有出路的;要坚持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炎黄春秋》相继发表的《邓小平八一八讲话》《邓小平谈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治建设》和《马克思是怎样论述民主的》等文章,从理论上澄清了过去一些模糊认识,恢复了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正确表述,纠正了一些错误观点,对提高人们的认识和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有很大的启示。

三、真实性——这是《炎黄春秋》最显著的特点之一。《炎黄春秋》始终坚持了“秉笔直书,求实存真”的原则,赢得了读者的好评和信任。例如对中共创始人、五四新文化运动总司令陈独秀一生功过的评价,又如对张闻天的评价《张闻天对政治民主的卓识》《为张闻天总书记正名》,有理有据,实事求是。又如对胡耀邦同志功绩的评述,通过《耀邦指导我们起草中央文件——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决议起草过程》《我心中的耀邦》等文章,真实、生动地再现了耀邦同志的民主精神、民主意识、民主作风和他的博大胸怀、光明磊落的人格,同周恩来总理一样,堪称共产党人的风范。我记得南阳武侯祠就有耀

邦同志写的一副对联:“心在人民,原无论大事小事;利归天下,何必争多得少得”,是很值得体味的。

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评述和对一些老革命家的访谈,也都能做到“求实存真,言之有据”,既表述了老革命家和老将军革命年代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历史,也充分体现了他们对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思考,给我们以深刻的教育。汪小川同志写的《我在西路军的经历》,真实再现了西路军转战河西走廊的悲壮历程,真正是字字泣血!很多文章以生动的记述、翔实的史料、缜密的思考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史料性、可读性都是很强的。

有些文章,发表时有一定难度,这是需要相当勇气的。我们应当庆幸我党我国现今贯彻双百方针的宽容,政治清明,政通人和;另一方面也要承认我们刊物个别文字可能仍有不当之处,这在探索中是难以避免的。但瑕不掩瑜,期望今后能在继承和发扬办刊优良传统时,也要注意总结经验教训,在落实“科学发展观”指引下,“服从大局,服务大局”,为实现小康社会、和谐社会战略目标做出新的贡献!

出席会议的有本刊顾问、编委、作者、有关单位的领导和长期支持刊物的朋友,及本刊工作人员近150人(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东	丁守和	习静	于今	于光远	马立诚	马仲廉	马沛文	马宝珠
马懋如	尹骐	方徨	王也扬	王才	王俊义	王恂	王景瑞	王海光
王宝忠	王强华	王建勋	王志	冯兰瑞	冯征	冯健	叶维丽	甘惜分
白介夫	白建钢	卢玉忆	刘志琴	刘恪山	刘家驹	孙大午	庄建平	曲润海
朱良	朱厚泽	纪希晨	老鬼	许人俊	邢小群	齐明昌	严如平	余焕椿
吴明瑜	吴象	吴塘	张秋石	张广友	张天来	张文彬	张宏遵	张鸣
张彦	张思之	张致祥	张培森	张惠卿	李一鑫	李乔	李昌	李峰
李维民	李普	李焱	李琼	李锐	杜星垣	杜子端	杜光	杜明明
杜润生	杨兆麟	杨克现	杨明伟	苏双碧	谷秀敏	邵燕祥	陆亨俊	陈四益
陈铁健	陈崇保	陈模	单少杰	周宗贤	孟繁科	季音	官伟勋	屈忠
范敬宜	郎瑜	金凤	金雁	姚力文	施亮	胡舒立	胡冀燕	赵淮青
郝爱存	钟沛璋	凌云	倪轶	秦肖娜	袁鹰	顾永高	高尚全	高放
阎明复	郭沂纹	崔卫平	曹琪	章立凡	章诒和	彭迪	曾彦修	曾景忠
曾小丹	程理嘉	舒元璋	韩钢	鲁諄	詹小洪	雷颐	燕凌	穆广菊
薄会川	薛德震	戴煌						
本刊工作人员	杜导正	方实	徐孔	杨继绳	吴思	李晨	徐庆全	
	赵友慈	胡竞成	王海印	孔屏	谷世章	赵凡响	肖林	

历史造成的损失可从后来更大的进步得到补偿

● 杜润生

祝贺《炎黄春秋》创立十五周年。十五年,共发出172期,其中颇多力作精品,体现了以史为鉴,不忘过去,未来之师。与此同时还形成《炎黄春秋》的办刊风格:求真务实,似可称当代资治通鉴,将过去历史重大事件,还原本来面目,力避误传误导。

有了《炎黄春秋》,可聚集一批作家,把他们的经历记录下来,增加史实,发挥应有效用,以正确历史观教育后代。

本求真精神,让我联想到建设社会主义问题。改革事业进入重要关头,对于姓资姓社的发问,邓小平提出不争论。实际上争论停息下来又会重复出现。

中央提出:我国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在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远未建成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是人们的理想和愿望,它须依靠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需依靠长期的生产积累。我国目前实行公有制主导多种所有制并存发展方针,这就是从各方面为社会主义准备生产力。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后富走向共同富裕。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这个概念与资本主义同样久远。全世界有多少派别,就有多少种社会主义。从马克思开始,有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第三国际、第四国际,有人说现在有七十种社会主义。有人向马克思提问,社会主义细节是什么样式,马克思回答社会主义在实践中,不可预定细节,束缚群众



行动,但他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是自由人联合体,财富无限涌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它关注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不断进步。资本主义使人异化为劳动工具,按人本主义,让人摆脱异化,劳动成为愉快,回归人的本质。

马克思把社会主义由空想发展到科学,但还是一种理想,尚未成为普通实践。我们曾一度踏上误区,推行空想社会主义,奉行斯大林主义,甚至是封建社会主义。过早消灭私有制,消灭资产阶级法权,

“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背离了马恩如下阐述:一种制度当它还能容纳生产力发展时,是不会退出历史舞台的。毛泽东同志倡导每个人亦农、亦工、亦学、亦军,企图一时消灭三大差别,还大办人民公社,准备提早进入共产主义。所有这些努力,只不过起到试错作用,不仅是无结果而止,而且严重地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和起码的民主、自由精神。

胡锦涛同志最近讲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这几条均可作为新起点,逐步走向科学社会主义,抛弃斯大林主义模式。苏联解体,验证斯大林主义的失败。历史的曲折造成的损失,往往可从后来更大的进步得到补偿。中国辉煌的改革成就就是一项例证。

百年中外经历,启示我们,必须也有条件做出正确选择。建成适合国情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我们的理想,我们能够办到,一定能够办到。

祝贺 《炎黄春秋》 十五周年

● 燕 凌



记得杜老润生在《炎黄春秋》2002年迎春座谈会上曾经说过：要把《炎黄春秋》办成《资治通鉴》现代版。我查了一下，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资治通鉴》总共九千多页。《炎黄春秋》15年出了172期，如果每期都是80页，总共就是一万三千多页了。每页的字数也比《资治通鉴》多许多。总计应该有两三部《资治通鉴》那么多了。当然，重要的不在字数，而在于它是“现代版”。《资治通鉴》基本上是供帝王将相作鉴戒的，“资”的是专制统治的“治”。到了新中国，这些应该说是“俱往矣”。将近三十年前辞世的现代伟人，生前也经常把这部大书放在身边，大概从里面也曾领会到不少治国谋略，实行起来自然不会原样照搬，而是“还看今朝”，我们是身受其惠的。

《炎黄春秋》“资”的什么“治”呢，应该是“民有、民治、民享”的“民治”吧。现在，中国的民不知道是不是所谓“子民”，看来还是在有人“为民作主”的状态下的民，还不能说已经是自己作主的民，“民治”的机会还不是很多。“民主”这个词说得不算很少，但总使人觉得是形而上的，摸不着的。《炎黄春秋》所“资”的“治”，看来是比较具体的，可以捉摸的。她使越来越多的人对于若干历史真相“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惊叹“原来如此”。她让越来越多的民众从以往的许多事件的本真状态和许多人物的切身经历中，不仅仅是知道，而是痛切地感受到“治”“乱”之本，明白“治”的成败得失之道，因之有所惕励。这也是一种启蒙，就是揭开蒙在历史上的种种迷彩服，使人们知道许多事情的真相，也就渐渐懂得那些假恶丑的东西再也不能让它卷土重来，明白怎样才能走进真善美的境界。

作为读者，我们想要知道也特别应该知道的历史真相，在于过去的三个28年中至今仍然被隐蔽着的事实。40年代以至50年代初，我们曾被反复告知奉《联共党史》为主臬，后来才知道其中充满了谎言。我们看到许多有关我们自己的党史事件的著作，到了新时期又看到一些当事人的叙述，对照起来才得知原先的记载中也有许多是假的。对历史造假，不只是为某些人脸上刷金粉而已，其严重后果是不能接受历史上的沉痛教训，以致给人民造成更大的祸害。1921-1949年，中国共产党在内忧外患不绝、国无宁日、党无宁日的情势下苦斗了28年，终于创建了新中国。其中许多隐情不为众人所知，与后来又发生令人扼腕的事情不能说没有关系。1950-1978那28年间，得以安宁建设的日子仍然不多，终至天下大乱，遭逢浩劫，余波三年不息。1978年至今的28年，终于得以以建设为中心，可以说是进入“大治”时代了，而其间仍有风波起伏，且官员腐败现象愈演愈烈，垄断横行，民生仍然艰难。究其源，还在于改革只有经济这一半，而且这一半也还残缺不全，政治改革极其缓慢。不但是跛足前行，而且是在暗箱操作中前行，许多事情仍然是不透明的，“民治”的程度很低。

《炎黄春秋》对这三个28年中以往人们不了解不明白的许多人和事，尽力揭示其本来面目，这是最大的功德。她走过的路也崎岖不平。越是遭遇曲折，她越受读者欢迎，读者群不断扩大。我们的国家改革开放以来有长足进步，不知为什么，在新闻出版自由方面却常常退步。与《炎黄春秋》同类的刊物越来越少了。因此人们就更珍爱她。祝愿她健康长寿，蒸蒸日上！

2006-07-14

纪念《炎黄春秋》创刊 十五周年专辑



炎黄春秋 YANHUANGCHUNQIU 2006年第**8**期

《土地改革法》的天折

马寅初——单枪匹马 战死为止

潘汉年在劳改茶场

李少石事件——暗杀还是意外

两个路翎

“秦家店”君主专制主义理论形成三部曲

ISSN 1003-1170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817/K

国内邮发代号: 82-507

定价: 5.80元